

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沈宗武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

ISBN 7-222-03898-1

I. 斯... II. 沈... III. 斯大林, J. V. (1879~1953)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A831.64 ②D7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0209 号

责任编辑: 杨云宝

装帧设计: 王睿韬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名	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
作者	沈宗武 著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e. km. yn. cn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20 千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制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7-222-03898-1
定价	19.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序 言

沈宗武是我的学生，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模式有着浓厚的兴趣。七八年前，他就开始钻研斯大林模式的问题，并参与我主编的《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现实》一书的写作，出了一些成果。

在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后，沈宗武以《斯大林模式的是与非》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个选题比较大，也比较难。好在他有了一定基础，能够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处理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把握住了研究斯大林模式的方法，形成了清楚的研究思路。沈宗武的博士论文写成后，在论文答辩时就被评为优秀论文。之后，根据论文答辩前后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他又对博士论文作了精心修改，最终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这一著作。

斯大林模式是总结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的重点和难点，历来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由于斯大林模式对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在我国社会生活的某

些方面存在着。因此，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不仅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也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关。沈宗武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敢于选这个题目作研究，并能拿出自己明确的见解，获得有关专家的好评，这是难能可贵的。

综观全文，沈宗武的《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具有观点鲜明、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行文流畅的特点。这是一部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力作。在我看来，与现有的国内外有关斯大林模式的著作相比，本书的新意最主要表现在下面三点：

第一，全书很好地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善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作者综合运用了现代制度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单纯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当然是难以得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作者恰恰能够意识到这种局限，从制度的成因、理念、结构和功能的层面，对斯大林模式作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综合剖析，所得出的观点稳妥而又富有说服力，所作出的论述能够自圆其说。

第二，把斯大林模式的研究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将斯大林模式看作经济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的创造性模式进行研究，从而在一个崭新的视角拓展了客观评价斯大林模式的广度和深度。作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后发先进”的社会发展模式，分析了它促进苏联（苏俄）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的历史作用，也分析了它在促进社会快速发展后必将迎来重大变革的

事实。这一视野比较开阔，得出的见解也比较新颖、独到。

第三，在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内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制度分析，提出了斯大林模式的诞生和斯大林模式的变革都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的观点。这超越了一些著作屡屡将斯大林模式混同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局限，不是进行历史资料的整理和阐述，而是从制度层面对斯大林模式作出了不同层次的剖析和评价。作者清楚地区分了斯大林模式的个性与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的区别，运用它去剖析斯大林模式包含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它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践体制，从而清楚地界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应该继承和应该扬弃的不同对象。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时，以斯大林模式为对象集中剖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制度优势和体制弊端，这种认识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理论建树。

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在导论中对目前学术界经常混淆的几组概念作了准确的界定，这不仅使本书的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研究工作富有针对性，而且使本书与现有的同类著作区别开来。以此为基础，作者在书中较好地展现了其对学术界同类问题研究概况的洞察，并勇于在学术的层面上与持不同见解的学者进行学术争鸣，这不但有助于提高著作的学术含金量，而且能够推动斯大林模式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毛泽东说的好，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 20 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我相信，斯大林模式仍将是 21 世纪学术争论的热门话题。

当然，青年学者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难免亦存在疏漏和

不足之处。譬如，作者为了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对斯大林模式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研究就稍有欠缺。这也恰恰是作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影响”即将致力解决的问题。

新辉明

2003年1月于北京

前 言

早在 1963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就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①如今，这话已经得到证实。自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来，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实行不但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而且对世界发生了深刻影响，斯大林模式随之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它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及世界东西方政治思想界激烈交锋的热门话题，又是社会发展比较研究的重要题材。苏联解体后，这个话题再度变得炙手可热，斯大林模式的成因、理念、特征、制度属性、历史作用、体制弊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等问题亟需人们作出正本清源的评析，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兴亡的关系和斯大林模式与现存社会主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09 页。

义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等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在反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和进行有关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探索时，笔者设想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出发，把斯大林模式看作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途径，将它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把它的形成、实行和变革看作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从而尝试性地对斯大林模式重新作出全面评析。虽不敢奢望这一研究能够充分说服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却期望能够对斯大林模式这一难题作出自圆其说的系统评价。这就是撰写本书的缘起。

一 关于选题的若干思考

斯大林模式是一个老题、大题、难题，有关它的研究不但很难深入，而且很难得出新的见解。在决意选这个题目开展研究时，笔者面临着如何将这个题目做新、做好的巨大困难。但在仔细琢磨后，笔者没有放弃这一选题，因为这一研究是可行而又必须进行的。

首先，尽管斯大林模式是一个老题，但运用新方法和新视角进行研究是富有新意的。学术研究大概历来都是从两种途径进行的。第一种是对新问题或新资料进行研究，第二种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对老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第二种类型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界是更为常见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斯大林模式又作了许多研究。据初步检索，我国学者研究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的专著已经有好几部，另有大量的政论文章、苏联历史论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论著、国际关系论著和有关社会发展比较研究的论著附带地对斯大林模式作过一些分析。这些研究当然是有成绩的，一些见解非常睿智，一些论

述颇发人深省。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不少见解虽是正确的，但或者停留于政治定性的层面，未能进入科学研究的层次；或者限于篇幅，未能沿着既定的研究思路系统阐发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看法。另有一些见解是值得商榷的，它们可能是对斯大林模式作了不切实际的评价，或者捧得过高，或者贬得过低。有些著作虽然名为斯大林模式研究，按其名这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制度分析，但其实却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的述评，真正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制度分析的只是其中一章。有些专著名为苏联模式研究，按其名这是对苏联模式进行制度分析，但其实却是对整部苏联史的评述。这种现状为我们重新研究斯大林模式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于是，笔者才产生出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全面重评斯大林模式的设想。这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无疑是宏观的，有关研究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诸多问题，进行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或许能够对斯大林模式产生富有见地的、能为不同立场的学者所接受的见解。这种想法事实上成了本书的研究思路，笔者由此增强了重新评价斯大林模式的莫大勇气，并且获得了强大信心。

其次，尽管斯大林模式是一个大题，但如果能够合理统摄各种资料进行宏观制度分析，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研究是必要而且可行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人研究分子、原子、中子，有人则研究天体的运动规律，二者都不可偏废。同理，社会科学领域需要有人去研究企业的微观组织制度等相对较小的选题，也需要有人去研究宏观社会制度等大的选题，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此二者也都不可偏废。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式的研究。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庞大资料，假如所有的学者都潜心研究某一次社会事件的内在秘密和某一细小的组织制度的运行

机制，对整体的社会现象都仅仅停留在直观的感受，那么，也许人类将永远对许多整体性的社会现象处于无知状态。专就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实践的研究而言，假如所有学者都潜心研究农业集体化或肃反扩大化等相对较具体的问题，不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宏观研究，那么人们对苏联社会实践的看法可能永远无法形成整体性的理性认识。这就明确地反映出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必要性。在选择斯大林模式为题进行研究时，笔者听到不少关于这个选题太大的学术批评，但也得到一些同行专家的鼓舞。有一位专家说：“大就大吧，选题不在乎大小，关键是如何去研究。”另一位专家勉励说：“选题大有时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它可能是大气磅礴的。”的确，科学研究不在乎选题的大小，关键是要深入地研究。有关斯大林模式的选题无疑是大的，以笔者的资历来驾驭这个大题的确欠些火候，但不是不可尝试。

再次，尽管斯大林模式是一个难题，但它与中国的现实是密切相关的，这类研究对中国学者而言其实是不能不进行的。正如医生治病首先要辨症一般，国家进行社会变革首先应该识别旧体制的弊端。鉴于中国曾经“照搬”、“照抄”斯大林模式的事实，目前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改的其实就是斯大林模式。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事实上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源头和出路的一种探索，它只是以远离现实的姿态出现而已。而且正确认识斯大林模式甚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所在。从苏联解体的悲剧可以看出，尽管变革斯大林模式在当时是一种历史必然，但这种变革稍有差错就引发出了政权危机。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模式的做法，其原因就是出于对社会主义改革对象——斯大林模式的错误认识。在实践上，这种错误认识表现为错误的改革路线和错误的改革行为，其结果就

是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联盟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苏联解体的教训说明，社会主义改革者全面、系统、正确地研究斯大林模式是非常重要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保证社会主义改革不重蹈苏联解体之覆辙，就应该深入研究改革的对象——斯大林模式，从中探讨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结构特征、制度属性和功能研究，关于斯大林模式包含有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其实就是研究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和途径的起点。就是说，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时，研究斯大林模式乃是国人不得不做的事。如果对斯大林模式存在模糊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事业就随时可能受到损害。

所以，在斯大林模式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面前，我们没有退避的权利，只有迎头而上的选择。在研究这个难题时，前述提到的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角度重评斯大林模式的设想，即是从工业化的启动和进展、生产方式的变革、政党制度的嬗变、意识形态的更新、文化传统的传承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等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愿这样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能够使有关斯大林模式的评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至于这种愿望的实现程度，只能听任读者的批评，尔后再作新的探索。

二 本书的基本见解

通常，所谓前言一类的东西都是最后才写的。本书也不例外。所以，在撰写这一前言时，本书的基本构架早已搭好，基本思路已经明确，基本观点也早已形成。为了使有关见解表现

得更鲜明些，这里拟对本书的基本见解作一提纲挈领的勾勒。

在廓清“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与社会模式”、“社会模式与社会发展模式”、“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模式与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运动、社会问题”、“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个人的社会活动”、“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与斯大林模式的个性”等8组概念的区别的基础上，本书扼要地阐明了重评斯大林模式的意义、方法和思路，然后分五章剖析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念、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属性、历史作用、体制弊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尝试性地对斯大林模式作出全面、系统的评价。

6 本书认为：斯大林模式的诞生是苏联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进行的制度创新。当时国内严峻的社会危机和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使苏联社会产生了停止实行相对分散的新经济政策的客观要求，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为了积极备战，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想，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应运而生。综观斯大林模式诞生和实行的情况，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斯大林个人的思维方式三者是斯大林模式诞生的思想根源。从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无疑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制度创新。

斯大林模式的理念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分析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村问题的争论，揭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内阶级状况的新变

化基础上，本书认为，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及其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阶级斗争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理论等的产生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些理论是引导苏联人民在孤立无助的处境中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认，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不够严整，有些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斯大林时期苏联出现的过失与这些缺陷是相关的，肃反扩大化的发生与斯大林阶级斗争理论有直接的关系，苏联农业长期发展滞后与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也是有关的。但是，总的讲，鉴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不应拘泥于对其理论逻辑严整性的分析，而应到社会实践中去探求。尽管这些理论存在不足，但它们满足了社会的要求，总体上是推动了社会发展的。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这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三方面都有着明确的表现。在经济上，苏联建立了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运用行政手段执行指令性计划，对工农业生产及工农业产品的分配和流通都进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在这种经济体制内部，联共（布）和中央政府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全面控制，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受到排斥。在政治上，苏联实行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领导制度，执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联盟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进行了强有力的领导，通过安全机关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在联共（布）的权力结构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其休会期间党的领导权由中央委员会行使，在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党的政治事务由政治局及其日常办事机构书记处处理。对此，本书认为，只要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这些现象乃是一定

政权组织社会生活的形式，而不是政治体制的弊端。在文化上，苏联通过政治批判构造起了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高度一元化，国家对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都进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在实践中产生互动，使整个社会都具备了高度集中的特征。

比较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可见，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它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性，也具有自身的个性。斯大林模式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使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使苏联在现代化的进程上取得了非凡成就。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在推进工业化，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的文化科学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由斯大林领导开创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道路，是人类历史上与英国开创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途径并列的另一种现代化途径，尽管这种途径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它在苏联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在它的积极推动下，苏联用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为居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而且凭借其创造出伟大成就的光辉形象，斯大林模式还曾被认为是落后国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普遍有效的现代化模式，曾被视为是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上“后发先进”的榜样。

不可否认，斯大林模式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体制弊端。在经济上，由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排斥了经济规律的作用，资源、资金和劳动力很难得到合理配置，领导者容易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当国民经济从重视规模的粗放型向重视效益的技术密集型发展时，这种体制不能长期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政治上，由于未能充分贯彻民主集中制，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

从高度集中蜕变为过度集中，当权力失去应有的约束时，党和国家的监督机构失去了应有的作用，社会的纠偏机制失灵，各种破坏民主和法制的事情接踵而至。在文化上，单一化、公式化的管理模式容易扼制文化科学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影响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尽管斯大林模式在短期内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但在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后，它很难再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变革斯大林模式如同当初创建斯大林模式一样都是历史的必然。当历史吹响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号角时，社会主义迎来了又一次制度创新，在这一次制度变迁的历程中斯大林模式沦为变革的对象。

斯大林模式不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斯大林逝世后，尽管苏联多次尝试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变革，但历经多次反复，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仍然保存了下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大林模式仍然在苏联继续实行。在苏联的积极推动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并普遍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模仿斯大林模式后，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都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成就，但也都相继出现了一些与苏联相似的弊病。受斯大林模式经济成就的刺激，中央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行为在西方知识界产生了强烈反响。面对斯大林模式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相继进行社会改革，加强中央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积极改善劳资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斯大林模式的实行引出了20世纪世界两大阵营漫长的对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角逐成为人类历史的一大壮观景象。

总体上看，本书的新意主要是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内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制

度分析，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揭示出其高度集中的基本特征的具体表现，论述了斯大林模式历史作用及其弊端的具体内容。撰写本书的收获不在于对斯大林模式利弊得失的定性认识，而在于对其利之所在和其弊之表现的评述，在于对这种具有典型理论意义又一再引发激烈争论的发展模式的剖析和评价。

三 其他需要说明的若干事项

其一，由于是对斯大林模式这个老、大、难的选题进行的重新评价，本书在阐发自己的见解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学术前沿某些观点和见解的批评。笔者在此申明：这纯是学术见解的分歧，不存在任何政治批判之意。笔者这样做，绝非刻意求功，只是不想掩藏自己的看法。如果说学术研究是在不断争论中前进的，那么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尤其是如此。作为一个屡屡引起激烈交锋的话题，假如争论是在学术研究范围内进行的，它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笔者管窥之见，既然不愿作死守善道、抱残守缺的研究，也不愿作一叶障目的、不见泰山的分析，在批评中进行探讨就是理论研究的本色。

10

其二，本书是评论性的著作，书中引用了许多专家整理出来的历史资料。在此，笔者特向本书引用到的历史书籍的著者、编者致以由衷的感谢。在引述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评论时，书中引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些为大多数人认同的史实，对于那些仍然存在争论的历史事件的内幕资料一般不予引用。这样做的目的是，即使人们对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发生许多改变，本书的见解也不会因之而失去存在的依据，因为我们只是对已为大多数人认同的

史实进行的评论。这本书与苏联历史著作的差别在于：本书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进行制度评析，是对现有的大致是人们公认的事实进行评论，而不是对史料进行分期梳理。从学科属性上讲，本书可以算是政治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的著作，而不是历史著作。但是，一定要指出，本书的形成首先得益于为数众多的历史专家对苏联史料的研究。如果没有众多专家的历史研究，本书就不可能问世。

其三，诚如前文所述，以笔者的资历来承担有关斯大林模式这个难题的研究，无疑是欠火候的，所以本书的探讨只能算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尽管笔者自信书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提出了一些经得住考验的见解，但其中肯定存在着许多不足。由于这个选题太过艰深，加之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漏。好的是，既然斯大林模式是一个 21 世纪仍将继续争论的话题，本书的研究就是抛砖引玉，笔者诚恳地请求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重评斯大林模式的若干思辨 ^①	1
一 对几组概念的辨析	2
二 重评斯大林模式的必要性	7
三 重评斯大林模式的方法	12
四 研究思路——在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内重评 斯大林模式 ^②	17

① 在本书中，斯大林模式特指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苏联实行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典型形式。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实行的社会发展模式，虽然仍具有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但由于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历史作用与斯大林模式已有许多差别，故不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

② 尽管斯大林模式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不可否认，它是一种曾经创造过辉煌成就的社会发展模式，它的兴衰突出地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

第一章 斯大林模式的成因	25
一 斯大林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25
(一) 斯大林模式的初步形成	27
(二) 斯大林模式的全面确立	30
(三) 斯大林模式在战后的延续	32
二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	34
(一) 国内开始出现复杂的社会危机	34
(二) 国际风云变幻, 战争阴影笼罩全国	39
三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	43
(一) 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	43
(二) 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	48
(三) 斯大林的思维方式	53
四 斯大林模式的诞生曾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制度 创新	56
(一) 新经济政策的制度缺陷	57
(二) 斯大林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是政府主导型 的制度创新	64
2 第二章 斯大林模式的理念	68
一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69
(一) 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关于一国能否建成 社会主义的争论	69
(二)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主要内容	78
(三)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是与非	82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	85

(一) 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	85
(二) 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88
(三) 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是非评析	96
三 农业集体化理论	99
(一) 斯大林与布哈林等人关于农村问题的争论	100
(二) 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103
(三) 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是非评析	107
四 阶级斗争理论	110
(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	111
(二) 斯大林对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	113
(三) 斯大林阶级斗争理论的主要内容	116
(四) 斯大林阶级斗争理论对苏联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是非评析	119
五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其他方面的总体性认识	123
(一)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矛盾的认识	123
(二)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计划和商品货币问题的认识	127
(三) 对国家的消亡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问题的认识	130
(四) 对党政关系、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的认识	132
第三章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	137
一 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137
(一) 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138

(二) 运用指令性计划管理工业生产	140
(三) 对农业生产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	145
(四) 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和分配	152
二 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161
(一) 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领导制度	162
(二) 执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	165
(三) 联盟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实行强有力的领导	169
(四) 通过安全机关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	172
三 斯大林模式文化体制的基本特征	175
(一) 通过政治批判构造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准则	175
(二) 高度集中的文化领导体制	179
(三) 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	183

第四章 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属性、历史作用

及弊端	188
一 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属性	189
(一)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分析	189
(二) 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	194
二 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	198
(一) 功绩卓越的备战作用	199
(二) 促进了苏联现代化	205
三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弊端	222
(一)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长期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23
(二) 政治权力过度集中, 社会主义法制受破坏	227
(三) 文化管理模式单一化、公式化	234

第五章 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的深刻影响	239
一 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的沿革	240
(一) 斯大林之后苏联高层政局的演进	240
(二) 斯大林之后斯大林模式的继续实行	248
(三) 斯大林之后苏联的经济成就和社会问题	255
二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移植	261
(一)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植斯大林模式的原因	262
(二)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植斯大林模式的表现	265
(三)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植斯大林模式的结果	268
三 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和扬弃	271
(一) 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原因	272
(二) 中国模仿和扬弃斯大林模式的过程考察	276
(三) 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表现 和结果	279
四 对资本主义制度及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影响	287
(一)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	287
(二) 对 20 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292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296
专家推荐意见一	298
专家推荐意见二	301
参考文献	305
后 记	313

导 论 重评斯大林模式的若干思辨^①

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它在苏联的实行曾经创造过非凡的成就，它曾是 20 世纪中叶大多数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竞相效仿的社会发展模式，其由中央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的行为曾经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强大冲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模式的光辉变的越来越暗淡。实行斯大林模式的大多数国家出现了社会发展缓慢的迹象，并先后走上了变革斯大林模式的道路。这使它本身成为极具价值的科学研究题材。半个多世纪来，围绕斯大林模式进行的有关现代化途径和社会发展模

^① 伊曼努尔·康德说过：“导论的任务不是一上来就提供现成的结论，而是启发人们去思考；不是阐述一门业已形成的学科，而是去发掘和创造这门科学”。参阅康德著：《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0 页。本书的导论探讨了重评斯大林模式的必要性、方法和思路，它不是知识性的而是思想性的，它的意义在于界定研究的对象，限定讨论的范围，思辨地引出正文的评述。

式的比较等学术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非常活跃。不同立场的学者对斯大林模式往往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各种观点经常激烈碰撞。至今，关于斯大林模式的争论仍在进行，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模式仍是一个难题。本书将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角度，综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制度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对斯大林模式进行跨学科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在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内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制度分析。

一 对几组概念的辨析

“模式”（英文：Mode）一词的本意是指“事物的标准样式”。当“模式”这个词被用于形容一定社会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时，它所具有的含义应该是指一定政府代表统治阶级组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时所提倡的理念、所组建的体制和所采取的政策、方针等。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涵盖这些含义，那么，采用“社会模式”应该是恰当的。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由于“社会模式”这个词太抽象，而且它与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概念在含义上比较难以区分，因而很少被人使用。不过，在指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模式时，“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就比较高了。本书所研究的斯大林模式，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些学者称之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相同的，都是指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及其实行的体制和采取的政策等。在深入研究斯大林模式之前，为了对研究的对象作出明确的界定，首先必须廓清下列几组概念的区别。

1. 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与社会模式。社会形态是指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体。社会制度是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性质的角度对社会形态的另一种称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有五种社会形态，相应地就有五种社会制度，它们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如上所述，社会模式指的是一定政府代表统治阶级在组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时所提倡的理念、所组建的体制和所实行的政策、方针等。那么，一种社会制度就可以有多种社会模式，诸如，资本主义制度可能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新加坡模式等，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可能有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铁托南斯拉夫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等。不同社会模式的更替往往构成一种社会制度内部的制度变迁。在研究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时，通常必须在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框架内对社会生活作出分析，也就是在社会制度的基础上研究社会模式。撇开社会制度，有关社会模式的研究将无从着笔。

2. 社会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社会模式是对一定社会制度内一定政府组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所提倡的理念、所组建的体制和所实行的政策、方针等。社会发展模式基本上也应该具有这些含义，虽然这个概念突出了“发展”的含义，突出了一定政府发展本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战略含义，但战略的实施需要建构一定的体制去实行。在学术研究中，社会发展模式的使用频率比社会模式的使用频率要高得多。社会发展模式的概念在发展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学派的论著中广为使用，因为它生动地体现出了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含义。日前，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引介，社会发展模式的概念已经为我国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从字面上看，社会模式这个概念显得比较空泛，它一般是在指称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即社

会主义模式时才为人所用。由于本书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制度分析，所以在论述中同时运用了这两个概念。在论述现代化途径时使用社会发展模式的概念，在探讨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时运用社会模式的概念，但赋予两者以相同的含义。其目的是为了尊重学术界已经约定俗成的习惯，便于学术交流中的概念认同。

3. 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体制。按照上述界定，斯大林模式就是斯大林执政时期（主要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的社会模式，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体制、政策的统称。^① 斯大林体制则仅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称谓，不包含指导理论和政策层面的内容。显然，二者是种属概念的关系，斯大林模式包含着斯大林体制，斯大林体制则包含于斯大林模式之中。相比而言，斯大林模式比斯大林体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有体制层面的内容，而且包括有比体制更抽象的指导理论和更具体的政策、方针的内容等。

4 4. 斯大林模式与苏联模式。在指称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社会模式时，斯大林模式与苏联模式两个概念经常被混用。其实，这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前已提及，斯大林模式指的就是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和实行的体制、采取的政策等，而苏联模式除指称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

^① 本书前而已对所研究的斯大林模式的时空范围作了界定，斯大林模式特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界定对全书具有统摄作用。斯大林执政时期，尤其是其初期是一个很难准确界定的时间概念，它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这一提法比要模糊得多。此处之所以称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对前述界定的否决，只是为了表达上的简便起见而已。

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和实行的体制、采取的政策外，还包含有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显而易见，苏联模式这一概念的外延比斯大林模式要大的多。因此，本书为了使概念的指称在时空上尽量集中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采用斯大林模式的概念是比较合适的。

5. 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主义。从字面上看，斯大林主义应该是指由斯大林本人创立的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与斯大林模式相比，斯大林主义属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斯大林模式则是全面涵盖社会生活诸方面内容的概念，其中当然包括有意识形态的含义，二者的差别是明显的。而且由于斯大林主义首先是由刻意攻击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提出的，它已经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因此，在指称斯大林的思想体系时，我们一般不采用斯大林主义的概念，而采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在笔者看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即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应该是斯大林模式主要的理论支柱，是斯大林模式的理念。研究斯大林模式，必然要论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则远不能代替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

6. 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运动、社会问题。社会模式与社会运动、社会问题是两种不同类别的概念。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社会运动指的是当时苏联社会发生的主要社会活动及其过程，如农业集体化、工业化、肃反扩大化等；斯大林时期的社会问题指的是主要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富农问题、备战问题、党内斗争问题等。此二者不直接包含有社会体制、政策的含义。分析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问题，对于加深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当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把对它们的分析当作研究斯大林模式的主

要内容。^①

7. 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个人的社会活动。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个人的社会活动（包括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对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实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由此认为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个人活动的结果。在研究斯大林模式的成因及其负面效应时，一些学者倾向于从斯大林个人活动的角度去探讨问题，较少去探讨社会深层原因。总体上看，有关斯大林个人的政治活动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而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则仍做的不够深入。目前，俄罗斯公开了大量苏联时期的秘密档案，这对于研究斯大林时期苏联重要决策和政治斗争的内幕非常有帮助，一些学者运用之去剖析斯大林个人行为的动机。这类研究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我们更提倡用之去研究斯大林模式，因为对社会制度的研究比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8. 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与斯大林模式的个性。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是指科学社会主义^②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对于处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与世界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应该是：建立并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

6

①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几部有关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论著，其中大多是以对苏联时期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问题的探讨替代了对斯大林模式的制度结构的分析。有关社会运动和社会问题的分析和有关制度结构的分析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前者属于历史学范畴，后者则属于政治学、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的范畴。这大概也是本书与现行论著的一个鲜明的区别。

② 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理论、制度和运动三层含义，此处专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制度。

配，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等。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即它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因而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在斯大林模式身上是有所体现的，比如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构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等等。斯大林模式的个性则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采取的特别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等，比如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集体农庄，组建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等。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因而它既具有社会主义模式一般性，也有斯大林模式的个性。分清这两者的区别，有助于在变革斯大林模式时，合理地继承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扬弃斯大林模式的个性，使社会主义改革不至于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二 重评斯大林模式的必要性

1963年，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撰写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时，加入了下列这段话：“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① 这话字字珠玑，深刻地预示了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问题研究的走向。目前，在21世纪初，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有关斯大林问题和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已经较少受到政治局势的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9页。

影响，具备了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由于斯大林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过并仍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这一恢弘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中国改革走向纵深时，中国的制度变迁必将触及问题的根本——即中国到底将保留和革除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其典型形式）的哪些内容？可见，在目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不断深化的时刻，开展斯大林模式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总体上说，在目前形势下，重评斯大林模式的必要性表现为：

第一，正确总结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需要。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既经历了凯歌猛进的高潮，也经历了溃败退步的低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向低潮。可以说，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恰恰就是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创造了伟大成就，以及各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效仿斯大林模式的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恰恰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变革斯大林模式时，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丢弃无产阶级政权后出现的。由此可见，斯大林模式在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分清斯大林模式的是非将对正确总结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起到关键的作用。然而，以前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研究，或者是受到“左”的思想倾向的影响，不敢真正去揭示它的弊端，做的主要是对其历史功绩的颂扬；或者是受到变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现实需求的驱动，没有去分析这一模式形成的客观原因、积极作用及其在当代的一些积极意义，只是一味地去揭示其弊端。这些研究实质上都是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未能对斯大林模式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无助于正确总

结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由于斯大林模式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对斯大林模式至今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因而也无法形成较一致的关于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认识。所以，为了正确总结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就必须重新评价斯大林模式。尤其是对斯大林的功过和斯大林模式的是非的评价，曾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国内都曾经掀起了攻击和否定斯大林的热潮，所以，诚如前文引述的毛泽东关于斯大林问题研究的论述，在 21 世纪人们仍将围绕斯大林问题继续争论。

第二，正确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教训的需要。斯大林逝世后，虽然苏联对斯大林模式作了一些调整，但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仍然保留着。后来苏联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质上改的就是斯大林模式。因此，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就难免要涉及到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近几年来，有些学者鉴于当今世界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要求，提出了“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子”的论断。这种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尽管斯大林模式存在着很多弊端，尽管在实行斯大林模式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不少过失，这些因素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确也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但简单地把斯大林模式当作苏联解体的“根子”是草率的。因为如果没有斯大林模式，就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如果没有斯大林模式，就没有苏联 70 多年的历史，甚至就没有 20 世纪中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那么，怎么可以把它作为苏联解体的“根子”呢？况且，戈尔巴乔夫倡导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及其一系列行为直接导致了苏联改革的失败，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又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以轻易作出斯大林模式是苏联解体的“根子”的断言呢？怎么可以

草率地把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原因归咎为改革的对象——斯大林模式呢？在笔者看来，苏联解体的悲剧，是由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以全面否定斯大林模式为突破口，在改革进程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连同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一起抛弃直接造成的。所以，虽然本书并不深入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但理论上讲重拾斯大林模式的话题乃是正确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的前提。

第三，给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提供理论参考的需要。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解体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教训是：分不清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斯大林模式的个性，在变革斯大林模式时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连同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一起抛弃，就将导致无产阶级政权的垮台。就是说，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时，就不应全面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其典型形式），面应采取扬弃的做法对待之，继承其积极面，革除其弊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照搬照抄”斯大林模式，可以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一种准斯大林模式。因此，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改的其实也就是准斯大林模式。如果中国希望社会主义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避免重蹈苏联解体之覆辙，就理应对改革的对象——斯大林模式作出准确、系统、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认清斯大林模式的利弊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分析它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作用，揭示它含有的弊端，然后再合理扬弃之。这就是研究斯大林模式能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理论参考。从本质上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制度变迁，是扬弃斯大林模式和建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过程。在整个制度变

迁进程中，不全面分析斯大林模式，就弄不清楚制度变迁的来龙去脉，改革就可能迷失方向。

第四，进行现代化类型比较研究和探索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的需要。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后，以十多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现代化，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凭借这一成就，斯大林模式在当时对全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很长时期内，斯大林模式长期被很多落后国家的人民当作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样板，被认为是落后国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普遍有效的“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对此，西方学者作了不少探索。即使是对共产主义持有强烈敌视态度的兹·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在过去40年中，依靠国家采取行动来对付经济和社会弊端的倾向四处流行”，“把国家当作救助社会的主要手段的做法间接地提高了苏联制度的地位，因为苏联制度是国家计划和国家指导的社会革新的最典型的样板”，“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促使新创立的几十个原殖民地国家最初采用各种各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建国方针。其中不少国家最初从苏联的经验中寻求灵感，并把苏联的经验当作仿效的样板。……在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赞颂苏联模式是现代化和社会正义的最佳最快的途径。”^①这说明，斯大林模式作为一种由国家在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的“后发先进”现代化模式，对于广大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的出发点多半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其结论往往是有偏见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按理说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则多半能站在

^① 兹·布热津斯基著：《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落后国家的立场上，为促进落后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然而，多年来，这一研究却并未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所以，从现代化的角度重评斯大林模式，无论是对于推进现代化类型比较的学术研究，还是对于探索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在我国都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那么，如何重评斯大林模式呢？

三 重评斯大林模式的方法

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产生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存在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现形式。它的实行创造了非凡的成就，而它自身却具有许多内在的弊端。它既有力地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使苏联走上了“后发先进”的现代化轨道，又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迎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困难时期，注定要进行一次艰难的变革。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者只有掌握科学的方法，才有可能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开展研究时，本书将力图做到下述五点：

12 首先，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事实分析和逻辑推理去开展研究。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分析历史事实时，斯大林模式形成时期苏联所处的复杂的社会条件、斯大林模式创造的伟大物质成就、它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过的冲击、它本身具有的严重弊端及其对苏联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等等都必将进入研究的视野。没有经过事实分析的臆断或情绪发泄式的妄语决非学术研究的结论。再现历史真实，对历史事实进行“心灵重演”，是进一步分析和批判的前提。“剪刀+糨糊”的方法只是时髦，而不是科学。所

以，即便本书最基本的见解——关于斯大林模式有利有弊的总认识，与人们的一般性认识无异，但这个基本见解必定是事实分析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而远不是政治断言式的抽象定性。果如是，剖析过程本身将成为最大的收获，因为它使一般认识得到了严密的论证，使这个一般认识不再停留于笼统地进行政治定性的层次，而是获得了科学的论证，成为一个科学论断。人们明白，政治断言与科学结论的差别是无比巨大的。而且在基本见解之外，本书针对诸多具体问题提出的一系列见解，正是基于这个最基本见解之上的具体观点，它们是围绕这个最基本见解对斯大林模式进行的系统剖析。

其次，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去研究斯大林模式。^①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斯大林模式，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综合分析，所涉及的问题很多。这要求研究者要有一个能透过现象洞察本质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法，它提倡通过分析社会

^① 虽然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受到不少质疑，但它通过分析经济基础去研究全部社会现象的方法至今是不可逾越，实际上它是多数社会科学学者，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一直使用着的研究方法。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对此作过分析。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书中，阿隆概要地评述了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等19~20世纪的主要社会思想家的思想，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一种深刻影响世界的社会学思潮。在对自孔德以降的社会学主要思潮进行比较研究时，阿隆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批判，但他鲜明地指出：“马克思试图通过经济基础，即生产力状况、科学技术知识、工业和劳动组织，理解全部社会。从经济组织出发了解各种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作为一种方法也许还是最好的了。”参阅雷蒙·阿隆著：《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阿隆所高度评价的马克思研究社会的方法，其实就是本书讲的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在哲学上，这一方法被提升为一种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或称为唯物史观。

经济生活，去透视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各种现象和发展趋势，揭示社会生活的实质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去研究斯大林模式时，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入手：（1）分析社会的经济状况，揭示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巨大困难，阐明列宁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从中揭示联共（布）路线转变的深刻原因；（2）剖析苏联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分析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备战意识对社会的反作用，国内阶级敌人的反抗以及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对国内社会生活构成的巨大影响；（3）剖析联共（布）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思维方法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进而又揭示出这些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反作用；（4）揭示制度变迁、模式变革的社会深层原因，分析社会模式内在的经济与政治、文化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再次，应该拓宽视野，开拓新思路，从现代化的角度去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作用和弊端等。剥去斯大林模式的意识形态外衣，不同立场的学者应该都将承认：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现代化途径。它是苏联人民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再发展社会主义所应具有的物质文化水平的社会制度实践形式，是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途径。从客观效果上说，斯大林模式对于苏联快速推进现代化，锻造强大的工业基础，缔造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构筑稳固的国防基础，推进社会向城市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卓有成就的作用。因此，把斯大林模式当作落后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发展途径，将其放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上进行审视的做法是恰当的。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俄（苏联）虽然拥有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其他一些重要的现代化“参数”，如工业化程度、城市化程度、群众普遍的文化

水平、人的意识的革新等却仍然处于现代化以前的行列。苏联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肩负着如此沉重的任务，而且还面临着来自国内外敌人的双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模式的实行却使苏联摆脱了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快速推进了现代化。在重评斯大林模式时，本书恰恰就是把斯大林模式的诞生看作是苏联现代化进程上不得不实行的制度变迁，将从工业化途径的转变、生产方式的变革、政党制度的嬗变、意识形态的更新、文化传统的传承、人民群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角度去开展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研究。

再其次，要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包括制度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对斯大林模式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涉及到制度的变迁和制度的实行等诸多问题，事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单凭某一学科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对之作出全面的分析。比如，开展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显然对于分析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的原因和结果具有重要的帮助；揭示政府管理经济生活的方式和手段，显然有助于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运行机制；^① 从落后

^① 本书试图借鉴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与此相关的问题。对一定社会的生产资料归谁占有、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其之间关系的分析其实是制度经济学不可回避的基本研究内容。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乃是现代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源头。现代制度经济学提出的产权、制度变迁、制度成本——效益等等基本概念，其实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具有许多内在联系。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对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证实了这一点。诺思认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有效率的政治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参阅道格拉斯·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分析斯大林模式，本身就是发展社会学的框架内探讨问题，^① 这有助于在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背景下动态地看待斯大林模式的建构和变革所引起的社会制度变迁；借鉴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分析当时苏联各级干部及广大群众的心理需求，显然有利于揭示斯大林至高无上的权威形成和个人崇拜现象出现的社会原因，等等……

最后，必须正确对待新公开的苏联秘密档案。近年来，俄罗斯公开了大批苏联秘密档案。这些秘密档案大多是关于苏联政治活动内幕的记述和有关决策的文献，^② 对于研究某个决策的出台过程和某次政治斗争的内幕尤其具有价值，对于研究社会发展战略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利弊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这些资料涉及到许多政治机密，对它们的运用更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将得出不同的结论。它们既可用以论证某一类论点，也可用以否定这类论点。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

① 事实上，“现代化理论”是发展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所谓发展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学派”提出的一种研究发展问题和社会制度变迁进程的理论。参阅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的话”和第二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写：《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七、十一章。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又使各个学科之间很容易交叉共融。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一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不能不分析到这个国家的制度变迁，一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确也总是要促成社会制度的变迁，而现代社会的制度变迁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发展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很好的融合。

② 在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一批专家整理翻译苏联新公开的大批历史档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该套历史档案全书共34卷36册，已经于2002年正式出版。这批历史档案的出版为我国学者研究苏联问题提供了许多便利。

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本书是关于社会制度实践形式的研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公认的、重要的、大的事实。比如，在分析某次政治斗争时，笔者看重的是斗争双方的观点、斗争的结果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斗争的内幕则一般不予重视。因此，我们特别强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分析这些资料，争取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事实及其与制度变迁关系作出分析和批判。

总之，从现代化的角度，综合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和制度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方法，把对整体的研究分解成对各部分的剖析，又从对各部分的剖析提炼出对整体的评价，这就是本书重评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方法。

四 研究思路——在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内重评斯大林模式

说到底，斯大林模式首先是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有关它的研究应该是一种制度分析。因此，虽然有了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具体方法，但仍然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操作这些方法的社会制度理论“平台”。在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制度分析时，我们运用的这个社会制度理论“平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变迁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制度通常是对建立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的统称。在阶级社会，一定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

社会制度就是统治阶级为了确立和维护某种有利于自己的社会性质及社会秩序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① 社会总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随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化，社会制度必然随之发生变迁。斯大林模式的诞生、实行和变革恰好很好地展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变迁理论去研究斯大林模式应该是可行的。

通常，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关系为核心去分析社会制度的变迁，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五种社会制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种划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做法受到了质疑，但它是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得出的结论，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研究中，并被视为有效的分析方法。^② 本书对斯大林模式的分析，就是在承认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观前提下展开讨论的。

因此，我们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述

^① 对社会制度的这一定义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如果与诺思等现代制度经济学家的定义相比，可以看出，现代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做法具有明显的共性，虽然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诺思给制度下的定义是：制度“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法律基础规则”，“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参阅诺思、戴维斯著：《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 诚如前文引述的雷蒙·阿隆的评价，马克思“从经济组织出发了解各种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作为一种方法也许还是最好的了”。

五种不同质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变迁，即是根本社会制度的变化，是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替代；另一种是一定社会制度内部的变迁，是在根本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该社会制度的在具体体制上的微调、变迁和创新。无论何种形式的制度变迁，都包含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制度创新，既构造新的制度形式；其二是新旧两种制度形式的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斯大林模式替代新经济政策，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变革等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制度变迁。^①

第一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变迁一旦发生，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必将发生革命，以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为本质内容的生产关系将发生根本改变，统治阶级及其执掌政权的代表力量（如贵族统治集团、执政党等）将发生更替。第二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变迁一般是在维护既定统治阶级及其执掌政权的代表力量（如贵族统治集团、执政党等）的利益前提下进行的社会改革。在第二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变迁中，经济基础可能发生局部的变革，出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可能发生局部改变，但不会触动执掌政权的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这两种形式的制度变迁存在联系，制度内的变迁有时会

^① 其实，恩格斯早就明确表达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内的社会制度变迁的认识。恩格斯说过：“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时，也清楚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意思。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参阅《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转变为制度间的变迁。目前，中国理论界为了把社会主义制度内变迁和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制度变迁区分开来，提出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理论，意即在不突破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社会变革。这种提法无非是告诉世人：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变革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变革斯大林模式。对于曾经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以变革斯大林模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革——即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制度变迁包含有的两种含义：第一，寻找替代斯大林模式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

在斯大林模式之前，苏联曾经先后出现过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两种不太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在斯大林模式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在变革斯大林模式时正在构造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实践形式，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越南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形式等。截至目前为止，斯大林模式仍然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中国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成熟之前，源自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仍将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成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形成之前，源自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执政的共产党仍将对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所以，斯大林模式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仍将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核心问题。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演变、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核心问题的考察。

至此，本书的研究思路已经基本形成：

首先，研究斯大林模式必须直面的第一个问题是斯大林模

式的形成。对于斯大林模式这个史诗般的话题而言，研究其形成过程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探讨的主要是其形成原因。作为继新经济政策之后出现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终止。在这场斯大林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原因与新经济政策被“抛弃”的原因基本重合，新经济政策被“抛弃”的原因就是斯大林模式诞生的直接原因。以商品经济为基点的新经济政策为以计划经济为基点的斯大林模式所替代，表现为两种社会思想的对抗和两派政治力量的较量。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没有获得与商品经济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呵护，经济基础与上层政治建筑存在着裂痕，这使新经济政策异常脆弱。一旦社会出现严峻的危机，倡导新经济政策的社会思想必将遇到其对立思想的挑战，脆弱的新经济政策将无力经受住严峻社会条件的考验。所以，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命运其实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思想所决定的，斯大林模式也是如此。因此，这场社会制度变迁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根源。

其次是斯大林模式的理念。一定的社会制度都有其相应的理念。一定社会制度的理念其实就是这种社会制度得以建构和实行的指导思想，它同时是保卫这种社会制度和抵制任何颠覆这种社会制度的行为的思想体系。比如说，资本主义制度一般以自由主义为其指导思想，关于保护私有财产、实行权力制衡、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的思想就是其理念。社会主义制度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关于实行公有制、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消灭剥削，解放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就是其理念。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所以它当然应该以社会主

义制度的理念为理念。但是，这里讲的斯大林模式的理念是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念低一个层次的概念，指的是使斯大林模式与其他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比如新经济政策等）区别开来的理论，它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由于斯大林在当时的苏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即其社会主义理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新经济政策的“抛弃”和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肃反扩大化运动的发起，基本上都是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斯大林模式所具有的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的个性，也正是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产物。概括而言，斯大林模式的理念就是指斯大林模式得以建构和实行的指导思想，它同时还是保卫斯大林模式和抵制任何摒弃斯大林模式的行为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的框架内研究斯大林模式，就一定要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分析。否则，就无法揭示斯大林模式建构和实行的理论依据。

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特征和制度属性。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斯大林模式与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相区别的内涵。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抛弃”新经济政策的进程中不断建构起来的，在其形成的初期，它以新经济政策的对立物的形象而出现，其特征并不明显。但是，随着它的日渐成熟，斯大林模式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特征，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依据相对固定的体制形式、运行机制及操作程序等进行。这些内容构成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在研究斯大林模式时，要剖析它的内在结构，要阐明它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别，显然就必须从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进行分析。在认清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后，方才可能回过头来验证一下关于它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的论断，即对它的制度属性进行一

次认定。如果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中具有与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即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虽然它具有自身的许多个性。而且只有在斯大林模式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属性的前提下，关于斯大林模式替代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制度变迁的论断才能成立。

第四是斯大林模式的功能。斯大林模式的实行到底对社会发生了什么作用？它的实行解决了哪些社会问题？又滋生了哪些社会问题？它本身具有什么优势和弊端？这就是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功能的探讨。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是对社会制度的成本——效益的分析。在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习惯表达中，人们一般用历史作用和弊端一类的概念来分别揭示一定社会制度的功能。的确，“功能”一词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的色彩。这里，笔者采用这一词汇，主要是为明确地表达出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制度分析的思路。下文的阐述将不再沿用这一概念，而采纳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及其弊端的提法。其实，对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定位，主要是由这一章来完成的。后人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并没有什么超乎功过是非的东西。鉴于它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的特殊角色，鉴于人们围绕它反复进行的激烈争论，对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及其弊端的评价将构成重评斯大林模式的关键内容。

23

最后是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的深刻影响。本书把研究对象限定在1929~1953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所实行的社会发展模式，所以，对1953年以后苏联社会生活中与斯大林模式相关的事物的分析，对超出苏联范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对斯大林模式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的分析，都只能放在“斯大林模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章节里去分析。

虽然这不是研究的主体，已经超出了本书对研究对象的限定。但从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制度变迁和国家间社会制度的比较和传承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对斯大林执政时期以后的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影响，理应是本书必须涉及的内容，因为这些事物是与1929~1953年苏联实行的社会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比如斯大林模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及其自身的演变等。

沿着这一研究思路，我们期望对斯大林模式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一章 斯大林模式的成因

斯大林模式虽然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但斯大林模式却不是斯大林个人社会活动的产物，而是以斯大林为领袖的苏联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任何重要的历史事物的出现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深刻的思想根源，斯大林模式也是如此。作为新经济政策社会模式的替代物，斯大林模式的诞生实际上是由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发起的一次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在创建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这种由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主动发起的制度革新，在巩固现政权的前提下缔造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行为，其实应该看作社会主义内部制度创新的一个成功范式，它对于后来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25

一 斯大林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列宁逝世后的数年内，苏联仍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形势的转变，新经济政策开始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家迅速工业化的要求，而且还滋生出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粮食收购危机和富农、城市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等等。于是，国内外问题互相交织，对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在此形势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强行征粮和强迫富农迁移等，力图使国家摆脱困境，以达到巩固政权和启动工业化的目的。这些措施的执行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使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同时也引发了国家经济、政治路线的转变。由此，苏联开始朝着放弃新经济政策和创建斯大林模式的方向发展。

强行征粮办法的实行，是苏联迈出“抛弃”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虽然此时苏联仍未作出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定。1929年12月，在布哈林派被彻底击败后，斯大林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必须进行“全面反攻”。他说：“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①这是对农业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路线正确性的全面认定，是创建斯大林模式的政治宣言，同时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终止。随着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措施、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最终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

下述将对斯大林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一概要阐述：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页。以后引文，凡出自该书的，均不注明版本。

（一）斯大林模式的初步形成

1924年，斯大林开始执政，此时苏联仍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1927年，农民在生活获得了一定改善，已经购置了一些必要的农用生产工具后，开始拒绝低价售粮。1928年初，国家开始面临缺粮危机，城市工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国家没有粮食可供出口。因此，以粮食换取外汇，然后又从国外购买工业设备和技术的工业化战略无法实施。在经过政治局成员的一致同意后，^①斯大林关于执行“非常措施”在农村强行征粮的建议被全党接受，并迅速被付之实践。征粮队在全国各地强行向富农征集余粮，中农经常也被不适当地加以掠夺。1929年初，由于仍未能购得足够的粮食，国家又再次执行“非常措施”。强行征粮的办法，突破了新经济政策提倡的向农民购买粮食的准则。但是，强行征粮本身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措施，它仍不构成一种与新经济政策不同的社会体制。从1929年4月、5月起，随着集体化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和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通过和实行，苏联开始真正迈出了超越新经济政策，创建斯大林模式的步伐。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派的斗争告一段落后，集体化运动在全国掀起。按照斯大林自己的说法：“从1929年夏季起，我们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

27

^① 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大会否决了采用暴力剥夺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但是，在紧接着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不单是斯大林，而且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实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该条规定：对从事粮食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的分子予以严惩，本人交法庭判罪，粮食由国家没收。就是说，包括布哈林在内的联共（布）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采用暴力办法征粮。参阅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465页。

段”。^① 新经济政策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被集体农庄所代替。1929年5月，具有的指令性性质的《苏联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被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通过并全面加以实施，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形成雏形。

1929年12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议》，决定改组企业之上的托拉斯，撤消辛迪加和管理总局，成立实行经济核算的各个联合公司，统一管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实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联合公司——企业”三级管理体制，这样，人民委员部通过联合公司，就可以对企业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30年代初，苏联政府又进行了信贷、税制、工资改革，国家对工商业活动进行了严格管理，工商业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轮廓初步形成。1932年，苏联通过了第一个《农业劳动组合章程》，把自1928年至1929年即已形成的集体农庄制度牢牢地确定下来，建立了严格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从而保证了国家对粮食生产和分配各个环节的严格管理。这样，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就集中了全国的农业经济管理权。在工商业和农业都实行了计划管理之后，私人工商业皆被取缔，市场商品流通被排斥。苏联对全国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进行了严格的部门管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28

在政治体制方面，反对派的全线溃败，使斯大林在党内的权力得到了空前加强。原来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等人分别占据的党、政、军的高级职位，都由斯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7页。以后引文凡出自《斯大林全集》的，均为人民出版社1953~1956年连续出版的13卷全集，不再注明版本。

大林的得力亲信所执掌，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开始出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拥有极大权力，斯大林个人在党内树立起了无比崇高的威望。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权威，否则，不论是政党还是领袖都不能行使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特殊的社会形势下，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权模式更具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如果权力过分集中，超过其应有限度，变成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就会走向反面。当领袖的个人权威过分膨胀，以至于打破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时，它的负面作用就会逐渐超过其积极作用，对社会造成破坏。由斯大林及其得力亲信掌握党和国家的主要政治权力后，列宁逝世初期苏联出现的权力分割局面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格局。联共（布）告别了权力纷争阶段，进入了由斯大林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新时期。

为了配合政治斗争和经济路线的转轨，苏联对文化意识形态体制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在罢黜了布哈林派的文化领导权后，斯大林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学术文化团体进行了全面改组，开始缔造起一个完全服从于新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文化、意识形态宣传机构和学术阵地。在对德波林及其学派进行批判时，政治干预学术的做法开始被不适当地运用和认可。在卢那察尔斯基和波克罗夫斯基被清除后，教育委员部实现了领导层的变更，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终于全面掌握了教育委员部的权力。随着党内文化体制的转换，教育机构进一步实现专业化，学术文化团体逐渐行政化，一个高度集中的文化模式逐渐形成。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已初步形成。随后，社会形势的转变又促使斯大林模式不断发展，迅速走向成熟。

(二) 斯大林模式的全面确立

1934年，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将书记处所属的七个中央机关按生产原则改组为工业部、农业部、计划财贸部和政治行政部等10多个部，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书记处的权力以及它对经济部门的控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农检查院被撤销，原来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被降为它的一个附属机构。1934年5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组织措施》的决议，决定撤销联合公司，在机器制造部门实行人民委员部生产管理局——企业的二级生产管理体制，在冶金、化学和燃料工业等部门实行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托拉斯——企业的三级生产管理体制。于是，各人民委员部就直接地管理了企业的生产和分配等具体业务，国家机关的权限大大加强了。

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全面确认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新宪法以法律形式承认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也确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以部门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正确性。新宪法还明确规定了人民的选举权利，以宪法的形式认可了人民选举制度。至此，斯大林模式基本上得到了全面确立。

在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肃反扩大化运动起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作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导致了肃反扩大化的发生。依据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激烈的论断，^①内务部把党内斗争升格为阶级斗争。原反对派

^① 参阅《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页。以后引文凡出自该版本的，均不注明版本。

主要领导人，以及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包括一些军队领导人都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加以迫害。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一些学者有意渲染苏联的肃反扩大化运动，并用以攻击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错误的。但是，决不能忽视肃反扩大化给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它所造成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肃反扩大化使党内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本就具备了权力高度集中特点的政治体制，由于内务部门的各种行为而带上了破坏法制，人治代替法治的特点，使斯大林模式具有了许多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内容。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所具有的一些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不相一致的特点由此产生。

1938年，由斯大林本人提出分期纲要、并亲自撰写部分章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该书的出版是当时苏联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它既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又全面地阐明了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准则，确立了联共（布）一元化的社会生活指导思想模式。该书其实就是当时业已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在理论上的反映。它用理论的形式把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基本特征界定了下来，为其实行和发展提供了准则。由此，苏联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开始走向成熟，它不仅有着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而且有了评判是非的理论标准。

31

至此，斯大林模式全面形成。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经过两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成功实行后已经基本成熟，工、农业和商业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为一套彼此紧密衔接的有机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定型。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日臻成熟和一元化意识形态模式的全面确立，适应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运行及其之间的互动，催熟了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

(三) 斯大林模式在战后的延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耗尽了苏联两个半五年计划的物质成就，战争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同时又反过来加强了苏联的国家机器，使斯大林模式不但未弱化，反而还得到了强化。战后，斯大林模式不仅在苏联继续实行，而且还被“移植”到新成立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历史上，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缔造和实行及其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植”，谱写了人类历史上一曲激昂而悲壮的无产阶级工农群众解放运动的协奏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共同的强大敌人被消灭后，美、英、苏不再具有结盟的现实要求。1946年3月5日，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声称“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国家和人民受到苏联“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认为，苏联所希望的是“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①8天后，斯大林针锋相对地指出，丘吉尔的“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他说，丘吉尔是在进行反苏战争宣传，推行反苏战争方针。^②尽管斯大林还是竭力要维持苏联与盟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③但冷战的序幕却不可避免地拉开了。面对美

32

^① 转引自施莱辛格编：《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第2卷。

^②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62-463页。

^③ 1946年底，斯大林在接见罗斯福之子时表示，美苏两国的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他说：“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不同并没有阻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参阅《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84页。

英咄咄逼人的冷战攻势，苏联不得不再度进行新一轮的全面备战，战争阴云再次笼罩在苏联上空。不屈的苏联人民无论如何决不能坐以待毙，备战再次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斯大林号召苏联人民共同努力，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苏联拥有防止任何意外事故的保障。^①于是，刚刚经过大战洗礼的苏联人民，得不到丝毫喘息之机，冷战就再次把他们拖入战争的梦魇，国家再度肩负着与斯大林模式创建初期相似的备战任务。

因此，为了抚平战争留下的严重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世界战争，苏联又重新启动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体制又按战前的那一套程序加速运作。而且这一次，凭借曾经创造过伟大成就的实践经验，斯大林及其人民对斯大林模式具有更坚定的信心，即使在遭遇到美国的核威慑时，仍然岿然不动，勇往直前。在这一时期，苏联已经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红色孤岛”，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簇拥下，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重新实行不仅具有了深厚的工业基础，而且拥有了更好的外部环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计划委员会编制了第四个国民经济计划，要求使苏联受害地区得到恢复，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这个水平。在斯大林模式的推动下，苏联人民无所畏惧的重建工作和新的战备行动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到五年时间，国家不仅很快医治了千疮百孔的战争创伤，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逐渐超越战前的发展水平。到50年代初，当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已经在经济总体实力上向美国逼近。在五六年时间内，斯大林模式的实行不但使苏联在

33

^① 参阅《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41~453页。

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崛起，而且具有了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这就是斯大林模式的魅力所在。但是，与此同时，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有所减弱，国内经济矛盾开始更为表面化，等等……

而且，凭借其创造了伟大成就的光辉形象和苏联对世界发生的广泛影响，斯大林模式还迈出了苏联国境，被“移植”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由此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虽然各自都参入了一些本国的特色，但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政治体制和一元化意识形态模式在这些国家的建构和实行，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基本可以看作是斯大林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延续。

二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

34 斯大林模式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那是一个波谲云诡的时代，国内社会危机四起，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敌视曾经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资本主义国家对红色苏联的战争曾呈现出一触即发的态势，战争的阴影笼罩着苏联，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再度面临着生存危机的考验。

（一）国内开始出现复杂的社会危机

列宁逝世后，在新经济政策的指引下，苏联国内经济状况相对较为稳定繁荣，但是，政治生活则较为混乱无序，党内的派别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经济上的稳定状态也未能保持

多久，到 1928~1929 年间，粮食收购危机引发出新的经济矛盾，使国内经济矛盾不断激化，阶级斗争日趋激烈。而且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直接影响到党内高层领导的决策，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政治斗争开始与经济路线的分歧纠缠在一起，党内不同派别甚至还代表了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这又进而加深了党的高层领导的分裂。一言概之，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期，苏联社会又遭遇到巨大的困难，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生存危机的考验。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联合击败了托洛茨基，又与布哈林、李可夫等联手击败了托——季联合反对派。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逐步掌握了党的主要权力，党内再度形成一个相对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列宁逝世所留下的政治困境开始出现转机。但是，在粮食收购危机爆发后，斯大林与布哈林及其支持者也发生了冲突。他们的冲突表面上虽然也是政治上的权力斗争，但实质上则是经济路线的较量。这是两种经济路线主张的斗争，是很难弥合的分歧。于是，粮食收购危机与党内高层权力争夺互相交织，共同引发了 20 年代末苏联国内社会危机的全面曝光。

危机首先在农村爆发。1927~1928 年连续两年的粮食强行征购，乃是在粮食获得丰收后，农民拒绝低价售粮后迫不得已的选择。在采取这一非常措施时，斯大林主要是迁怒于富农对商品粮的垄断。在适当调整粮食价位后仍未能从市场上购得足够粮食时，斯大林决意采用非常措施，从富农手中征取必要粮食。布哈林对这种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党内勉强达成了强行征粮的一致认识之后，强行征粮的办法暂时被采纳。但这却引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富农被强行剥夺，中农也经常被不适当地掠夺，农村社会出现了动荡局面。至 1929 年，农村社会

矛盾完全激化，摆在领导者面前的农村问题的出路只有两个：或者放弃强行征粮的办法，向富农妥协，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或者对富农采取坚决不妥协的作法，彻底废除富农对粮食的垄断权，这意味着要抛弃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集体化。选择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威信扫地，富农将成为这一回合较量中的胜利者，今后党的领导地位将岌岌可危。选择后者，自然是走上斯大林模式的道路。

其次，粮食收购危机不仅是城市缺粮的危机，而且是国家工业化的危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工业全面复苏，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即使如此，苏联的工业仍然是一种极落后的工业。从当时形势看，有三个原因迫使苏联领导人必须迅速实现工业化：（1）创造强大的国防工业，防范未来的战争；（2）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与苏联落后的经济基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理想与现实的不和谐构成对革命者莫大的讥讽；（3）俄罗斯民族振兴和民族精神也促使每个俄国人都以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为己任，革命者更应如此。迅速工业化遂成为当时苏联国内社会生活的主题。尤其是在十月革命缔造了社会主义先进政治制度之后，这种向现代化进军，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紧迫感更是与日俱增。

然而，工业化的进程却由于粮食危机的发生而遇到了巨大困难。在粮食危机的阴影之下，眼看工业化的希望就要化为泡影。苏联的工业化与粮食危机这种奇妙联系有着特殊原因。当时，苏联政府征购粮食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向城市供粮；一是用以出口创汇，购取必要的工业设备。在那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化启动设备的任务是压倒一切的经济事务，以至于在城市非常缺粮的情况下，苏联依然坚持出口一定量的粮食。史料表明，即使在1932~1933年大饥荒发生后，苏联仍坚持出口粮

食，1932年出口1.81亿公担，1933年出口1000万公担。^①这种在半饥半饱的情况下依然勒紧裤带坚持出口粮食的做法，本身就充分地说明了当时苏联各级领导和多数群众积极实现工业化的决心，也说明了工业化的紧迫性。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以农产品换得工业设备，创办工业企业，这其实是常见的工业化启动办法。

可是，粮食征购危机的爆发，不仅造成了城市工人极端缺粮的问题，而且还阻断了出口粮食换购工业设备然后启动工业化的途径。苏联工业化由此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如果不能尽快摆脱粮食收购危机，那么以工业化为先导的整套现代化战略都将破产，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理想将化为泡影。

在这种情况下，粮食收购的危机终于直接表现为严酷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政治斗争。“布哈林派”这一提法，实质上指的就是那些以布哈林为核心的，坚持在当时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拒绝全盘集体化的党内人士，他们与提倡创建集体农庄的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发生了经济路线的斗争。面对粮食危机和工业化困难，布哈林等人一方面承认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却出于保持经济格局平衡的考虑，在粮食收购困难时，倡议大范围提高粮食收购价位，从外国进口一亿卢布的粮食用以缓解城市缺粮困境。后者必然会由于外汇的缺乏而造成进口工业设备设想的破灭，最终造成工业化速度的放慢。事实上，布哈林也曾承认，为了确保经济格局的平衡，决不能用武力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即使是工业发展速度慢若“蜗步”也在所不惜。

37

^① 《苏联农业1935年年鉴》，莫斯科1936年版，第222页。

斯大林则坚持创建集体农庄以克服眼前危机。他坚持要出口一定数量的粮食，大量进口工业设备，快速实现工业化。他设想，“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①而且在斯大林看来，创办集体农庄不仅可以保障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而且还能确保苏联农业“一日千里地推进”。^②

由此，联共（布）中央分裂成两派，他们各自坚持不同的经济路线。经济路线的分歧又迅速转化为组织上的政治斗争。在斗争刚开始时，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初期布哈林方面甚至还曾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布哈林掌握着党的文化、宣传机器，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是布哈林的支持者，他们一度在政治局占据了多数。但是，由于斯大林掌握着书记处，能够通过书记处的特殊作用，对干部人事进行新的任免，因此，斯大林能够逐渐在各个部门安排进一些得力的支持者，这一方面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同时还有效地钳制了对方的行动。最终，斯大林在政治局里获得了绝对多数的支持，布哈林派全线溃败。

布哈林的经济设想，由于牺牲了迅速工业化的目标，偏离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主题，最终不能具备足够的说服力。而斯大林所倡导的发起集体化，创办集体农庄的决策，既保证了工业化目标的迅速实现，又能够跨越眼前困境，最终能使苏联战胜外敌。如此的“政治动员令”，不仅具有逻辑上的首尾一致，而且符合当时形势的要求，极具说服力，最终获得了多数的支持。

概言之，二三十年代苏联国内的社会危机是异常严峻的，斯大林模式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波兰著名学者伊萨

^{①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58、156页。

克·多依彻一语中的，他说，斯大林模式乃是“严重社会危机”下的“惟一抉择”。^①

（二）国际风云变幻，战争阴影笼罩全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苏联的每一角落。这不仅是指胜利初期的资本主义干涉和国内战争，而且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斯大林逝世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的阴影都与苏联人民如影相随。^②

目前，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在1927~1928年，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还看不到战争逼近的迹象”，并摘引斯大林的一个提法：“现在谈战争的‘可能性’是什么意思呢？这等于把我们至少拖回到大约七年以前去”，^③借以批判苏联在和平环境下搞“临战体制”的行为。这个看法并不正确。上述斯大林关于战争可能性的论述，出自于他在1927年8月1日所作的“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联系上下文可见，斯大林是据此批驳季诺维也夫对布哈林的攻击。斯大林的真实意思是，季诺维也夫关于战争“不可避免性的论调”，不过是重复“七年以前”的陈词滥调，并无新意。在此，斯大林并未否认战争的可能性。恰恰相反，在同一文中他指出：“现在战争问

① 伊萨克·多依彻著：《斯大林政治传记》，纽约1973年版，第313、318页。

② 1929年以后，西方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这在事实上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暂时停止了对苏联的围攻，使苏联事实上暂时免受了战争的威胁。但是，战争的阴影并没有从苏联人心中消失，战争阴影仍然威胁着苏联的社会生活，使苏联社会主义继续走在备战的轨道上。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4页。

题是当前的基本问题”。^①在当时，战争仍未爆发，但战争的威胁却时刻纠缠着每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心灵。

从国际环境看，2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仍然举步艰难的形势下，资本主义则已经走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困境，妄图凭借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在取得压制国内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抑制甚至绞杀红色苏维埃政权。当时，国际矛盾有所激化，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国际形势对于苏联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利的。

早在1925年1月，斯大林就指出：“……整个欧洲都在重新准备力量和重新布置力量”，“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当然不是明天，不是今天，而是几年以后）”。^②

在当时，这种关于战争正在临近的判断基本上是联共（布）党中央一致的认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反对派主要成员都认同了这一看法。那时，托洛茨基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英国正准备反苏战争”。^③1927年，在英苏断交、苏联驻波兰大使被暗杀等事件发生后，苏联甚至搞过一个全民“国防周”活动。

40

在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战争阴影中的情况下，强烈的临战气氛弥漫在全国各个角落。斯大林关于“放慢速度就等于自杀”，“落后就等于挨打”等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几乎成为国民生活的精神动力。于是，苏联的一切社会生活都开始围绕国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14页。

^③ 《托洛茨基言论》（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96页。

防——战备的轴心运转，备战思维引出了一系列的战备行动，进而构成了一套战备体制。在“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们的速度。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基础……党不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①的号召下，苏联人民投身于全民备战的行动中去，斯大林模式油然而生。

在经济上，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为了快速发展重工业，苏联的全部社会生活带上了浓厚的备战色彩。国家把大部分的资金、资源和劳动力及技术力量都配置到国防建设重要部门上，各类军工企业都获得优先发展的权利，各种有利于战备的金属工业、重机械工业都获得了重点投资。在备战的行动中，全国人民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吻合了战争年代的要求。当时苏联的社会生活受到了战备思想的深刻影响，包括集体农庄的组织建设，其实也同样具有战备性质。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描述：德军进攻苏联时，苏境内每一个农庄都成为具有独立战斗力的民防队，“他们受过狙击的训练并且拥有武器，这等于是早已组织好的游击队”。^②这说明，集体农庄庄员在平时是一个集体劳动的团队，在战时则可以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作战队伍。

在政治上，既然战争正在临近，政权组织形式也应作出相

^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1月7日。

^②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

应调整，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随之产生。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把握战机，迅速作出决策，平息争论，凝集团队战斗力，树立权威具有巨大的优势。同时，它对于抑制各种可能的叛乱，清除各种潜在的“第五纵队”分子，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当时，鉴于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①的判断，斯大林领导内务部开展了肃反运动，其中肯定有着彻底剿灭国内阶级敌人以免战时腹背受敌的考虑。这一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内务部采取的残酷办法，却使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权力过度集中、安全保护机关超越法制的一系列弊端纷纷呈现了出来。

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战争的威慑激发出全面的生存危机意识，到处都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肃反扩大化的政治斗争，波及到全社会诸领域。各条文化战线，从哲学、史学、文学到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也都受到了冲击。用政治干预学术的做法频频出现，一些学术派别被强行解散。这种做法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确保了苏联红色政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却引起了过分的神经紧张，既削弱了学术研究的力量，又损害了必要的学术自由，使正常的学术文化生活受到冲击。

42

总之，特殊的社会形势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苏联经济、政治、文化工作路线的逐渐转变和不断成熟，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原社会模式终于为斯大林模式所取代。

^①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第129页。

三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

斯大林模式不仅是当时社会形势的产物，它的形成还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在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下述三个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第二，俄罗斯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第三，斯大林个人的思维方式。这三者对二三十年代苏联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就是斯大林模式。

（一）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

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斯大林模式形成的主要思想根源。当时，在严峻的社会形势下，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既有合理发挥的一面，也有形而上学的僵化成分。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曾或间接或直接地作出有关未来社会的构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主要包含有这几方面的内容：（1）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2）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消除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3）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按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劳动贡献进行产品分配即“按劳分配”，最终过渡到按需分配；（4）剥削和阶级消亡，国家也将消亡，代替国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每个成员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设想都基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主义至少在几个“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时，才有可能实现上述设想。而且诚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有关未来社会的看法，仅是一些原则性的推理或设想而已。恩格斯还认为，对未来社会描述得愈详细就愈荒谬。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只能作为行动的指南，而绝不能当作教条。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只能以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实际情况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提出了理解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的辩证方法。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环境下，后者有时是比前者更为重要的。

在领导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娴熟地运用辩证法，在科学分析、判断社会形势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发挥和灵活的运用，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个别结论进行了修正，从而屡屡能够领导苏俄人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迈进。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挥和运用后来被统称为列宁主义。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列宁主义还包含有他在落后国家亲身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些结论，如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努力提高物质文化水平，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积极改善执政党的领导等等。列宁的这些理论对斯大林等后继领导人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44

在那个年代，革命者多数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斯大林等人无论在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都非常自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权，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模式作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理论和所实行的体制、采取的政策、方针等，实质上就是斯大林等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社会

主义建设的结果。

下面将概述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并尝试着去揭示其中分别属于正确理解和教条主义曲解的成分。

首先，斯大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未来社会设想的一种实践形式。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明确作出了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因此，为了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等联共（布）领导人自然就会联想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开始构思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大变革的途径。快速推进工业化首先就是为了在工业实力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建立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消除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推进全盘集体化就是为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消灭剥削阶级和国家，^①以为将来建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条件。以上这些无疑是斯大林在苏联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主要表现，也就是斯大林等联共（布）中央领导人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写照。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其中既有正确的成分，也有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成分。发动工业化运

45

^① 斯大林认为：“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动以积极提高生产力水平；发起集体化运动以争取提高生产的协作化程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计划和调整以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以防止资产阶级的复辟，无疑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合理运用，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然而，在当时苏联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斯大林等领导人过分偏重于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创建纯粹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暴力发起并进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大变革；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①等等，则显然都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运用和形而上学曲解的成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自然史过程，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大变革应该是以生产方式的革命为前提的，他们反对在建立了社会占有制度后运用暴力解决农民问题，而这些正确思想在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中都没有获得较好的贯彻。

其次，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也是苏联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和缔造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动因之一。列宁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多次提过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计划机构的思路，提过苏联一国已经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切”的论断，也提过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的论断，这些都对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建议

46

^① 这就是晚年斯大林提出的“空地论”，它其实是斯大林对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大变革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的提出表现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的豪迈气概和创新精神，但却有些脱离实际，既不是务实求真，也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新的生产方式必须在旧的母体内孕育发芽的思想。参阅《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2~543页。

改行新经济政策时，虽然列宁对前一时期急于过渡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①但在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仍然坚持认为在这是“退却”，那么今后将发起新的攻势自然是其合理推论。列宁的这一提法恰恰就是斯大林后来发动全盘集体化的一个理由，因为“退却”已经结束，必须迎来新的“攻势”。后来，斯大林号召在“新经济政策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时”，“抛弃”它并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反攻”，就是列宁关于“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的战略的全面实施。^②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执行列宁的遗训，“抛弃”新经济政策实施新的“进攻”时构建的。

斯大林对列宁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同样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两种成分。斯大林继承和发扬了列宁关于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实施工业化，包括在社会危机来临时大胆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大胆地探索更新的经济路线，这都是对列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正确理解。但是斯大林用纯粹的指令性计划全面管理经济活动，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激化了阶级矛盾，用暴力构建集体农庄的做法伤害了农民的感情，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党内矛盾的做法损害了党的形象等等，则显然都是对列宁主义及其思想方法的教条主义运用。在社会主义史上，列宁处处以事实为依据，娴熟运用唯物辩证法，善于灵活发挥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则显然不具有列宁那样高超的辩证法思维，他对

47

^① 列宁说道：“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做法，乃是“犯了错误”。参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1页。

^② 参阅《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32~233页。

列宁充满辩证法的理论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够全面。

当然，从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事实看，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正确的成分一定要比教条主义曲解的成分多一些，否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

（二）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

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在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中起到了无形又无所不在的作用。从斯大林到各级领导干部，以至广大的苏联人民群众，都在根本上未能摆脱其影响，这使斯大林模式打上了俄罗斯传统的烙印。

从金帐汗国的奴役下挣脱出来之后，俄罗斯统治者长期实行对外军事征讨和对内专制的政策。整部俄罗斯史几乎就是沙皇对外征讨、对内实施暴政的历史。历代沙皇都延袭着彼得大帝“用野蛮征服了野蛮的俄罗斯民族”（马克思语）一类的高压专制做法，同时又积极借用东正教的传播来树立和巩固专制统治，并借之为沙皇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作辩护。因而，东正教的引入和传播，使整个俄罗斯民族都把沙皇当成现世的上帝，他们匍匐在沙皇脚下，甘愿做沙皇的奴隶。在这种环境下，经过统治阶级多年的苦心经营，穷兵黩武的军事扩张主义和皇权至上的思想意识逐渐成为俄罗斯独特的民族精神。

俄罗斯历史非常独特，对外征讨的军事扩张主义往往与民族生存危机的意识密切联系。历代沙皇关于发动军事征讨争夺出海口以摆脱外族控制的军事战略，实质上就是在生存危机意识推动下的政治行动。在他们看来，俄国没有出海口，就等于处于窒息状态，时刻都有可能被外族所控制。在历经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之后，俄罗斯人终于控制了若干出海口，并实现

了对黑海和波罗的海以及远东地区的控制。然而，这些胜利却没有阻止沙俄对外扩张的步伐，生存危机的意识成了俄罗斯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军事扩张和对外征讨成了俄罗斯民族习惯的行为。为了给疯狂的军事征讨制造必要的舆论声势，沙皇和一些俄罗斯人拼命地继续制造俄罗斯的生存危机的舆论，妄图借此掩盖军事扩张的真面目。于是，俄国人一方面是不断地对外侵城掠地，开疆扩土，一方面却仍在不停地鼓吹俄罗斯的生存危机等谬论。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后，俄罗斯人这种生存危机意识与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互相纠缠，完全交织在一起。由于受到生存危机意识的支配，俄罗斯人一般都支持沙皇政府的军国主义行动，几乎整个俄罗斯民族都染上了穷兵黩武的军事扩张主义的毒汁。于是，数百年来，构造满足战争要求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几乎是俄国社会生活的核心。可以说，俄罗斯历史上的主要经济、政治行为，都是生存危机意识与军事扩展主义两者互动的结果。

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又一特色是皇权至上的思想。历经彼得大帝的改革之后，国内贵族们的特权受到巨大的削弱，沙皇逐渐成为俄国国家政权的绝对核心，俄国的全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皆集中在沙皇手上。东正教的传播，使沙皇成了现世的“上帝”，沙皇集皇权和教权于一身。沙皇由此成为万民思想意识的主宰，俄罗斯人普遍产生了对沙皇的无限崇拜。在经过长期延续之后，整个俄罗斯民族都完全接受了沙皇是“现世的主”的观念，整个国家的政治沿革、经济活动、社会变迁，以至宗教活动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更新，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无不为至高无上的沙皇所操纵。而且，在沙皇的这种专制统治下，俄国农奴不但未对这种反动统治产生仇视，却反而树立起“沙皇爷爷”是救世主的宗教式迷

信。农奴们所仇恨的是直接奴役他们的地主，却从未追根溯源到政治体制的内在原因。俄罗斯民族的这种皇权崇拜思想隐藏在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深处，它总是对俄罗斯人的行动起着无所不在的影响。

文化是相对凝固的，尤其对于一个拥有深厚的、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传统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越深厚，它对后世的影响也就越深远。正如列宁所说的，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毛泽东也提到过，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俄罗斯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对苏联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影响的事实，恰恰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十月革命虽然彻底粉碎了沙俄的封建体制，粉碎了二月革命中草草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权，然而却无法同时把旧俄的各种封建思想意识一同清除干净。俄罗斯民族精神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马克思所说，各种死亡以前的传统都“噩梦般笼罩在活人头上”，俄罗斯民族精神中的这些糟粕，始终在苏联人民头脑中长期积淀下来，并形成巨大的滞后力量。“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这种势力将对社会的进步构成巨大的阻碍。如果说列宁曾经有意识地倡导进行文化革命，以根除旧沙俄落后意识的话，那么，斯大林则在无形中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传统精神的影响，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囿于传统文化的藩篱中而不能自知。

首先，斯大林本人受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影响。在处理民族事务时，这位格鲁吉亚族出身的领袖经常扮演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重要角色。在联盟中，各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

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冲击。在创办集体农庄时，也存在着旧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村社思想的影子，两者都有政社合一的特点，又都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之上，不给予他们自由进出农庄（村社）的自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也存在着封建宗派斗争的迹象。关于战争日益临近的判断，既是符合事实的认识，也是俄罗斯人根深蒂固“生存危机”意识的再现。在创建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时，斯大林领导实施的备战战略与旧俄时代创建军民一体的战备体制的思路也颇有相似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甚至称红军对日作战的胜利，是为1905年旧俄战败雪耻，这是不自觉地把社会主义苏联与沙俄相提并论，将社会主义苏联的卫国战争比作民族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强烈的大国大党对外扩张意识也带有俄罗斯对外扩张传统的影子。

其次，苏联的高级干部也深受传统文化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影响。在多次政治斗争和后来的肃反运动中，“老布尔什维克”中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的革命者，和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去抵制封建遗毒的党的高级领导或者不受重视，或者被“清洗”，联共（布）党内由此失去了大量优秀的领导人才。为了补充职位的空缺，相当大量的基层党政干部忽然间被提拔至很高职位，他们中有些人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是很差的，这也决定了他们思想意识的落后性和政治行为的幼稚性，他们多数不能自觉地抵制俄罗斯民族传统意识的侵蚀。在斯大林五十寿辰和党的十七大上，各级干部都竞相称颂斯大林的功绩，大搞个人崇拜，掀起了另一种形式的“皇权”崇拜。从十七大代表们对斯大林一轮高过一轮的歌功颂德中，就很可能揭示出这些代表思想意识的落后性，他们对斯大林的无限崇拜既是出于对领袖无上权威的敬畏，也是皇权思想的写照，其中不乏以谄媚换取

任用的“小市民”意识，也不乏把斯大林当作“今日的沙皇”来加以迷信的封建意识。包括比较开明的基洛夫，竟也在发言中建议说，要将斯大林同志讲话中的一切建议和考虑作为法律。可见，对于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斯大林本人负有责任，但一些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头脑中落后的封建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各级干部对斯大林所作的无原则的称颂，其实就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对苏联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的表现。

最后，苏联多数人民群众更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下，不自觉地沦为旧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活的载体。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内，民众的思想意识距离社会主义仍然有很大距离。在那个时代，文盲率竟占 50%~60%，有些年龄段甚至达到 75%，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只占 1%~2%。在这种条件下，工农群众不仅不可能掌握企业管理和民主政治的技能，而且还分不清科学文化和封建意识、民主思想和个人崇拜意识的差别，根除封建主义流毒是极为艰难的。因此，创建并实施社会主义的工农自治民主制度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些群众由于文化素质较低，不能辨别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区别，甚至会在听到上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鼓动后，把旧俄的传统直接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创举。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一些农民坚决抵制集体化，不惜以生命固守自家土地的做法就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在一些干部率先发起对斯大林的称颂后，广大人民群众随即响应，在全国掀起了个人崇拜的浪潮，把对沙俄皇帝的崇拜转变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则是又一个生动的事例。

一定的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将获得繁衍生息的能力。在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为低下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在短時間內一般

都将继续发生影响。苏联的情况恰恰就是如此。

(三) 斯大林的思维方式

由于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政局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个人的思维方式必然就是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思想根源之一。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在那个时代，斯大林“一个人的头脑，代替了亿万人民的思考”。^①

从其一生丰富的经历看，斯大林能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取胜，并带领苏联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出了非凡的经济奇迹，战胜强大的德国法西斯，他的思维方式一定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从斯大林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中的一些不足看，斯大林的个人思维的确也有着一些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成分。

从实践上看，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实践的成绩总是与正确的认识密切相关，实践的错误与认识上的不足也是紧密联系的。在斯大林的思维方式中，正确成分与形而上学成分相互交织对社会实践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不受流行观念的影响，勇敢地继承并发展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合理地分析农村问题引起的社会危机，果断地采取措施作出了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决策；分析苏联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实施高速工业化战略，缔造战备经济体制；巧妙地运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德国签定和平条约，化解了帝国主义的包围，争取到了经济建设的宝贵时机；采用一些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措施，调动工人的积极

53

^① 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与红军高级将领一起对局势进行缜密分析，带领红军化劣势为优势，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等等，都是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生动例子。

但是，在强调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性时就一律抹杀各地方政府、企业的灵活性；在谈及“小农阶级是最后一个资产阶级”时就非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①从而大范围地激起阶级仇恨；在禁止党内派别斗争时竟然就把党内各种有益的争议都一并扼杀掉；^②简单粗暴地发起肃反扩大化运动，对安全部门错误处理党的高级干部的做法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大量冤假错案的出现；在德军人侵前夕，对形势认识不够深刻，造成战争开始时红军的节节败退等等，则都是斯大林思维中具有非此即彼的教条主义成分的证明。

从理论上讲，斯大林的哲学观念也明显包含有正确的和形而上学的两种成分。斯大林哲学观念中的正确成分主要表现为他根据形势变化作出的新决策和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进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论争时，斯大林巧妙地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建成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差别，又区分了完成这两种任务的必要条件，从而提出了具备较强说服力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晚年斯大林撰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用很大的篇幅畅谈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作用，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矛盾的理论，这都是斯大林善于突破以往认识的不足，进行理论创新的

54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62页。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1、63页。

表现。善于正确分析形势，对问题进行逻辑分析，总结经验，克服错误认识，提出新见解等等，这说明斯大林思维方式中具有正确的成分。

从《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可以对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思维作一简要揭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斯大林主要的哲学论著，是1938年9月他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撰写的哲学理论。书中虽然也不乏一些闪光之处，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思想内容和机械主义的思维方法论在其中却占据着不小篇幅。众所周知，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法则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均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斯大林在讲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时，却不提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法内核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引证列宁有关辩证法的论述时，单单提到“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只字不提“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① 这些哲学理论阐述上的漏洞，显示出了斯大林思维方式的缺陷。正如毛泽东所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② 毛泽东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斯大林思维方式中的不足之处，并且阐述了它对苏联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348页。

影响。

总之，斯大林的思维方式中既具有合理的因素，也具有教条主义因素。两者交织在一起，共同对社会实践发生作用，成为斯大林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斯大林模式的诞生曾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制度创新

恩格斯曾经预见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 这话精辟地概述了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不停地进行制度创新的思想，也是对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行为的认同。

56 在总结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时，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摧毁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后，还要不断地进行改革，以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并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看，社会主义恰恰就是在不断的制度创新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替代，斯大林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初期对斯大林模式的变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扬弃等等……无非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新经济政策而言，斯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443 页。

林模式的诞生在当时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制度创新。^①

（一）新经济政策的制度缺陷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主要是为了缓解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出现的严峻社会危机。^② 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当作正式的、将长期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去实行，只是被当作暂时的“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联在经济上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分散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具有商品经济特点的多元化经济体制，但苏联社会的上层建筑却没有进行相应变革，政治体制不是适应新经济的要求逐步扩大民主，而是在经过短暂的纷争后越来越走向集中。同时，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也没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充分认同。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苏联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激烈的斗争，但是这并不是适当地扩大了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自由，而是围绕权力争夺进行的理论斗争。随着党内斗争的不断发展，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打败党内其他派别，联共（布）对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领

① 这一看法的提出，并不妨碍我们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行为，看作社会主义又一次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斯大林模式替代新经济政策时，它具有先进性，它的出现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制度创新。但是，后来斯大林模式逐步落后于时代，当它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时，社会主义又发起了一次以变革斯大林模式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② 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内战的双重作用下，苏俄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1920年粮食总产量从43亿普特减为22亿普特，只及战前1913年的一半，牲畜头数减少40%。1920年大工业的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6/7。燃料、粮食极端缺乏，工厂停工，铁路行驶车辆减少，轻工业品严重不足。1921年3月初，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生叛乱，提出了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这一事件具有特殊的含义。这支队伍的叛乱说明经济危机正向政治危机转变。可见，社会现实迫切要求俄共（布）进行社会变革。

导越来越集中。于是，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包含着互相矛盾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对分散的经济体制没有得到上层建筑的保驾护航，反而经常面临政治活动和思想观念的冲击。所以，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式充满制度缺陷，其抵抗制度变迁的力量非常微弱。在社会危机激化时，当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自觉地发起针对新经济政策的制度变迁时，斯大林模式轻易地取而代之。

新经济政策在苏俄的实行始于1921年春，终于1929年春，历时八年。1921年2月初，列宁拟定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初步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主张。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决定以新经济政策取代已实施三年之久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5月下旬，俄共（布）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概念。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新经济政策开始在全国工农业各界广泛地实行开来。1921年12月，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按照列宁的说法，新经济政策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新经济政策全面实行后，苏俄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苏联成立、列宁逝世、党内派别纷争、粮食收购危机等等……期间，新经济政策虽然遇到不少阻力，但基本上仍然继续得到了实行。只是，直到1929年，苏联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正式实施和农业集体化的全面开展后，新经济政策才退出历史舞台。

58

作为一次迎接社会挑战而进行的社会变革，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理论探讨和实践验证的相互作用下不断成型。那么，在这个不算短的历程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引起了多大的社会变革呢？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新经济政

策到底包含有什么内容呢？又带有什么制度缺陷呢？

新经济政策在苏联的实行，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变革。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不断实行，苏联广大经济领域大多实行了与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措施不同的经济决策。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商业，从生产的组织形式到产品和利润的分配方式等方面，苏联社会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变革，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体制。国家允许并鼓励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在规定范围内的发展，积极发挥市场、商业的纽带作用去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从1921~1929年春期间，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得到了普遍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体制成为主导苏联社会的经济体制。即便是在1928年强制执行“非常措施”时，斯大林也还提出，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改变。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首要步骤是在农村进行农业经济体制的变革，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这一政策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开始关心农业经营。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大为活跃，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粮食税的实行成为启动新经济政策的阀门，之后，随着土地租佃制、劳动的合同制和日工制的逐渐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农业体制基本上完全为新经济政策的农业体制所代替。

其次是实行工业体制的改革，废除小企业国有化法令，允许恢复私人和合作社的小型企业。在废除了1920年9月7日和11月29日分别通过的小企业国有化法令后，工业产品开始增加，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大为活跃。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切实贯彻新经济政策的指令》。该指令对全俄工业领导体制及经营方法，都作了重要的改革。按照该指令的

规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再管理全部工业企业，只管理一定数量的重要的大型企业；其余一切企业均可租赁给合作社、联合体或私人；国家无力管理又无人承租的企业应予关闭，职工可以分配到其他企业，无单位接受的职工可以到劳动部门登记，领取失业补贴；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企业也应参照上述原则处理。

60 第三是实行租赁制、租让制和私营工商业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他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有监督的和社会化的东西，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东西，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一步。根据俄当时的实际情况，列宁拟定了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代购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政府把不宜由国家管理的企业租让给合作社、联合体或私人；把一部分国家暂时无力经营和不便经营的国有企业或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实行了代购代销制，把资本家当作商人吸引过来，由他们来推销国家货物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

第四是废除义务劳动制度和实物供应分配体制，实行新的劳动和薪酬分配体制。1921年春，苏联开始解除企业的军事管制状态。4月6日，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简化职工从一个企业转入另一个企业的法令》，允许职工自由选择工作岗位。同年10月，劳动国防委员会宣布取消对特种专家和特种职业的一切动员令。于是，战时共产主义的一整套劳动强制制度已

经几乎完全被废除。分配制度也相应地作出了很大变革。职工的劳动报酬差距逐渐拉大，除给职工发放工资外，还对优秀员工发放额外奖励。工资级差迅速拉开档次。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1920年，工人的平均产出率只相当于1913年的20%，到1926~1927年度，劳动生产率已经基本达到了战前水平。

但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八年间，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革呢？整个社会有没有形成起与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发展模式呢？这一系列的问题构成了对新经济政策进行制度分析的突破口。

在政治领域，从1921年至1929年春的这八年期间，残酷而激烈的党内斗争严重地损害了党内民主，在经过短暂的纷争后政治权力趋于高度集中。苏联社会基本上没有形成起与新经济政策的相对分散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列宁在世时，他总能够率先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原则，国家的政治生活尚能较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在列宁的带领下，党内民主的风气得到了发扬。显然，这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必备的政治环境。列宁逝世后，尽管苏联仍然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党内残酷的派别斗争已经严重损害了民主原则。在后来的几年间，先是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了政治斗争，接着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政治斗争，再接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进行了政治斗争，最后是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等人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政治斗争。在各个反对派都被彻底打败后，党内形成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党的权力逐渐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集中，党的民主决策、监督机制受到

很大的损害。党和国家的干部的民主选举制也为任命制所代替。许多重要决策不再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全国代表大会的讨论，而是由斯大林及其亲信做出。个人崇拜之风正悄悄兴起。这样，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相对分散的多元化经济体制时，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但没有相应地扩大民主，形成起能够为新经济政策保驾护航的政治体制，反而形成了制约新经济政策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必须提及，尽管列宁晚年提出一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他批判了官僚主义，要求真正建立起民主监督机制，这些思想显然与新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但这些设想并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尽管列宁的确提出了这些民主设想，整个社会生活却没有表现出发扬民主的景象。

在思想文化领域，频繁的政治斗争总是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八年间，苏联的思想文化领域不但没能形成起与多元化经济相适应的民主的、繁荣的文化体制，反而到处弥漫着党派斗争的硝烟。列宁逝世后，党内接连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核心是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新经济政策的前途命运。因此，尽管在这期间，苏联的思想文化领域曾经表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但这种活跃不是围绕新经济政策进行的理论探讨，而是斗争各方围绕本身利益去阐发各自的政治主张。这种景象不是思想文化的繁荣，而是思想文化的纷争。各派不是围绕如何更好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去争论，围绕如何在经济变革的同时进行合理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变革的问题去争论，围绕如何对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进行全面阐发的问题去争论。这些对于新经济政策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各派进行理论斗争出发点是不同的，有的要求抛弃新经济政策，有的则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于是，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

多半停留在列宁提出的“暂时的退却”的水平。这种认识内在地包含有另一层含义，即在不久的将来，还要停止“退却”，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实现新的“反攻”。因此，新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得到思想文化上的全面认同，反而始终被认为是一种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不相融的异己。这对新经济政策的长期实行是非常不利的。

总体上看，尽管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成就，但它的实行主要是停留在经济领域，国家并没有围绕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进行适当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因此，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没有形成起与新经济政策相对分散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主形式，反而表现出权力越来越高度集中的特点。高度集中的权力很容易滋生决策单向化、民主风气丧失和监督机制瘫痪的弊病，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准则随时都可能被抛弃。所以，新经济政策没有形成起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协调互动的格局。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表现出了经济基础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断裂的制度缺陷。

没有政治和文化为之护航的经济行为是不稳健的。新经济政策不但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它无力处理各种突发的社会危机，而且不能抗拒各种要求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政治要求。所以，在粮食收购危机爆发后，联共（布）党人根本就未能在新经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找到解决方案。当斯大林发起“自上而下的革命”，要求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布哈林等主张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人群表现得束手无策。新经济政策根本就无力抗击这种针对自身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脆弱性，决定了它很快就被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式代替的历史命运。

（二）斯大林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创新

既然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存在制度缺陷，它无法平息社会危机，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要求。所以，社会主义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于是斯大林模式应运而生。人们可以用很多概念，比如“自上而下的革命”、“社会变革”、“战时共产主义的复活”等等来表述这一过程，但其基本含义都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从新经济政策向斯大林模式转变，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制度变迁。而且这场制度变迁是由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领导发起的制度创新。

64 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就必须如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不断地进行自我创新。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经得住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的考验，才能保存其最基本的生产关系，也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最终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这其实就是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应该不断改革的论述的全部含义。^①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制度创新的时机和如何选择制度创新的途径。如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定实践形式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执政党依然故我地坚持实行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最终有可能贻误制度创新的时机，导致社会主义的损失。反之，如果执政党能够抓住时机，积极地响应社会现实的

^① 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要求，主动领导进行制度实践形式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则可能在制度创新中获得新的活力和生机。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核心意义。如果执政党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制度的潜能，能够适应和容纳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那么它所领导的社会制度才可能克服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和僵硬性，才能够容纳科技革命创造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一定的社会制度如果具有较好的开放性，能够合理地变革具体的实践形式，就可能满足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避免被另一种不同质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从本书的研究角度看，每一种社会主义模式都包含有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和它自身的个性。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斯大林模式都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因而它们都具有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又分别具有自身的个性。所以，斯大林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对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形式进行了变革而已。扬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旧的实践形式，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根本含义。后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时，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其典型形式）进行变革，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邓小平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变革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的改革思路，其实质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① 这种比较说明一个事实：当

^① 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参阅《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今世界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行为与昔日斯大林模式替代新经济政策的行为一样，两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如果把斯大林模式的诞生放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考察，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到清楚的揭示。尽管斯大林模式目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但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却以最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式的形象登临人间。那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大胆地进行变革，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创建了斯大林模式，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由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

所谓由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主动发起的制度创新，是相对于由民间力量自发地倡导进行的制度创新而言的。在制度经济学上，这二者被认为是制度变迁的两种模型，分别被称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和需求诱发型制度变迁。^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由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主动发起的制度创新，其实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生强烈的反作用的表现。当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模式，遇到社会危机的严峻挑战时，联共（布）中央发生分裂，胜利的一方——斯大林及其支持者，确信新经济政策已经不能再为社会主义“服务”时，他们果断地“抛弃”它，发起了规模宏大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在这个过程中，联共（布）和中央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发起全盘集体化，制定并实行指令性国民经济计划，缔造强大的中央集权，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为中央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行为保驾护航。这

^① 参阅柳新元著：《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道格拉斯·诺思著：《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其中充满了由国家干预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含义。联共（布）和中央政府的一系列的强制行为，使新经济政策在短短时间内灰飞湮灭，斯大林模式在新经济政策的废墟上迅速建立了起来。在阐发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时，现代制度经济学罗列的大量书卷味十足的“话语”，在斯大林模式的诞生这一历史事实面前显得贫乏无力。斯大林模式替代新经济政策的全过程无比充分地展示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强制进行制度创新所具有的强大能量。

列宁在评价新经济政策时曾说：“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①依据这一思路，人们也可以说，斯大林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但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制度变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没有改变，但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践形式却发生了革命。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2页。

第二章 斯大林模式的理念

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斯大林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许多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呼应的理论，我们统称之为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产生于实践并对实践产生了巨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和实行就是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付之实践的结果。在“导论”中，我们提出，“斯大林模式的理念”指的就是斯大林模式得以建构和实行的指导思想，它同时还是保卫斯大林模式和抵制任何摒弃斯大林模式的行为的思想体系。在当时，指导苏联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发起“自上而下的革命”、创建和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理论主要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所以，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看作斯大林模式的理念是基本恰当的。假如将斯大林模式看作一个活的社会有机体，那么关于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就是对这个社会有机体的灵魂——斯大林模式的理念剖析。

一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先后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斗争就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沿。论争中，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设想，形成了较完整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这一理论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前途和命运作出的总体性把握，它是苏联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战略的总指导思想，也是苏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变革和消灭剥削阶级的基本理论动因。

（一）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

1. 论争的背景及论争各方的主要观点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俄共（布）[1925年12月以后改名为联共（布）]中央失去了权威的核心，党内高层领导开始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恰恰在这个时候，国内外形势又迫使党的领导人对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认识。因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论争遂成为权力争夺的一次重要交锋。

从世界范围看，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渡过了战后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西欧资产阶级政权再度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此时，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非常渺茫，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获得了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而且能够调整之间的关系共同对付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苏联。于是，苏联不但得不到西欧无产阶级

革命胜利的支持，而且还将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面对这一形势，苏联国内许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在得不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提供的物质支持的前提下，在落后的苏联是很难建成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悲观情绪的影响下，一些人对建设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求苏联转而将主要精力用于策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

在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数年后，国民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并开始获得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包括城乡劳动人口失业、工业化资金来源和城乡资产阶级的形成等。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允许企业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办法，依据国家法令，企业有权辞退多余的职工。因此，广大城市和农村在开始出现一批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者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失业者。在当时人们看来，这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由于存在着实际上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民在获得一定的积蓄后，不愿意低价出售粮食，国家没有粮食可用于出口换取工业化启动设备，工业化的进展比较缓慢。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富农势力的发展，则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的担忧和对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见解，将形成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俄共（布）高层领导亟需对之作出能统一指导全党的认识。

70

然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俄共（布）高层领导人，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在认识上存在着巨大分歧。他们对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见解是不同的。

托洛茨基认为，如果欧洲几个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苏联一国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1922年，在《1905年》一书的序言和《和平纲领》小册子的

跋中，托洛茨基就对苏联能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做了论述。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不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前，那些协助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就会同它发生“敌对的冲突”，因此，“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①在他看来：“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②托洛茨基甚至还宣称，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提供的国际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季诺维也夫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单凭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1925年9月，季诺维也夫在其新著《列宁主义》一书中写道：“应当区别两种东西：（1）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保障的可能性——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可能性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自然是可以想象的；（2）最终建成和巩固社会主义，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完成向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即高级阶段过渡——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这种最终胜利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有待解决。”^③季诺维也夫

71

① 《托洛茨基言论》（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7页。

② 《托洛茨基言论》（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02页。

③ 季诺维也夫著：《列宁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如此含糊的认识，其实是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表示了怀疑。在驳斥斯大林时，季诺维也夫甚至宣称，承认苏联一国一定能建成社会主义是“民族狭隘性”的表现。按照季诺维也夫的看法，苏联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能否“最终建成和巩固社会主义”却是一个未知之数。

斯大林认为，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1924年12月，斯大林撰写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首次区分了落后国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一国取得最终胜利的问题。他认为，关于前一个问题，苏联依靠自身力量就能够解决；关于后一个问题，则必须依靠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共同努力。1925年1月，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说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要得到免除复辟的完全保障，就只有通过‘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①1925年4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文中指出，俄国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能够用自身的力量解决，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建成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俄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要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他认为，前者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后者是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的问题，即没有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免除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后的胜利。他说：“社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7页。

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持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①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苏联一国无产阶级就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②

2. 论争的简要过程

第一阶段：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等人的论争。

在列宁病重期间，自1923年10月起托洛茨基即率先发起党内争论。他纠集了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分子联名向党提出其政纲，声言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普遍的经济危机。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的分裂活动更加嚣张。在1924年4月出版的《论列宁》和1924年9月出版的《十月的教训》两本小册子中，托洛茨基开始对列宁主义进行歪曲。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这些活动作了有力的批驳。1924年4月，斯大林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随后又相继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著作。在系统阐发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谬论展开了批驳。斯大林指出，按照托洛茨基的谬论，如果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迟迟不能发生，那将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只有一个前途，即苏维埃

73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4页。

^② 由于行文安排的需要，这一小节只是对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作提纲挈领的概述，下文将对之作出详细的论述。

政权只有在同农民的矛盾中“苟延残喘”或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在斯大林看来，托洛茨基之所以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之所以不相信苏联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根源不仅在于他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力量，而且还在于他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本领”。

鉴于托洛茨基的错误行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5年1月26日通过决议，解除了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会主席的职务。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论争，随着托洛茨基在此次权力斗争中的败北而暂告一个段落。

第二阶段：季诺维也夫等人斯大林等人的论争。

1925年，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发生了激烈斗争。在列宁格勒代表们的支持下，季诺维也夫作了大会的副报告。报告中，季诺维也夫重申了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关于苏联一国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却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调。他说：“我们真正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无可争辩并且由我们经济发展的全部进程所证明了的。我们只是说，能不能够在一个国家中，并且不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而是在我们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最后在国际范围内完成”。^①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季诺维也夫非常有针对性地宣称，承认苏联一国一定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民族狭隘性”的表现。^②显然，季诺维也夫悄悄地对斯大林发起了政治

① 《真理报》第293号，1925年12月23日。

② 《真理报》第297号，1925年12月30日。

攻势。

在斯大林等人的努力下，大会终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大会的决议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作了尖锐的批评，把他们的观点确定为“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曲解列宁主义”。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对党中央投了不信任票，声称不服从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会后，斯大林又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批驳。在新撰写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著作中，斯大林指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说法不过是重复列宁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①而季诺维也夫却竟然指责这种论调是“民族狭隘性”的表现，这就是对列宁的背离，是采取了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观点，是认为苏联因技术落后而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斯大林还进一步反问道：“如果我们不打算建成社会主义，那我们在1917年10月夺取政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些反问非常有力，它使对手处于一个异常尴尬的处境，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仍是联共（布）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十月革命的否定或者持有孟什维克的观点，都是与其领导身份完全相悖的。

随着政治斗争的进展，1926年2月12日，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的职务。季诺维也夫关于一国不

75

^①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多篇著作中曾反复提到，虽然苏俄的经济非常落后，但建成社会主义仍是可能的。在《论合作社》文中，列宁明确指出，由于国家已经掌握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同农民已经结成了联盟，所以苏维埃国家已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随之失去了主要的宣传阵地。

第三阶段：托—季联合反对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论争。

从1926年春至1927年12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的“新反对派”与托洛茨基派联合形成托—季联合反对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继续进行争论。

虽然遭到多数党员的谴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并不愿意接受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竟然不顾党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开始与托洛茨基和解，妄图联合两派的力量，与党中央对抗。由于理论观点比较接近，尤其是出于攻击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共同要求，两派很容易地结成了联盟。1926年春开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开始与托洛茨基进行接触。加米涅夫在与托洛茨基会晤时，甚至说过，只要你和季诺维也夫登上同一个讲台就行了，党会认为这是真正的中央委员会。两派终于走向联合，4月6~9日间，托—季联合反对派开始正式出现。7月14~23日，托—季“联合反对派”发表了《十二人声明》，对当时党内外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进行了攻击。

76

他们的这一活动随即遭到大多数党员的反对，在强大的压力下，1926年10月16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6名中央委员不得不发表《六人声明》，承认他们犯了“超出党的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范围而走上派别活动道路”^①的错误。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经过严酷的政治斗争之后，托—季联合反对派承认犯了派别活动的

^① 《真理报》第240号，1926年10月17日。

错误，但依然表示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1926年10月23日，联共（布）召开了中央和中监委联席全会，对托一季“联合反对派”作了组织处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分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季诺维也夫则被解除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至此，联合反对派在党内已经基本丧失了影响力。

第四阶段：反对派的反扑和斯大林的完胜。

1926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召开，托洛茨基企图在会上作出反扑，指责斯大林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陷入了严重的理论上和历史上的错误”^①。加米涅夫附和托洛茨基说：“列宁关于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写的话显然是针对西欧国家而言的”。^②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大量论述，驳斥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这些论调，同时指出，加米涅夫这样做的目的用意在于使托洛茨基便于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就是使托洛茨基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便于反对列宁主义。

托一季联合反对派不甘心失败，仍继续进行反对中央的分裂活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不得不采取组织措施，严加处理。1927年5月26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83名共产党员联名给中央写信，即《八十三人声明》，对党中央的内外政策作了批评。7月29日至8月9日，联共（布）中央和中监委召开联席全会，给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最后严重警告处分。9月3日，托一季“联合反对派”又提出了《反对派政纲》，要求印发全党讨论。11月14日，联共（布）召开了中

① 《真理报》第257号，1926年11月6日。

② 《真理报》第256号，1926年11月5日。

央和中监委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开除出党。至此，联共（布）党内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全部结束。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终于成为全党普遍接受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二）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争论中，斯大林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解不断深入，最终形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斯大林曾经对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作过明确的论述。他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持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① 这一理论是号召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总动员令，不仅具有强大震撼力，而且包含有丰富的内容。

78

第一，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问题区分为国内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和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分别探讨了问题的性质。关于国内问题，斯大林认为，当时苏联国内存在着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斯大林看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虽然也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价格差异和税收的矛盾，但是，这两大阶级都是劳动者，他们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即消灭剥削阶级，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的。因而，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共同利益肯定会超过他们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将运用工农联盟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4页。

粉碎俄国资产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新社会。关于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会有武装干涉的危险；在国际范围内，只有通过若干国家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或者更好是在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够免除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这一划分是斯大林进一步区分社会主义“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两个不同任务的理论基础。

第二，区分社会主义“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的差别，明确提出了单凭苏联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既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国内问题，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可以在国内通过建立工农联盟的办法得到解决。所以，单在苏联一国就能够达到消灭剥削阶级和建立没有阶级的新社会的目标。而且在斯大林看来，因为俄国有过而且发展过帝国主义，有一定数量的大工业，有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有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完全具备建成这个社会“所必须而且足够的一切”，“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持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①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则明确指出：“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指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② 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斯大林认为，如果没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

79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4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页。

辟的可能性就仍然存在，那么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也就仍然不可能实现。换言之，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以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

第三，阐明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和任务。在斯大林看来，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一个是政治基础，一个是经济基础。在当时，苏联已经建立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具备了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所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了建成社会主义，苏联就必须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工农业经济体系，使苏联具有生产机器和设备的能力，不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① 这些任务将由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去完成。在政治建设方面，苏联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基础，无产阶级政权今后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经济建设；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残余，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防止外国的武装干涉和颠覆活动等。完成这些政治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前提。斯大林用这样的一句话作了概括，他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

80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页。

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①

第四，指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方向，坚定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在当时，鉴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和国内面临的现代化困难，许多人产生了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困惑，甚至对于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走向都产生了疑问。受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影响，有些人还产生了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念头。这对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害的。如果革命群众放弃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转而集中精力于发起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这必将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危机，使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倒退。在此形势下，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提出，无疑是一颗稳定民心的“定心丸”，既坚定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又阐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前途。它直观地告诉人们：苏联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在苏联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完全可以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对于坚定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前提下，人民群众才有可能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就等于认为在苏联一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是毫无前途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一事无成。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不知道为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②

81

^{①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511、389 页。

(三)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是与非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与当时苏联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这一理论不仅是对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而且是对之作出了重大发展。因为列宁生前虽然曾作出了苏维埃国家已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的论述，但这一论断并未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全党的认可。列宁逝世后，人们在失去领袖的惶惑中再度面临国内外社会危机时，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疑问再度滋生并蔓延开来了，群众的革命热情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衰颓情绪。此时，斯大林浓墨重彩地重提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并将其丰富发展为系统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对社会现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引导作用。总体上看，这一理论虽然具有一些缺陷，但它却是指引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迈进的政治纲领。因此，对这一理论的评价，不能囿于逻辑严整性的探究，而应该到实践中去探求。下述将从四个方面评析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82 第一，这一理论的提出，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找到了现实的基石，为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找到了目标和动力。在欧洲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纷纷处于低潮时，否定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实质上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政权继续留存的合理性。试想，如果否认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谁又能全心全意地去做一件注定是无法成功的事情呢？失去了目标的革命必然要在迷茫中衰败。所以，对于现存的孤立的社会主义政权来说，它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存在合理性的论据。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就是这个论据，别无其他选

择。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苏联的现代化不仅需要上文提及的中央政权的组织能力，而且需要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方向。在当时人们的理解中，社会主义所意味着的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民主”，因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提出，就是对现代化目标的一种表述，就是提倡在苏联建成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第二，这一理论的诞生是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斯大林在驳斥托洛茨基时说过，按照托洛茨基的谬论，如果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迟迟不能发生，那将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只有一个前途，即苏维埃政权只有在同农民的矛盾中“苟延残喘”或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这一论断很好地从侧面揭示了苏联当时的困难处境。事实上，那时联共（布）党人如果不敢于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否认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那么在面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低潮和国内社会危机时，困惑和迷茫就可能断送苏联社会主义，就会使社会主义“连根腐烂”。所以，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提出，适逢其时地满足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只是实现现代化万里长征的起点而已，现代化的主要参数如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等都尚处在起步阶段。此时，现代化需要的首先就是形成一个能够凝集全国、全民族力量的中央政权，由它去组织社会生产和生活，带领群众进行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建设。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满足了现代化的要求，它肯定了无产阶级政权领导人民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反之，关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调则明显否认了无产阶级政权的这一能力。所以，在国家急需发展，在人民饱受战争和贫穷的苦难，在社会积蓄了足够的现代化张力时，现代化的客

观需要把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第三，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现实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都主张社会主义的胜利至少是要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进行。在研究俄国问题时，他们认为，如果俄国革命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话，两者将相互补充，俄国由此可以越过“卡夫丁峡谷”，进入更高的社会形态。^①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没有作出一国能够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的。列宁虽然提出了一个国家内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②但他并没有对此作出系统分析，更没有对一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探讨。就是说，在斯大林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对苏联一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系统的论述。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提出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它是斯大林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去分析社会形势，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理论的提出，指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发挥和合理运用。

第四，必须看到，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论有着一些理论缺陷。比如，斯大林并未对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作过明确的规定，使社会主义是否建成的问题失去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衡量标准；他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变革、社会主义工农业经济体系的形成和资产阶级的灭亡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成的条件，没

^① 参阅拙文：《晚年马克思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道路设想的真正含义及其合理启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明确指出，由于国家已经掌握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同农民已经结成了联盟，所以苏维埃国家已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有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分析。这些缺陷表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在逻辑严整性上存在着一些不足。

马克思说的好：“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 理论只有满足时代的要求才能为时代所接受，理论只要满足时代的要求就能够对时代发生积极作用。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就是如此。尽管它存在着不足，但它满足了时代的要求，所以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性、核心、发展速度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作过许多论述。这些论述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它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重大作用。

（一）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

列宁生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他总是把现代化大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② 但是列宁在世时，经济仍然处在恢复阶段，组织实施工业化的时机仍未成

85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② 1922年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参阅《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熟，他也就没有对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和如何处理工业化资金来源以及农业与重工业、轻工业的关系等问题作出明确的分析。列宁逝世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到1925年苏联经济已经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工业化的任务迫切地摆在联共（布）党人眼前，实践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理论要求。在1925年12月召开的十四大上，联共（布）党内对工业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取得了共识，但是关于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和发展速度等问题则存在分歧。党内高层领导人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首先在布哈林、斯大林等人与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之间展开。1925年12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倾反对派在十四大上提出了“超工业化论”，他们把高速发展工业同战胜资本主义的重大政治任务联系在一起，要求坚决地再分配国民收入，保障工业化的高速度。^①关于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托洛茨基等人认为，“资金的基本源泉就是正确利用预算、信贷和价格的办法再分配国民收入”，国家财政应大力支持工业，对私营企业和富裕农民征收超额税，用大量出口粮食的办法，换取国外的工业原料和设备。^②时任党中央书记和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托洛茨基的有力支持者。1926年，他出版了《新经济学》一书，较完整地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在苏联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只有迅速实现工业化，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

86

^① 参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9页；《“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30、286页。

^② 《托洛茨基言论》（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89页。

义，而且由于苏联相对弱小的工业承担不了积累资金的重担，在不可能通过掠夺殖民地的途径积累资金的情况下，苏联只有通过行政的手段从农民身上获得工业化的资金。^① 布哈林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一论调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是“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工农关系和工农业关系，是“孤立地看待社会主义工业，而不是把它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在布哈林看来，如果通过掠夺农民的方式积累工业化资金，最终将会“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和破产”。^② 此时，斯大林在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上赞同布哈林的看法。他认为，“左”倾反对派提倡的掠夺农民积累工业化资金的做法将会“瓦解城乡结合，破坏工农联盟，从而摧毁真正工业化的任何可能性。”^③ 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的来源是国有工业的利润、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和财政预算。^④ 由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倾反对派很快在党内斗争中败北，这次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就以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胜利告终。

关于工业化问题的第二次争论是在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发生的。在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论时，斯大林与布哈林关于工业化问题上认识是比较接近的，但在粮食收购危机爆发后，斯大林逐渐根据新的社会形势转变认识，形成了与布哈林不同的见解。1928年1月，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爆发不是粮食欠收，而是由于富农的捣乱破坏，于是认为实施农业集体化方针是保障国家从农业获得工业化资金的必要措

①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新经济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6、78页。

② 参阅《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226、240页。

③④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8、115~116页。

施。在他看来，为了继续对农民征收“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使国家不必再反复面对粮食收购的危机，就必须实行农业集体化。就是说，在面对广大农村的社会动荡和工业化进展困难的双重危机时，斯大林果断地提倡从农业积累资金以高速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布哈林却不顾形势的变化依然固守原有认识，认为即使工业化发展速度慢如“蜗步”也决不能掠夺农民。1928年9月，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指责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是回到了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论的老路。11月，斯大林发表《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右倾》一文，反驳布哈林的论调。1929年，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与布哈林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党内理论和组织斗争。是年11月，布哈林作为“反对派的主要先锋”被撤消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斯大林关于工业化方针的主张遂成为指导全党工业化工作的惟一正确理论。

（二）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包括有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性、核心、速度和资金来源等内容。

88

第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苏联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确定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联共（布）十四大上，斯大林指出，党的总路线的实质是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他说：“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① 这等于是把工业化当作联共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

(布)这一时期内的工作核心。

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工业化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实现工业化是苏联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免于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的重要保障。他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至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他认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出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①因此，苏联要避免隶属于世界资本的命运，就一定要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认识，认为实现工业化，把苏联建成工业国乃是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在他看来，如果苏联没有实现工业化，仍然是一个农业国，那根本上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

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性的肯定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实现工业化，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就很难保存。这不仅得到了后来的社会实践的证实，而且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即使是像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士，对此也是尚且不敢否定的。戈尔巴乔夫说道：“当时不加紧工业化是不行的。从1933年起法西斯的威胁就在迅速增大。——我国人民用他们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实力粉碎了法西斯。要是没有工业化，我们面对法西斯就会手无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3页。

寸铁。”^①

第二，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

1926年以前，在新经济政策进展比较顺利，国内外形势比较缓和时，斯大林曾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反对过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超速工业化主张。但是，在国内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国际上又掀起了新的反苏浪潮时，^②斯大林果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肯定了高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作为“红色孤岛”的领导人，斯大林的这一转变是面对生存危机时不得不作出的反应。对此，后人不应过多地指责其认识的前后不一致，而应看到斯大林依据现实条件转变认识的精神，应看到这种新认识的高度战略意义。

斯大林关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主张与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点是密切相关的。正是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斯大林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看法。在斯大林看来，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道路，只有等候轻工业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足够的利润后，才可能发展重工业。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则有可能利用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资本主义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同时，由于苏联处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面对资本主义的包围和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战争，为了使苏联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斯大林毅然选择了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他指出：“迅速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

^① 戈尔巴乔夫著：《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② 参阅本书第一章“斯大林模式的成因”。

关键。”^①

在斯大林看来，工业化的速度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存亡，只有快速实现工业化苏联才能继续生存。他认为，如果我们的工业和技术像德国那样发达，如果我们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可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去实现工业化的。可惜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此，工业化速度是事关苏联生死存亡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或者是我们被压垮。斯大林甚至把高速度看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又一特点和优点。在制定和贯彻前三个五年计划时，他始终把高速度摆在重要位置。1933年1月，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斯大林说：“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最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②在提倡高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斯大林还对各种有关放慢工业化速度的论调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指出：“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③

第三，工业化的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当时，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核心。在他看来，重工业乃是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其他各个行业的发展，才能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

斯大林清醒地看到了重工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把重工业的发展看成是苏联社会主义全部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重工业主要是指燃料、金属和机器制造业，它对于国家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7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40页。

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国家经济独立自主的前提。斯大林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只有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才是“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①“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改造并振兴全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②1925年5月，斯大林指出，金属工业是全部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③1926年4月，他说：“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④1933年，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指出：“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就是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实现五年计划必须从重工业着手。”^⑤1946年2月，在回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主要工作时，斯大林仍然把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看成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总之，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保证了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所需要的设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⑥

92

斯大林还从备战的角度论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他多次提到，为了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苏联一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他清楚地看到，由于优先发展轻工业的道路经常要经过上百年才能实现工业化，这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2~113页。

②⑤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0、160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10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62~463页。

⑥ 参阅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51页。

中的苏联是完全不适合的，因此，苏联为了在异常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巩固的国防。他指出：“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① 这一认识后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依赖的物质武器恰好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所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国防工业。这一理论还很好地印证了列宁关于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意义的论述。列宁说过：“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的情况的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②

基于上述认识，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他看来，“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③ 这一论述直接引导苏联走上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第四，必须从国内积累工业化资金。

工业化的启动需要巨额的资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业化的资金一般都是来源于国外的，有的是通过掠夺殖民地，有的是通过获取战败国的赔款，有的是通过出让经营权而获得的。然而，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苏联来

^{①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6、49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说，这些途径基本上都是不存在的。在快速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工业化资金的来源问题就显得更为严峻。对此，斯大林独辟蹊径，作出了一个能自圆其说的解答。

首先，在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来源与资本主义的差别的基础上，斯大林认为，苏联工业化资金必须来源于内部积累。在1926年党中央召开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指出，苏联工业化的资金来源既不能像英国那样靠掠夺殖民地收集追加的资本，也不能像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索取赔偿加速“工业化”，更不能像沙俄那样，在受奴役的条件下获得外国贷款走上工业化的道路。^①于是，他认为，苏联只有依靠本国的节约发展工业，走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在他看来，剥夺地主和资本家，废除沙皇外债，国有的工业、国有化的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以及银行系统提供的利润等等，都是内部积累的来源。1927年3月1日，在斯大林铁路工厂的工人大会上，斯大林又指出：“我们不靠外来的援助，正在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靠自己积累的道路。”^②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了斯大林对工业化资金来源的看法。

94

其次，斯大林认为，让农民交纳额外税是从内部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主要途径。斯大林曾经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途径作过分析。他认为，苏联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途径有7种。它们分别是：（1）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剥夺过来的土地和工厂已经成为全民的财产，其所创造的利润；（2）旧沙俄债务的废除使苏联免于交付利息的负担；（3）国有化工业经营创造

^① 参阅《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4~115页。

^②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13页。

的利润；(4) 国有化对外贸易创造的若干利润；(5) 国内贸易提供的利润；(6) 国有银行系统提供的利润；(7) 利用国家政权从整个国民经济获取一定的资金。^① 在这几种积累途径中，第二种途径其实是不可能获得资金的，只不过是减轻负担；第三种途径是第一种途径延伸出来的；其他几种途径都是要依赖于低价征购粮食和向国外出口粮食才能实现的。而要低价征购到大量粮食，就必须依赖于上述的第七种途径。因此，在这七种途径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七种，即从农业获得资金。斯大林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贡税论其实就是要通过暂时牺牲农业的方式积累工业化资金。^② 他认为，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③ 让农民交纳类似“贡税”的东西从而获得一定的工业化资金的办法，虽然是给农民增加了经济负担，但却是农民能够忍受的负担；而且它还是一种临时的措施，在实施后的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将加以取消。

概言之，斯大林认为苏联工业化资金的积累主要来源于内部积累，而内部积累的办法又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办法让农民交纳一定的额外税。这种办法被亚·鲍文称为是资源从农村输往城市的办法。^④ 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这其实是联共（布）为了保存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权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尽

① 参阅《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6页。

② 斯大林认为，向农民征收“一种额外税”，“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而不得不“暂时征收”的。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页。

③ 简单说，所谓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指的就是农民在向国家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外，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价格高多付一些钱，在出售农产品时则少得一些钱。

④ 亚·鲍文著：《改革：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况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载《别无选择》，第729~730页。

管它暂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却有效地解决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的积累难题。

（三）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是非评析

理论产生于实践，又能对实践产生反作用。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是当时苏联社会实践的产物，它基本上符合了当时的历史要求，发挥了重大作用。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是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尽管它带有一些缺陷，但它对于推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首先，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它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如前所述，苏俄诞生后长期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它的生存时刻受到国内外反抗势力的威胁。在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国际环境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到新经济政策实行的中后期，苏联再度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危机。此时，长期以来即已形成的生存危机意识完全激化出来，社会上普遍弥漫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情绪，快速实现工业化成了社会的普遍选择。这时候，恰好新经济政策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社会具有了实施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因此，在国内外危机激化的形势下，当“退却”基本结束，“进攻”的号角再度吹起时，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就必然应运而生。可以说，在那时，斯大林拥有的政治权威是其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的动力，而后者则是前者得以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正因为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理论和其他理

论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历史才选择了斯大林。

其次，这一理论为苏联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列宁生前在与第二国际庸俗理论家争论时，曾经明确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比较成熟时落后国家，可以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再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物质文化水平的著名论断。当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水平首先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列宁指出：“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会灭亡，而不能成其为独立国家。”^①那么，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水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呢？这些问题在列宁的时代并未被实践具体地提出来，列宁也不可能对此作出具体的回答。历史的重任留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必要性、重心、速度和资金来源的论述，就是对工业化的一揽子问题作出的自成系统的解答，这一理论的实践成就反过来印证了其内在的合理性。列宁提出了落后国家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再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物质文化水平的理论，斯大林则用行动实践了这一理论。

再次，为落后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工业化途径，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样板，工业化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内容，只有在启动工业化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推进城市化，促进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促进文化科技水平的发展，实现人的自我意识的革新，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才能真正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本身也就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发展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为苏联现代化积累最必备的物质成就，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化的进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①因此，作为一种在落后国家发起现代化的途径，斯大林提倡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推进整个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迅速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使国家很快就赶超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令整个世界为之振动的事件。由此，斯大林的工业化战略也成为一种有效的“后发先进”工业化战略，它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提供了样板，它不仅为落后国家提供现实借鉴，而且给予落后国家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以榜样的精神力量。赶超战略由此在全世界普遍绽放出璀璨之花，民族解放运动的志士和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者都设想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去实施赶超型现代化战略。

最后，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本身是有着明显缺陷的。其一，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存在着一些裂痕。在与布哈林争论时，斯大林放弃了原本与布哈林基本一致的观点，转而提出与“左”倾反对派相似的高速工业化战略，这虽然是符合时代要求作出了转变，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对这一转变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这使他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凭空增添一个断裂感，因为他前后的两种主张几乎是迥异的。理论为了说服人，就必须具备首尾一致的逻辑严整性。其二，斯大林在要求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牺牲而交纳“贡税”时，没有用理论系统地去说服农民。尽管斯大林认为农业集体化将使农业“一日千里地推进”，但在农民未看到农业大发展的事实前，要让农民交纳“贡税”，为国家工业化作出牺牲，就应该用令人信服的理论去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然而，

^① 本书第四章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作了专门论述。

斯大林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苏联在强行从农业积累工业化资金时，遇到了许多农民的激烈反抗。其三，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存在着不够严密的地方。在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后，斯大林曾多次提到苏联已经建成了工业国，实现了工业化，但他的认识存在着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①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就是未对实现工业化的标准和建成工业国的标准作出准确界定。他提倡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再全面带动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但并未对重工业应该占有的比例作出分析，未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程度作出适当的规划。事实上，斯大林如果能够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工农业和重轻工业的比例，并且能够对重工业发展的量和质作出必要分析的话，苏联工业化的成就将是更加巨大的。

三 农业集体化理论

农业集体化理论是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它包括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积极作用及性质等内容。这一理论就是斯大林领导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根据，它对于推

^① 1932年1月，在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时，斯大林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48%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年）末的70%”。这等于说，在1932年苏联即已成为工业国。但是，1946年2月，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的选民人会上，针对苏联由落后国家变成先进国家，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事实，斯大林却又指出，“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他还说：“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可见，上述斯大林关于建成工业国的标准存在一些模糊，一会儿说用四年时间建成工业国，一会儿又说用十三年时间建成工业国。

进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本身存在着许多缺陷。

（一）斯大林与布哈林等人关于农村问题的争论

如前所述，从1928年起，斯大林与布哈林围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昔日的盟友变为势不两立的对手。斯大林与布哈林关于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争论，其实是一个整体，前者是争论涉及的重要问题，后者则是争论的焦点。

粮食收购危机是引发斯大林与布哈林争论的导火线。1927年，苏联的粮食收成增加，但由于农民在获得一定的积累后，不愿意再低价出售粮食，国家的粮食收购遭遇到巨大的困难，收购量从10月份起连续下降，到12月份降到最低点，出现了1.3亿普特的缺额。该年底至1928年春，苏联境内出现了严重缺粮的现象。这就是粮食收购危机。这场危机的爆发，不但拖了工业化的后腿，而且使城市和军队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讨论粮食征购问题，当时包括布哈林在内的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实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采用“非常措施”在全国强行征购粮食。^①但是，随着“非常措施”的执行，布哈林等人看到执行这一措施产生的严重后果后开始反对这一做法。布哈林与斯大林由此出现分歧。布哈林及其支持者认为，如果继续执行“非常措施”，就会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会动摇苏维埃政权的根基。他们据此反对农业集体化，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农业政策。相反，斯大林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是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对苏维埃发动的第一

^① 本书第一章对此有过专门论述。

次严重进攻”。鉴于执行“非常措施”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斯大林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改造小农经济，在农村发起集体化运动。农业集体化的做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放弃”新经济政策，停止“退却”，实现新的“进攻”。因此，斯大林与布哈林争论的核心其实是否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

这一次争论是在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 and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之间发生的。1928年4月，李可夫在四月会议上率先提出警告说，对富农的压制使他们缩减耕地，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①5月份，布哈林上书中央，表示不同意农业集体化方针，认为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农业器械去实行农业集体化。5月28日，斯大林发表《在粮食战线上》一文，指出农村问题的出路就是创建集体农庄，同时不点名地指出，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阶级——富农和工人阶级的理论，“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②1928年6月，联共（布）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布哈林在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支持下，宣读了一篇关于经济状况的长篇声明，警告工农联盟处于破裂边缘，要求为自由贸易和市场关系创造条件，要求提高和发展个体农民经济。

101

在1928年7月4日至12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与布哈林等人各自清楚地表述了关于农业问题的见解。斯大林在题为《论工业化和粮食政策》和《论工农结合和国营

^① 参阅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6页。

农场》的发言中提出了著名的“贡税”论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他认为，为了推进国家工业化就必须向农民征收额外税，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农村问题的出路就是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生产率，把小经济联合为一切形式的人经济和巩固并发展国营农场。^①布哈林则指出，粮食收购困难问题是由于不正确的政策和经济领导造成的，摆脱粮食困难的出路不是发展集体农庄，而是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托姆斯基赞同布哈林指出，党必须向农民让步以巩固工农联盟。布哈林还提出，斯大林的“贡税”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他认为，在苏联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把农民赶进公社。7月11日，斯大林发言指责“一部分”同志只字不提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主张，要加强工农联盟，“就必须同富农即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②

会后，双方的理论争论逐渐转变为组织斗争。在这次中央全会后，布哈林不是求助于友好协商和详尽讨论，而是错误地采取了新的行动，他竟然去拜会原托—季联合反对派的主要成员加米涅夫。布哈林向加米涅夫通报了中央全会的斗争情况，
102 “认为斯大林的路线总的来说是对革命的灾难。这条路线将会给我们带来毁灭”，^③“事实上，革命已在危险中”。他甚至表示自己已经同斯大林决裂，并谈到了撤换斯大林的问题，说他“是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可笑的是，加米涅夫对于布哈林并不信任，他只是消极地听取布哈林的陈述。1929年1月，这

^{①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6～161、164～170页。

^③ 《布哈林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23～324页。

场会晤的记要被托派印成传单，在莫斯科散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公开了党内高层的分歧。斯大林则于1928年10月19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委举行的联席全会上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讲话，第一次使用了“右倾”的提法，把布哈林的观点列入了“右倾”的范围。1928年1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右倾》的讲话，继续与布哈林开展斗争。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布哈林作了名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予以反击，他认为工人同农民的分裂“意味着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在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会晤的事情败露后，双方的斗争走向白热化。1929年1月30日，斯大林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点名指出，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团是“右倾投降主义集团”。1929年4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作了《论联共（布）党内右倾》的长篇讲话，指责布哈林走的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会后，布哈林被解除了《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职务。11月，布哈林被撤消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中央对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警告。11月26日，三人被迫在的《真理报》上刊登声明承认错误。

103

至此，斯大林与布哈林等人关于农村问题的争论宣告结束，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无可争议地成为指导全党农村工作的惟一指导理论。

（二）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斯大林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包括集体化的必要性、积

极作用和性质等内容，其核心是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概而言之，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包括有下列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104 第一，发起集体化运动，创建集体农庄是社会形势的现实要求。本来，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也曾设想在苏联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认为社会主义“要沿着逐步改善小业主的经济状况（而不是使他们限于贫困）的道路发展”。^①但是，形势的变化促使斯大林转变思路，他开始放弃这一设想，转而提出集体化的设想。前文提及，1928年和1929年，国家两度执行“非常措施”强行征粮的做法，在全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阶级仇恨。粮食征购的困难及其引起的严峻社会危机使新经济政策难以为继，国家肩负着制定新的农业政策的紧急任务。由于“非常措施”只是一种临时办法，它不是一种可以长期实行的政策，因此，国家只有寻找新的农业政策。关于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斯大林认为，其直接原因是富农对粮食的囤积，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由于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的经济，它创造的粮食商品率是极低的。因此，他认为，苏联农业的“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到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作制”，“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②斯大林于是认为，要摆脱农村工作的被动局面，要摆脱城市缺粮和国家工业化受阻的困境，就必须发起集体化，创建集体农庄。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能够替代新经济政策的新的农业政策就是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6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1页。

创建集体农庄。

第二，发起集体化运动，创建集体农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的观点，^②斯大林推论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③于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起与现代化大工业一致的，能够由国家进行统一计划的大型农业组织形式。新经济政策允许的小农生产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所以斯大林要求实现农业集体化。而且在斯大林看来，发起农业集体化运动也是对列宁有关思想的继承，因为列宁曾经说过，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今后还将迎来新的“进攻”。1929年底，斯大林就指出：“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因此，“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发起新的“进攻”。^④

第三，发起集体化运动，创建集体农庄将发挥三重积极作用，它不但可以解除粮食危机的威胁，推动工业化的发展，而且还可以促进农业的大发展。面对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斯大

105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32~233页。

林认为，集体经济可以采用机器、利用科学成就、使用化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生产更多的粮食，能够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也就可以使国家摆脱粮食危机的威胁。从促进工业化的发展的角度看，发起集体化，创建集体农庄后，国家不必再向小农和富农购买粮食，可以通过对农庄的管理直接获得必要的粮食。在集体农庄的严格管理下，庄员（农民）将不得不为国家交纳“额外税”，尽管这对他们是一种暂时的“牺牲”。因此，国家将可以顺利地从小农积累到大量的工业化资金。至于农业本身的发展，斯大林更是对创建集体农庄充满着美好的期望。他指出，农业集体化不仅将推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最终为备战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将使农业“一日千里地推进”。在这一看法的推动下，斯大林甚至设想：“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①从这三个角度看，斯大林号召发起集体化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顺利进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在政治上打击对手。

106

第四，消灭富农和小农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关于富农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当然不能让他们（指富农——笔者注）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②于是，联共（布）中央作出规定：“不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根据联合到集体农庄里来的贫农、中农、地方苏维埃作出决议，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使之成为不可分割的集体农庄基金。边远的、坏的土地分

^{①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8、150页。

配给富农，并把最凶恶的富农驱逐出境。”^①至于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斯大林以为，小农经济每天都在生产出资本主义分子，因此，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一定创建集体农庄，以实现消灭小农经济的目标。这其实是斯大林阶级理论与集体化理论的交叉结合点，体现着斯大林关于农业问题和阶级问题认识上的内在一致性。

第五，斯大林还对集体化的性质作了论断。1952年，斯大林在阐述苏联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时，提出了所谓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论”和“空地论”。“自上而下的革命论”讲的是农业集体化是由联共（布）中央发起的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空地论”讲的是“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②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对二三十年代苏联重大社会行为包括农业集体化行为的理论总结。斯大林的意思就是指，苏联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可以割断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由中央政府发起，凭空用行政干预的途径创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基本上就是斯大林对集体化运动的性质的理解。

（三）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是非评析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物，它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农业本身的发展却是不利的；它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但却存在着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违背的东西。

^① [苏]《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第5期，第31页。转引自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册，第542～543页。

首先，斯大林的集体化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从促进苏联平息当时的社会危机看，集体化理论的提出及其实践，使联共（布）告别了由粮食危机引起的岌岌可危处境，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巩固和加强，苏联社会主义再度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从促进工业化的发展的角度看，斯大林集体化理论的实践，使国家的粮食征购量逐年递增，^① 国家成功地获得了足够的粮食。这些粮食的一部分被用以出口换取工业设备，解决了工业化资金的积累问题，促进了苏联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的快速进展。从而使苏联用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赶上并超过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水平。斯大林曾设想集体化将起到使苏联解决粮食危机、促进工业化的进展和农业的人发展的三重积极作用，从历史事实看，其中的前两者是基本实现了。

其次，斯大林集体化理论的实践对农业本身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后果。在实践这一理论时，由于许多农民不理解，一些行政干部又存在着暴力倾向，全国农村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了劳动人口的大量减少，富农的被迁移或被消灭就直接导致了劳动力的减少。农民对集体化运动采取的破坏活动还造成了农业耕动力的损失，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产力。虽然苏联政府的粮食征购量逐年递增，但集体农庄创建后国家粮食的总产量却几乎是逐年减少的。资料揭示，1928年苏联

^① 有资料揭示，1928年苏联国家谷物总征购量为107.9百万公担，1929年这一数字是160.8百万公担，1930年一越而为221.4百万公担，1931年为228.3百万公担，1933年为236.6百万公担，1934年达到了269.6百万公担。与仍未实现全盘集体化的1928年相比，1934年谷物总征购量比1928年增加了161.7百万公担，增加了1倍多。参阅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

国家谷物生产总量为 733.2 百万公担，1929 年为 717.4 百万公担，1930 年增至 835.4 百万公担，1931 年降至 694.8 百万公担，1932 年是 698.7 百万公担，1933 年又降至 684 百万公担，1934 年则降至 676 百万公担。与仍未实现全盘集体化的 1928 年相比，1934 年谷物总产量比 1928 年净减 57.2 百万公担。^①就是说，斯大林关于集体化将促进苏联农业“一日千里地推进”的设想是没能实现的。^②针对集体化这种有助于工业化的发展，却有损于农业本身的发展的事实，亚·鲍文符合事实地指出：“与其说集体化变成了农村社会主义的改造手段，不如说变成了一种资源从农村输往城市的办法（类似一种贡赋）”。^③

最后，斯大林集体化理论虽然含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分。斯大林认为，小农生产的效率是最低，提倡只有创建集体耕作的大农庄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这种设想具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次劳动力的协作都是生产的发展。但是，斯大林却进而又把集体化理解成是在“空地”上“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想法与马克思关于新的经济形式必须在旧母体内孕

① 参阅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22 页。

② 当然，不可否认，在个别农民思想觉悟、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经济科技含量比较高的地方，集体农庄的确曾创造出好的成绩。比如，在 1930 年，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集体农庄的谷物单位面积产量比个体农户高出了 10%~15%，集体农庄每匹马的耕作面积为个体农户的 1.5~2 倍。但这毕竟是少数，它们的存在不影响我们对当时苏联集体农庄总体状况的评价。有关数字可参阅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20 页。

③ 亚·鲍文著：《改革：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况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载《别无选择》，第 729~730 页。

育发芽的原理是不尽相符合的。斯大林期望用“自上而下的革命”，人为割断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凭空“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一般规律的原理则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二者显然是不一致的。斯大林对农业集体化的认识，由此带有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违背的成分。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农业长期没有获得顺利的发展，造成了农业长期拖后腿的后果。由此，苏联农业甚至是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没有大的起色。

布哈林曾预言：“斯大林的路线是使整个革命毁灭的路线。我们会因此被推翻。”^①这个预言错了。总体上看，斯大林关于集体化的理论虽然存在缺陷，但他对集体化积极作用的设想，除了没有促进农业本身的大发展以外，其他方面基本都实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因此而被推翻，却反而得到了加强。

四 阶级斗争理论

110 斯大林对苏联国内阶级斗争问题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涉及到阶级斗争的发展形势、表现形式和解决途径等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联系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认识可以看出，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斯大林其他重要理论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布哈林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23~324页。

(一)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过银行国有化和工商业改造之后，城市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人都逐渐转化为社会主义劳动者。1918 年春进行土地革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展比较顺利，到 1919 年，苏俄“基本上摧毁了富农势力”，完成了改造富农的任务。那时，“富农经济（大经济）已经缩小 2/3 以上”，剩下的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即“小富农”大概也只有“几万或几十万”人。在内战结束后，苏俄境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趋于缓和，剥削阶级接近消亡。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国内阶级状况又出现新变化。城市和农村原有的剥削分子又活跃起来，新的剥削阶层在城市和农村开始出现。在城市，由于允许工商业私人资本的存在，新生的剥削分子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阶层，这些人一般被称为“耐普曼”。在农村，富农的人数及其占有的生产资料的比例都在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能对苏联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两支阶级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引起了苏联阶级结构的变化，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有效抑制剥削分子的问题。

所谓“耐普曼”，其实就是由“新经济政策”的缩写加上英文的“曼”（man）组合而成的一个新词，其原意就是“新经济政策的人”。当时，不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商业领域，都存在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这完全是事实。因此，“耐普曼”这个词逐渐被用作为投机商人和业主的特定代名词。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初期，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十分微弱，“耐普曼”分子仍然比较弱小，但他们发

展得很快。1926年，苏联非农业人口资产阶级及其家庭成员计有23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6%，1928年城市资产阶级分子有118万多人，占全苏总人口的0.8%。其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大的或比较大的厂主、商人、大投机者和食利者，在1926~1927年，这些大的或比较大的剥削者人数大约为有29000人。^①其中一些大私营工商业者通常以宴请、行贿等手段收买苏维埃经济部门和领导机构的负责人，活动是比较猖獗的。1929年以后，国家开始将所有现存的私营工商业分子当作一个整体，认定一个新生的反动剥削阶级——“耐普曼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全面排挤和彻底消灭耐普曼资产阶级”。在受到排挤和剥夺时，这些人也采取措施进行反抗，一些破坏活动随之频繁发生。总的说，“耐普曼”虽然仍未能左右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但是它的存在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构成了影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的。

112 富农的情况比“耐普曼”的更为严重。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一些革命前的富农重新获得发展，革命后被戏称为“小富农”的那些人也较快地发展为富农，一些中农和个别贫农也发展为富农，富农的人数及其影响由此逐渐扩大。据统计，1927年，富农的户数已经占全苏农业总户数的5.5%。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它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一些有识之士警惕地认为，“2500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①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藏一个大地雷”。^① 从后来 1927 ~ 1928 年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的状况看，富农作为一个剥削者群体是比较强大有力的，他们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着较一致政治、经济主张的阶级。在当时情况下，富农的存在及其活动显然已经阻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粮食收购危机的情况还表明，富农的反抗活动甚至可能给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构成严重威胁。

总体上看，在 20 年代中后期，“耐普曼”的出现和富农的发展是苏联阶级状况变化的主要表现。尽管此时期苏联境内占多数的人口仍是工人阶级、中农、贫雇农和社会主义的机关工作人员等，但新的剥削者阶层已经开始形成，其中富农还逐渐成长为阶级。那时，由于沙皇残余势力、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残余与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串通一气，坚持不停地对无产阶级政权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城市“耐普曼”剥削阶层和农村富农剥削阶级的发展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不利影响就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当然，剥削阶级的破坏活动还会影响党的领导人对社会形势的认识，出于对社会主义政权安危的关注，领导人可能会夸大阶级斗争的形势。

（二）斯大林对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

113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针对苏联国内阶级状况出现的新变化，斯大林对苏联阶级斗争形势提出了新的看法。这些看法有着一些合理的内容，但也存在着夸大倾向。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斯大林认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形

^① 《真理报》，1927 年 11 月 2 日。

势仍然比较缓和。他提倡“用协商和互相让步的方法”解决阶级矛盾，认为“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导向尖锐化”，“导向冲突”。这时候，面对农村存在的贫农、雇农同富农的斗争和城市“耐普曼”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矛盾，斯大林认为，尽管苏联社会的阶级状况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阶级斗争并没有激化。他反对夸大富农同贫雇农阶级斗争的倾向，认为那样做就是“要恢复贫农委员会的剥夺富农的政策，因而就是要在我国宣布国内战争，这样也就是破坏我们的全部建设工作”。^①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同富农的斗争，只能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它，“即使要采取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富农，也要注意，‘行政手段不应代替经济措施’”。^②就是说，此时斯大林认为，苏联境内出现的阶级状况的新变化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构成威胁。他主张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以内”解决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有关问题。^③

114

1927年冬季以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开始激化，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分子正在对苏维埃政权发起进攻。阶级斗争形势的转变是以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的发生为标志的。这两个事件发生于1927年底至1928年春，它们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在经过考察研究之后，斯大林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发起的进攻。在农村，“非常措施”的实行虽然为国家征购到的大量粮食，但却引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富农加深了对党和苏维埃的仇恨，一些中农由于遭到了不正确的对待也产生了对立情绪。斯大林根据亲自进行的考察和工作经历，认为粮食收购危机反映着农村

^{①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8、295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6页。

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对苏维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在城市，在对“沙赫特事件”进行了专门审讯后，苏联政府认定，“沙赫特事件”是整个资产阶级专家秘密集团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反苏反革命组织提供的活动资金，在和矿井原矿主保持联系的情况下故意实行的破坏活动。斯大林本人则认为，沙赫特事件是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进攻”^①。他认定“沙赫特事件”是工业战线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在这两个事件的触动下，斯大林对国内阶级状况进行重新估量。他提出了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的观点，产生了社会主义正受到了来自国内外阶级敌人发起的全面进攻的认识。由此，他开始着手构思放弃新经济政策，停止“退却”，以对城乡资产阶级发起“新的攻势”。

1928年7月以后，斯大林提出了苏联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观点。他认为，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阶级斗争必将越来越尖锐化。^②同时，在同布哈林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斯大林开始运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去批判布哈林，并提出了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办法铲除资本主义的根底的论断。他开始认为，阶级的消亡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实现的，国家的消亡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化实现的。于是，为了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向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实行全线

^{①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4、150页。

进攻”。^①

(三) 斯大林阶级斗争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分析城乡阶级状况的同时，斯大林开始在一系列的演说和报告中对苏联阶级斗争的发展形势、表现形式和解决阶级斗争的途径等问题作出阐述，逐渐形成起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阶级斗争理论。

第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是日益尖锐化。

在斯大林看来，工人阶级经过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剥削阶级的残余仍然存在，垂死的阶级从来就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要进行垂死挣扎和反抗，而且越是到了末日，这种反抗就会愈加疯狂和不择手段。因此，伴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我们的胜利愈多，进展愈大，阶级斗争就必然愈尖锐化。斯大林把富农和“沙赫特分子”的进攻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表现。他认为，有三方面原因促使苏联阶级斗争会表现出日益尖锐化的趋势。其一，小农生产每天都在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使资本主义的恢复成为可能，因而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必然随之激化。其二，在社会主义的进展过程中，“……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就在这里……垂死的阶级进行反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他们增长得快，他们愈来愈比我们弱……他们才感到自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4页。

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反抗”。^①其三，世界资本梦想在苏联保留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因此，国内资本主义分子总是同旧世界一切力量结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②所以，斯大林明确作出了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论断。

第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是由“正面进攻”转为“更猛烈”的暗害活动。

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社会主义的进步愈多，进展愈大，阶级斗争就将愈尖锐化，但是，这并不是指反动阶级在不断壮大中发起的造反活动的规模在扩大，而是指垂死阶级在灭亡之前进行的报复和反抗活动变得更加不择手段和更加不顾一切。他因此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不再是内战时期的那种“正面进攻”，而是转变为“更猛烈的”暗害。于是，在他看来，粮食收购危机是资本主义分子对社会主义发起的“第一次进攻”；沙赫特事件是资本主义分子发起的“又一次进攻”，是“有组织的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按照国际资本反苏维埃组织的指示活动了五年……五年来，这批反革命专家在我们工业中进行暗害活动”。^③他把富农拒售粮食和农民在集体化初期宰杀牲口的做法，把城市“耐普曼”分子收买苏维埃和党的干部的做法和猖獗地发起的各种反抗和抵制活动等等，都归结为资本主义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暗害”。第三，必须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途径去达到消灭阶级的目标。

117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4～35页。

② 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8～119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1页。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理想社会，那么，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如何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呢？斯大林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在死亡之前会发起更尖锐的阶级斗争，那么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进展的过程中，就必须通过加强阶级斗争的途径去消灭阶级。他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① 在斯大林看来，消灭阶级不仅是建成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苏维埃政权长期存在的需要。关于富农，斯大林认为他们是吸血者、蜘蛛和吸血鬼，“富农是苏维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和平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② 因此，为了消灭富农，就“必须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那种最坚决最彻底的精神去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③ 关于“沙赫特分子”和“耐普曼”，他认为，“现在，在建设时期，也像在国内战争时期一样，镇压机关、军队和其他组织都是必要的”，^④ “高压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因素……”^⑤ 至于如何在不断加强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实现消灭阶级的目标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尽管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在尖锐化，但阶级敌人随着人口比重的下降，人数是愈来愈少；尽管他们在疯狂地反抗社会主义改造，但力量却是愈来愈弱，因此，剥削阶级将日趋弱小最终走向消亡，阶级斗争也呈现出涉及范围日益狭窄的特点并必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②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7、198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1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71页。

然走向消灭。

最后，社会主义的每一个重大的胜利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

在斯大林看来：“我认为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件稍微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事件不反映出城市中或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存在”，“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力量”。^① 这是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前进的动力。按照这个道理，为了快速推动社会主义的进展，就必须一刻不停地进行阶级斗争。

（四）斯大林阶级斗争理论对苏联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是非评析

作为一个产生于特定历史时代的理论，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既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又由于带有严重缺陷而在实践中产生极大过失。在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后来的肃反扩大化的过程中，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他的其他理论共同对苏联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苏联农民的社会生活。鉴于小农每一天都在制造出资产阶级的认识，斯大林为了领导苏联人民建成社会主义，就必然要发起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次大规模的生产关系大变革，力图在广大农村“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底”。从积极的方面看，农业

119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8-149页。

集体化运动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变革，恰恰就是斯大林所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看作是在城市发起的十月革命的延续，它彻底剥夺了剥削阶级在农村的主导地位，使广大农民成为农村的主人。从消极的方面看，农村阶级斗争激化带来的副作用是不能低估的。那时，为了镇压一些农民的反抗，联共（布）采取了一些暴力措施，挫伤了农民的感情，留下了阶级仇恨的隐患；为了贯彻斯大林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指示，苏联各地集体农庄对富农采取了集体消灭或迁移的做法，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引起了富农深刻的阶级仇恨；一些农民由于不理解集体化的政策，在被迫加入集体农庄时，宰杀了大批的农耕牲畜，对农业耕动力造成了破坏。这些副作用对苏联社会的潜在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20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深刻地影响了联共（布）党内的组织生活。进入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认为，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对手已经不是资本主义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而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由于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多数是党的干部，其中虽然有些人的确是跟随托洛茨基进行破坏活动的党员，但有些却是支持中央的党员。当党把这批人都当作“人民的敌人”进行处理时，就是把“托洛茨基分子”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把党内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于是，阶级斗争的方法被用来解决党内问题，联共（布）党内开始用“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去处理“托洛茨基分子”。国家安全保卫机关随之发起肃反扩大化运动，逮捕、处决了大批党的优秀干部，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斯大林对这一做法是基本赞同的。他认为，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的内部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以斗争来

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①那时，苏联没有很好地区分党内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差别，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党内分歧，这必然会阻碍党内组织生活的正常开展。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于苏联工业战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斯大林看来，苏联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是国内阶级敌人与国外阶级敌人相联系。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工业战线时刻注意着资产阶级专家的动态，一有风吹草动就将其当作“沙赫特分子”加以处理，使许多有用的旧专家遭到了迫害。一些专家本来可以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但由于被当作外国代理人，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交给的任务进行活动的，把他们简单地当作“工业党”进行处理，这都不是恰当的。这种做法打击了广大工业专家及技术人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工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透过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可以对这一理论的是非作出分析。从理论产生的背景看，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无疑是斯大林分析新的社会形势得出的结论，它满足了时代的要求。那时，斯大林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问题，揭示出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国外势力的代理人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活动，阐明社会主义的阶级主张，采取措施保卫社会主义，这对于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维持社会秩序无疑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定阶段，斯大林看到国内外敌对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激烈进攻，阐明阶级斗争有可能局部激化的道理，这也是具有一定现实依

121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9页。

据的。在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后，依据苏联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提出了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看法，这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可以说，斯大林的阶级主张，大胆地申明了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的思想，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

从理论的具体内容看，斯大林阶级斗争理论的确存在严重缺陷，这些缺陷又直接导致了实践上的过失。首先，斯大林大胆地提出了消灭富农的主张，然而却未对富农阶级的基本特征作出明确的界定。这给各级行政机关执行各项决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农民由于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而被划为富农阶级，然后被当作富农消灭掉。这样就会混淆阶级差别，激化社会矛盾。其次，把阶级斗争可能在社会主义的一定时期内局部激化的事实，上升为社会主义阶段内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一般性结论，然后又提出通过加强阶级斗争的方法达到消灭阶级的目标的理论，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不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应该在资本主义社会坚持进行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然而他们并不主张用残酷的暴力办法将整个剥削阶级消灭掉，也不主张用暴力的办法去改造小农。^①再次，混淆了阶级斗争和党内分歧之间的界限，运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处理党内派别斗争，这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展。在斯大林阶级斗争理论的指

^① 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对待个体农民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凡是农民作为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英国那样为农业短工取代的地方”，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

导下，苏联混淆了阶级矛盾和党内斗争的差别，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去处理党内分歧，造成了一些党的优秀干部被杀害的悲剧，这是令人惋惜的过失。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些严重缺陷，后来成了一些人攻击社会主义的话柄，其教训是深刻的。

总之，斯大林反复告诫人们说，我们有国内阶级敌人，也有国外阶级敌人，“这一点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①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斯大林的这些论述基本上都被各级党员干部所接受，对苏联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影响。

五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 其他方面的总体性认识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包含有丰富的内容，除了前述重点评述的有关理论以外，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经济计划、商品货币关系、国家职能、党政关系、执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动力等问题也都作了论述。这些理论认识对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实行均有着一定的作用。

（一）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矛盾的认识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阶段，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些是不科学的。

首先，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坚持了马

123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页。

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看法，把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但他在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所处阶段时提出了一些不完全正确的独立见解。

20世纪20年代中期，斯大林将苏联社会主义区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阶段，此时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界定是基本正确的。在他看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国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的的问题。按照这个提法，在战胜了本国资本主义后，苏联社会主义就进入了“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则是指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在欧洲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的阶段。因此，苏联在建成社会主义后，要进入“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阶段，就必须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条件的。如果不具备这一条件，就不应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显然，斯大林的这一认识与苏联所处的国内外社会条件基本上是符合的。

124

从1936年开始至1952年的这段时间内，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前观点，脱离了实际。1936年11月，斯大林宣称，苏联社会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①随后又作出了苏联一国可以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认为苏联一国首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惟一障碍是尚未从经济上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真理报》发表社论指出，联共（布）十八大将作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开端的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9页。

代表大会载入史册。共产主义这个对许多人来说是不能实现的理想，对于我们，十八大的同代人，共产主义就是最近的明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仍然坚持这一认识。1952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明确规定：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等于是把当时的苏联定位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国外资本主义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的情况下，斯大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国防建设和支持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就必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也不可能完全让位于共产主义的社会所有制，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使社会主义不可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职能，政治国家仍不可能消亡，那么，共产主义社会也就仍不可能实现。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问题，斯大林的看法经过了一次重大转变。原先他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

几乎在其执政的整个时期内，斯大林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认识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讲，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符合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在使用这一理论时，如果不注意分析情况就容易产生出这样一个不正确的认识：一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等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在实际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乃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社会基本矛盾，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这一基本矛盾就会不停地起作用。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恰恰就是犯了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错误。1938年，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斯大林就提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他认为苏联不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①

1952年，晚年斯大林对这一错误作了修正。在撰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他放弃了原有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他写道，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有经过改造，才可能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他指出：“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②这时候，他开始看到，如果我们的政策错误，“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③在逝世前的最后一年，斯大林勇敢地摆脱了以往认识的局限，为后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奠定了基础。当然，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局限。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斯大林虽然看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可能与生产力互相冲突的事实，但仍然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当作推动社会

①②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9、590、590页。

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①

(二)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计划和商品货币问题的认识

综观斯大林一生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认识可见，在斯大林看来：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斯大林批评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消灭现存经济规律和创造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他认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经济规律的做法，是犯了唯意志论的错误，是把规律与法律混为一谈。他分析道，法律是由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规律无论它是自然规律还是经济规律，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无论在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②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③斯大林还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作了扼要的定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

127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6页。

②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1、544~545页。

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①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的即国家的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在发起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斯大林就提出了要在农村清除小农经济，建立起集体的社会化大农业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② 1936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占有绝对优势时，斯大林正式指出：“我们苏联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工厂、土地、银行、运输工具的私有制已被取消，而代之以公有制”，^③“这个社会的基础就是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④晚年斯大林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包含有集体所有制的状况，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具有把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发展到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他说，集体农庄已经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必须“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⑤从中可见，建立比较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的根本认识。

128

第三，社会主义必须运用指令性经济计划去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和企业都已联结成有机整体，国民经济完全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经

①⑤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61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8页。

③④ 《斯大林文选》（上），第76、77页。

济混乱状态，生产和消费都有了合理的比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已经是一种必然。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为了快速推进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就必须执行统一的经济计划，将有限的资金、资源、劳动力都集中投入到重要的经济项目上去。他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① 在斯大林这一设想的指导下，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得以全面实行。

第四，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1930~1931年，苏联一些地方作了取消商品和货币的尝试，一些人民委员作出了“向产品直接交换过渡”的错误呼吁。斯大林对此作了批评，他认为，取消货币和向产品直接交换过渡的观点是“左派畸形儿”。在他看来，货币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工具”，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加以利用，货币将“长期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完成的时候为止”。后来，斯大林又对这一观点作了发挥。1952年，斯大林指出，由于苏联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种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还有经济利益的差别，它们之间的联系要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因而商品交换仍将存在。而且由于个人消费品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保证这一原则的实现。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差别作过区分，认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只局限于消费资料，劳动力不

129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0页。

会成为商品，因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①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急于向产品直接交换的风气下，斯大林能够看到商品生产和货币对于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三）对国家的消亡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问题的认识

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国内一些人依据苏联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学究地提出了国家在苏联即将消亡的看法，对社会生活发生了不好的影响。斯大林于是专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和国家消亡的问题作了分析，较清楚地阐明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首先，斯大林从理论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作了阐发，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关于国家消亡理论的道理。在《反杜林论》一书内，恩格斯曾经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②这里，
130 恩格斯讲的就是政治国家走向消亡的原理。斯大林分析指出，国家消亡的原理只有在具备下述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时才是正确的：（1）仅仅从一国内部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而预先撇开国际因素，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一个离开国际环境而孤立的存在国家。（2）假定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一切国家或者在

^① 参阅《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8～5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

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外来侵略的危险已经不再存在，军队和国家已没有加强的必要。那么，在不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时，自然就不能照搬恩格斯的理论。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我们不能要求距今天45年至55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的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一切，不能要求他们对每一个别的国家50年至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据此，斯大林指出：“不能把恩格斯关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的一般公式，推广运用到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这种个别的具体的情况，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受着外国武装侵犯的威胁，因此不能撇开国际环境不顾，它应当拥有训练得很好的军队，组织得很好的惩罚机关和坚强的侦察机关，因而应当拥有自己的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以便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① 斯大林的上述认识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且在实践中对巩固和发展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他把苏联社会主义划分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的两个阶段，并且根据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第二阶段是从消灭城乡剥削阶级起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获得完全胜利并通过新宪法为止。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是镇压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建设以抵御武装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因而，苏维埃国家在这个阶段的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剥削

131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67页。

阶级的反抗和抵御外来侵犯；组织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并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在第二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组织文化革命，使军队实现现代化。与此相适应，苏维埃国家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的职能将由保卫社会主义财产的职能所代替，“因为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再没有什么人需要镇压了”；^①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仍将完全保存；组织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则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人们期待已久的欧洲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迟迟未能实现，苏联只能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下，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出新的分析，阐明苏联仍要保留国家，并利用国家去保卫社会主义，组织经济文化工作的思想显然是正确的。可以设想，当时苏联如果放弃国家的政治职能，社会主义在苏联必定是很快就要失败的。

（四）对党政关系、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的认识

132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体系中，如何发挥共产党的领导职能，搞好执政党的建设，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的认识也是事关如何积极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对此，斯大林分别作了一些探索，形成了具有一定指导作用的理论认识。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体系。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体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70页。

系分为传动装置、杠杆和指导力量，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力量，工会等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传动装置和杠杆。在斯大林看来，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同本阶级联系起来。合作社首先是把劳动者作为消费者联合起来，然后把他们作为生产者联合起来；它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主要作用在于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党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新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培养青年后备军。因而，工会、苏维埃、合作社和青年团都是非党的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传动装置和杠杆，而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指导力量。党的力量在于它能够从无产阶级的一切群众组织中把优秀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党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把它的工作统一起来，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即社会主义目标。关于指导力量与传动装置的关系。斯大林认为，不能用党的领导去代替群众组织的工作。他说，虽然“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面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一点当然不能理解为党能够或应当代替工人、苏维埃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并不是直接实现这种专政，而是借助于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这个专政的。没有这些‘传动装置’，就不能有稍微巩固的专政”。^①

133

关于党和苏维埃的关系。斯大林认为，共产党是苏维埃政权的核心，但党不能越过苏维埃而直接管理国家。在斯大林看来，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掌握着国家政权并能够对国家进行管理，但是“不能把这一点理解为党是越过国家政权，不要国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14页。

家政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不能理解为党是越过苏维埃，不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的”。因为“党是政权的核⼼，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个东西”。^①他认为，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主要是规定大政方针，输送干部和检查监督。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斯大林对于党政应当适当分开的原则是有所认识的。在斯大林的领导下，1925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规定，各级党委的书记和部分常委应该参加同级苏维埃执⾏委员会主席团，而各级苏维埃执⾏委员会主席则应该参加同级党委会，以便加强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加强党政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当然，理论认识与实践是两回事，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斯大林有时也无法完全贯彻自己的这些认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在苏联是经常出现的。

134

关于执政党的建设。斯大林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共产党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斯大林看来，为了搞好执政党的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在一起，就必须：（1）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他要求把党的宣传、鼓动和报刊工作集中到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宣传鼓动局，在党的基层和中央都要分别设立马列主义的培训基地，以加强各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素养。（2）要大力提拔和放手使用年轻干部，配备好党政领导班子，使他们能体现执政党的根本意志，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3）必须坚持同人民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善于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疾苦，必须有不仅要领导群众而且愿意虚心地向群众学习的决心。在《论党的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18页。

工作缺点》一文中，斯大林专门举了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的故事，^① 并指出，“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长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② (4) 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实行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斯大林认为，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必须把发扬党的民主同维护党的利益统一起来，他反对把民主理解为少数人无休止的争论，理解为派别集团存在和活动的自由。这些认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由于充分贯彻这些认识存在着很多困难，斯大林后来在领导执政党的建设时犯了一些错误，包括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斯大林初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阶级斗争；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后，他又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和苏联各民族人民的友谊。在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理论时，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的每一个重大的胜利，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他说：“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力量”。^③ 这就是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

135

① 这个神话故事讲，安泰是海神波赛尔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只要往地上--靠，便能够从他的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这使他成为无敌的英雄。后来，海格立斯同他决斗时，把他举到了空中，使他无法再同地面接触，从而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23~624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8~149页。

前进的动力。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后，斯大林转变了看法，开始认为：“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现在的苏联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在苏联社会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而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在友好合作基础上生活工作的。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民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①这就是被广为流传的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新动力的定义。

以上扼要地论述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相对较为成型的看法。除此之外，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其他问题也都有所论述，但这些论述或者是不够系统，或者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具重要意义，此处不再赘述。

^① 《斯大林文选》七册，第237页。

第三章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

斯大林模式是当时苏联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快速做好备战工作而创建的。那时，肩负着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备战重任的社会主义苏联，从发起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起，就走上了高度集中的轨道，这注定斯大林模式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集中的基本特征。

一 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斯大林执政之后，苏联很快建立起了比较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通过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用行政手段贯彻指令性计划，排斥市场机制，对生产和分配进行严格的控制。可以从下列诸方面概述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一) 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生产资料归谁占有形式的变革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起着关键作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基础。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高的比例，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们的出现使苏联实现了所有制的大变革。当时，虽然社会中仍存在着一些归居民或庄员个人所有的辅助经济，如宅旁园地，但它们只是计划经济的补充，其数量和规模都受到严格限制，他们的存在根本不会影响公有制在苏联所有制结构中所占的比例。

首先，苏联宪法只承认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集体农庄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① 苏联宪法的这一界定，显然是建立在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已被消灭”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这一事实”的论断基础上的。^② 因为既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③那么，苏联国民经济生活自然不会再给予人剥削人的私有经济以生存的余地。宪法的规定促使苏联采取更加片面的做法加快所有制的变革。

138

在斯大林关于实现所有制大变革号召的指引下，苏联各级领导都把消灭城乡个体经济，建立高纯度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当作最首要的任务。在斯大林关于“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倡导下，苏联工农业各部门均迅速在短期内实现了所有制变革。到

① 1936年苏联通过的《苏联宪法》。

②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00、393页。

1937年，私有经济已经几乎被完全消灭。在工业上，第一、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后，创建了一大批国营大工厂。随着工业化的快速进展，原先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萎缩，并最终消失殆尽，整个苏联工业几乎成了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业方面，原先的“小生产者的海洋”已转变为大批的集体农庄。到1931年3月10日，苏联主要谷物区集体化的水平已达74%，到该年6月，中央宣布主要谷物区农户集体化水平已达80%以上，再到1934年7月1日，全苏农户集体化水平达到71.6%，耕地集体化水平达到了88.5%。^①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看，1937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全国生产基金（不包括牲畜）的比重为99.6%，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99.1%。可见，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变革不仅在理论上得到确认，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全面实现。

斯大林逝世前，片面追求高纯度公有制比例的倾向仍在加剧。1952年，在撰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斯大林提出了把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发展为全民所有制的观点。他说，集体农庄已经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还必须“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②可见，直到晚年，斯大林仍一味地要求提高全民所有制所占比例，对于这种片面追求高纯度公有制的行为所导致的各种问题仍未有清楚的认识。

139

其次，在公有制占据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不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存在，对极有限的个人副业进行严格限制。这自然是宪法条文的合理推论，既然国家只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

^① 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9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11页。

合法性，个人经济就不具有合法地位。斯大林曾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是苏联社会的基础。^①于是，私人经济的存在，就被认为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障碍。与此相联系，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市场经济几乎成为非法的代名词。到30年代中期，与外资合营的经济基本上被取消。1937年，个体经济“残余”已为数甚微，在全国的生产基金中仅占0.4%。而且这些私人经济并不具有合法地位，只是被当作“特殊情况”而暂时得以存在。

最后，居民拥有的个人财产只是生活的必需品，不是生产资料。1936苏联宪法曾就居民可以拥有的“个人财产”作出规定，指明居民可以占有一定的个人消费品和个人住宅，其中包括“公民的劳动所得的收入和储蓄、住宅、家庭副业、家庭日常用品、个人使用与享受的物品，以及公民个人财产的继承权”。当然，这些“个人财产”都是消费性的，并非能够进行再生产的私有生产资料，它们的存在并不是对私有经济合法性的肯定，丝毫也不会改变苏联所有制的结构。

（二）运用指令性计划管理工业生产

计划经济体制是列宁时代的遗产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开始建立计划经济体制。1920年，在列宁的主持下苏联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这是一个远景预测，并不带指令性。1921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它是人民委

^① 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05页。

员会领导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咨询性质机构。虽然这并不同于斯大林时期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但却是后者形成的基础。

斯大林执政以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指令性的方向发展。从1926年起，苏联开始制订国民经济年度控制数字。不过，这个数字仅限于对一年后经济发展作出简单的预测，本身仍是对未来经济作出的“科学预见”，或者说它仍是一个指导性数字而已。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这一做法作了严厉批评，他要求制定更为详尽具体的计划。于是，十五大决定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随后，1929年4月，苏联第一个指令性计划获得通过。该计划规定了近50个工业部门的具体任务，还规定了关于劳动、商品流转、文化建设和财政方面的具体任务。1931年，苏联把制定年度控制数字过渡到制定年度计划和季度计划，从制定部门计划发展到制定区域计划，并开始向地方行政机关和集体农庄下达播种面积计划和农业技术计划。而且还规定，这些计划一经最高苏维埃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这些生产计划都由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计委编制并由其对执行情况进行审查。

1931年，苏联按计划分配的资金已占其国民收入总额的2/3。1933年，苏联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该计划涉及范围更大，内容更为详尽，已有120个工业部门被包括在计划范围之内。至此，斯大林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已初具规模。经济计划具有指令性性质，这是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提出过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设想，但是明确提出要实行指令性计划者则是斯大林。他指出：“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

计划，而是指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①在当时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斯大林这一设想对国家的经济生活发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指令性工业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在苏联得以全面实行。

在当时，苏联工业指令性经济计划具有如下两个鲜明特色：其一，指令性计划是强制执行的，经济计划一旦制定就具有法律的效力。当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辛斯基讲道：“计划作为经济政治指令，具有法律的效力。”^②苏联经济学家希林斯基说：计划草案经过详细的与全面的审查以后，便提交政府批准。经政府批准的国民经济计划，便获得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1947年9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协作企业不完成协作供货的责任》的决议，规定“如屡次完不成计划供货任务，要对企业领导人以及其他对完成协作供货负责任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以渎职罪论处。”^③其二，在整个城市工业经济体系内，指令性计划调节是国家内部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市场调节不被认可。后者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东西，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事物，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不容。当时，苏联全社会虽然允许生活消费用品交换的存在，但是，这并不等于对商品经济的认可，实际上，除了农村仅有的集市贸易而外，其他市场调节皆为计划经济所排斥。这样，社会经济生活几乎就完全处在指令性计划范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0页。

^② [苏] H.A. 沃兹涅辛斯基：《建设社会主义和三个斯大林五年计划》，载《布尔什维克》杂志1940年第1期。

^③ 《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指示汇编》第3卷，第233~234页。

围之内，工业生产和分配则完全是通过指令性计划进行调节的。

在工业经济领域，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庞大的计划管理机构、指标体系和编制、审批程序。

其中，苏联计划管理体系分为各级政府的计委系统和中央各部门的计划系统。在中央一级，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的任务是：编制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年度计划与季度计划，提交苏联人民委员会审查；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提出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各局和各加盟共和国编制的长期计划、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的总结；检查已经批准的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等等。在地方一级，各共和国、州、市（区）三级政府都设有本地区计划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对该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中央各部门又都设有自己的计划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编制本部门经济发展的长期计划和年度、季度、月度计划草案；根据政府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的任务，编制和审批所属企业和组织的经济计划或其他类似计划；根据国家计划任务，按照一定的指标给企业确定月度任务，并下达给企业，等等。这样，苏联国家计委的经济指标就经由这些部门计划机构下达到成千上万的中央直属企业去，与地方各级计划部门下达的指标一起，牢牢地控制住了全国各种大大小小的企业。

计划经济的指标体系是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运转的重要手段，它包括有生产指标、财务指标和技术经济指标三种。这三种指标是国家计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确定的，它们实际上就是国家经济指令的表现形式。生产指标主要是对产品的品种、数

量、总产值和商品产值的规定。财务指标主要是对固定基金总值、固定基金的折旧、流动资金总额、流动资金周转速度、自有流动资金和借入资金、利润总额、盈利率、预算拨款和预算缴款等的规定。技术经济指标主要是对基本建设投资额、生产能力、固定资产大修、劳动生产率、生产费用总额等等的规定。这些指标是国家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依据，是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还是组织企业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的重要依据。

苏联指令性经济计划的编制和审批程序依据的是从中央来，再回到中央去的原则。中央掌握着编制计划全过程的决策权。在这个程序中，首先是国家计委根据党中央和政府的指示，编制各类经济控制数字，这些数字包括有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比例和重点发展部门等，然后将这些数字下达给各部门和地方各级计委和企业。各部门、各地方及企业又依据这些指令制定自己的经济计划草案，逐级上报，送达国家计委。国家计委以此为基础编制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一计划经苏联部长会议审批通过后，即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各部门、各地方计委及企业必须严格执行之。

依靠这一庞大的计划体系，联共（布）中央通过国家计委督促各级行政部门、各企业贯彻中央意志，运用行政手段严格执行各种指令性经济计划，完成经济生产的任务。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害怕地方工业的过分发展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方面去，苏联运用行政手段把大批原属地方管理的企业收归中央工业部门管理，甚至把一批地方自产自销的企业也收归中央管理。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由中央管理的工业占90%，由地方管理的工业仅占10%。在实行

中央—企业二级和中央—托拉斯—企业三级管理体制之后，中央直接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和供、产、销的大权。国家计委采用行政手段对其下属各地方计划部门和中央各部计划部门进行强有力的管理。发布命令，颁布决议，委派或撤换干部等都是国家计委常用的行政手段。在这些行政手段的约束下，各部门、各企业都必须按照国家制定的计划或新的中央指示进行工作，不得对之有丝毫的违背。企业管理者由中央委派，企业的财政收支须经中央批准，企业的物资供应要由中央统一调拨，企业的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甚至月计划都要由中央审批。这就是所谓的“条条专政”的体制，就是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有条不紊的管理的体制。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有人戏称说，在这种体制下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

值得一提的是，在30年代，苏联工业经济虽然仍沿用着“经济核算”一说，但由于放弃了商品流通，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对经济活动的作用，这种经济核算不过是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出的核算而已，是为了保证收支平衡，而不是为了让企业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成果与其利益并没有密切挂钩。它只不过是单纯的计算手段，是监督完成指令性计划的一种工具，是行政管理方法的一种补充而已。就是说，尽管当时工业经济虽然沿用着经济核算的做法，但这种经济核算的存在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贯彻行政手段。

145

（三）对农业生产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农业存在着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另外还有少数的个体

农户。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是国家所有制，集体农庄是集体所有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苏联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机器拖拉机站是国家协助和监督集体农庄的部门。中央对国营农场能进行直接的计划管理，对集体农庄的管理则必须通过机器拖拉机站间接发生作用。从整体上看，苏联对农业的管理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

146 国营农场是国家的即全民所有的农业。国营农场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开始时，它主要是以没收来的地主庄园为基础建成的，在全国范围内只占全部农业的少数。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国营农场的发展较快。1928年，鉴于日益尖锐的粮食危机，联共（布）中央在七月会议上形成决议，决定创立谷物国营农场。之后，按照经营作物的种类，苏联全国开始发展起一批国营农场，包括谷物国营农场、棉花国营农场、畜牧业国营农场等等。从1928年至1932年，全苏国营农场数从1407个迅速增长了3倍多，达到了4337个。其供应职工的农业附属企业从1718个迅速增长了2.7倍，达到了4672个。^①国家经常都把最新的农业先进技术设备配备给国营农场，在这些国营农场进行大量投资，包括技术装备、房屋与建筑物等固定资产的投资。新建立起来的国营农场一般都具有较大的规模，而且从一开始就建成为机械化大型农业。早在1932年，平均一个谷物国营农场大约就拥有100台拖拉机，50台联合收割机，20辆左右的载重汽车。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些数字还在迅速增长。为了使大批增长的农业机器能够得到充分的运用，使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12页。

大批农田能够得到合理的轮种，国营农场开始探索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作制度。1932年以后，苏联在国营农场普遍建立固定工作队，对工作队的工作进行专业分工，给每个工作队划分固定的生产地段等，这些做法逐渐形成为国营农场的工作机制。

集体农庄是集体所有农业，它是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形成起来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当时，由于国营农场所占的比例不太高，不论是从所耕种的土地的数量，还是从劳动人口数量，从粮食和农作物的生产总量上看，集体农庄都是苏联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从1929年春天开始，苏联集体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掀起，大批集体农庄在全苏纷纷创建起来。中间经历了1930年春天的集体化低潮，不少集体化农户退出集体农庄，重新成为个体农户，集体农庄的创建速度稍为减慢。但从1930年冬天起，集体化运动再次掀起高潮。1931年8月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快集体化速度和巩固集体农庄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68%~70%的农户，75%~80%的播种面积加入集体农庄，是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的标准。在这一决议的推动下，集体化迅速发展，到193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11700多个集体农庄，集体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62.4%，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0%。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任务基本完成，集体农庄在苏联各地牢牢地建立了起来。1935年2月，苏联通过《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认定集体农庄实行的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集体农庄拥有的生产资料有役畜、农具、种子、饲养公有牲畜所必须的饲料、农庄的建筑物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其中农具主要是指犁、播种机、耙、打谷机、割草机等，并不包括拖拉机和汽车等大型农业机器。土地是国家所有的，不归集体

农庄所有。集体农庄一般都根据全苏集体农庄管理总局指示和它与机器拖拉机站签订的生产合同，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协助下，由农庄庄员运用集体所有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

148 机器拖拉机站是国家的即全民所有的农业生产和管理部门。拖拉机队的组建始于1927年，该年《消息报》曾报道过一些农民组织拖拉机工作队的消息。1928年春，舍夫琴科国营农场发展了14个拖拉机队，同年3月，全苏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在舍夫琴科国营农场宣告建成，被称为“村际拖拉机站”。一批农民看到了机器生产的积极作用，开始倾向于与拖拉机站合作。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于是全国各地都开始建立拖拉机站。1929年春播时，全苏形成了70个拖拉机队。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对这一批机器拖拉机队的工作作了研究后，提出了在机器拖拉机队的基础上建立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议。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定在全国广泛设立国营和合作社营的机器拖拉机站，认为这是“使所有个体农民群众的主要生产过程社会化的方法之一”。^①1929年11月17日，联共（布）中央决定设立全苏机器拖拉机站管理总局，作为和全苏集体农庄管理总局并列的机构，直接领导机器拖拉机站。之后，机器拖拉机站的发展非常迅猛，1932年，全苏机器拖拉机站已经发展到2446个，拥有拖拉机74800台。1937年，全苏机器拖拉机站达到5818个，拥有拖拉机366300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大田作物种植业的机械化，大田种植的56%，收购谷物的43%是以机械化劳动来完成的。机器拖拉机站与集体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5页。

农庄是按各自的生产计划经营业务的两类独立企业。表面上，机器拖拉机站是专门为集体农庄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单位，按照双方的协作合同，机器拖拉机站全面支持集体农庄的生产，集体农庄付给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但实际上，机器拖拉机站除为集体农庄提供机械化服务之外，还能干预其生产经营活动，对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进行整顿。在苏联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机器拖拉机站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集体农庄开展各种活动的轴心，是苏联中央控制集体农庄的重要杠杆。

实行斯大林模式后，苏联中央对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都能够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

首先，国营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集中管理的。根据国家制定的五年经济计划，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对国营农场每年的播种面积、产量、作物种类、技术标准等等都要作出规定，国营农场根据这一规定制定自己的生产指标，上报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最终由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审批形成固定的生产指标。这些指标一旦最终形成，国营农场的全部经济活动就必须以此为核心开展工作，不得有差错。在国家计委的领导下，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给国营农场规定的任务是，提高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技术，实行正确的轮种制，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及时地和高质量地完成所有的农活，使先进国营农场的经验成为所有农业生产单位的财富。为了有效调动国营农场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国家颁布了《关于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联合收割机手报酬》和《关于国营农场拖拉机手的报酬》等决定，按国营农场工人播种或收割的公顷量计算其劳动报酬，规定了从事驾驶拖拉机、驾驶联合收割机工人、植物栽培、畜力和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报酬计算和支付方法，从而实现

对国营农场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面管理。鉴于国营农场的管理需要一批政治觉悟过硬的干部和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国家要求每个国营农场内设立政治部。国营农场政治部的职责是培养农场干部和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对一些存在着小农思想意识的工人进行大农业生产的优越性的教育，以提高劳动工人的思想意识水平；对一些破坏国营农场生产活动的坏分子开展斗争，保护国家财产不被破坏。这些做法都是国家集中管理国营农场的重要手段。

其次，国家通过全苏集体农庄管理总局和机器拖拉机站对集体农庄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全面的领导。斯大林对集中管理集体农庄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集体农庄是大经济，而大经济没有计划是不能经营的。包括几百农户，有时甚至包括几千农户的大农庄，只有通过计划指导才能经营。”“没有苏维埃政权对集体农庄建设事业的经常干预，没有苏维埃政权的经常帮助，要办好这种经济是不可能的。”^①因此，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尽管集体农庄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国家却能对之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自30年代初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后，苏联开始将农业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从1931年起，国家开始向各级地方机关和集体农庄下达扩大播种面积和改造农业技术的计划。1933年开始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包括了广泛的农业计划，规定了向集体农庄下达的指令性指标。在当时，国家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对集体农庄进行管理。其一，通过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集体农庄管理总局向集体农庄下达大量的指令性指标，包括各种作物播种面积、产量、农产品收购量、畜产品率和生产方法等。其二，通过机器拖拉机站与集体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0页。

农庄签订的合同贯彻国家计划，直接参与集体农庄的生产管理。双方的合同不仅规定耕耘、播种、收割的期限和规格，而且还规定农作物的产量和各种农业技术措施。“合同中有专项条文规定机器拖拉机站在下述方面给集体农庄以经常帮助：通过农艺学的服务从组织经营上巩固集体农庄；推广农业科学成就；促进正确组织劳动；编制生产计划和收支预算；建立正确的轮种制；分配收入；培养集体农庄干部和搞好统计。”^①这种合同有着由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统一制定的标准格式，它一经签订就具有法律效力。国家通过这两个途径对集体农庄进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

最后，国家能够对机器拖拉机站进行集中管理。机器拖拉机站本身不是一个直接在土地上组织生产活动的农业单位，因此，它的作用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很不相同的。国家不可能对它下达农业生产品种、产量等等各种计划指标。但是，机器拖拉机站是“国家对集体农庄农业发挥领导作用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对农业进行计划领导的强大的杠杆”，它不仅能够监督集体农庄完成农业生产计划，又能够获得由集体农庄交付的大量实物报酬，因此，对机器拖拉机站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为了对机器拖拉机站进行有效管理，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决定成立全苏机器拖拉机站管理总局，作为和全苏集体农庄管理总局并列的机构，直接领导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1932年，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需要，联共（布）中央决定撤消全苏机器拖拉机站管理总局，改由农业人民委员部直接管辖全苏所有机器

151

^① 温热尔著：《机器拖拉机站在集体农庄农业中的主导作用》，《经济问题》[苏] 1950年第5期，第38页。

拖拉机站。这样，全国各地的机器拖拉机站就成为农业人民委员部直属的全民制企业，国家对机器拖拉机站能够直接进行管理。国家管理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形式是：在机器拖拉机站配备大批农业机器；培养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由国家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机器拖拉机站从集体农庄那里获得的粮食等实物报酬归国家所有。

为了保持对农业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苏联长期重点发展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加强对集体农庄的控制。后来甚至提倡将集体农庄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为全民所有制，以期使广大农村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四）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和分配

斯大林执政时期，在工业品的流通方面，国家对生产资料实行了排斥市场调节的供应体制。在农产品的收购方面，国家对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实行义务交售制，还可以通过机器拖拉机站获得集体农庄交付的实物报酬，国营农场生产的农产品本身就是归国家所有。在消费品的流通方面，主要实行的是由国家统一定价的商品零售（经常被称为“有组织的市场”）。在分配方面，国有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人获得国家支付的工资，可以凭票或货币通过国营商店或者合作供销社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集体农庄庄员则按照劳动日累计量领取劳动报酬。这样，苏联基本建立起了排斥市场调节的高度集中的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和分配体制。以下将分别从几个不同方面分析斯大林模式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和分配体制：

152

第一，在工业物资技术的供应上，苏联采取了供应式物资供应体制。为了贯彻这一体制，国家不仅组建起了庞大而完备

的供应委员会管理系统，而且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按计划签订经济合同调拨物资的制度。^①

自 30 年代苏联进行“工业管理改组”后，国家开始排斥市场调节，集中管理产品的供应，一个庞大的供应管理系统逐步组建了起来。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物资技术的供应，国家计委和苏联部长会议设立了直属的物质技术供应总局，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成立起了国家物质技术供应委员会，这是国家一级即第一级的物资供应管理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制定物资分配计划；编制年度的和远景的物资平衡表草案和生产资料分配计划草案；制订最重要建筑工程和开工项目的综合供应计划，并报请苏联部长会议审批。它负责向各个部门、主管机关和加盟共和国分配物资供应额，但不负责执行实现物资技术供应计划的职能，即不负责直接分配产品。第二级的物资供应机构是各部设置的物资管理机构。它们主要负责制订本部门的物资技术供应计划，并直接负责物资技术的调拨。部属的物资管理机构一般有部直属的供应总局、供应总局所属的全苏供应托拉斯及其所属的办事处、基地和金库、各部门总局的供应处及其所属的办事处和分支机构网三个主要部分。^② 第三

^① 由于行文设计的需要，本书将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物资供应和销售系统分开进行论述，这里分析苏联的物资供应系统，下文对苏联的消费品供销系统另有论述。

^② 苏联各部直属的物资供应管理机构是非常庞大的。1940年初，据 26 个全联盟人民委员部统计，各部直属的供应总局下属的供应组织达 3550 个，拥有人员 8.1 万人；各部、各总局下属供应组织达 1370 个，拥有 2.3 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机构和人员负担，国家不得不进行机构整顿。1940 年 4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决议，对部一级的供应组织进行整顿，撤消全苏供应托拉斯和各总局的地方供应组织，仅留下部直属供应总局及其下属供应组织；各总局的供应处，不再设地方机构。这样，部属的物资管理机构比过去有所减小。

级物资供应管理机构是地方物资技术供应机构，包括各加盟共和国、州、市、区的物资技术供应机构，它们的主要任务是采购非集中计划分配的物资，向地方工业企业供应生产资料。第四级的物资供应管理机构是企业的技术供应处（科）。在这个分级的物资供应管理体制中，决定性环节是中央一级，物资技术供应的计划权、管理权都集中在中央级的国家供委和部门供销管理机构，中央一级能够直接掌握的统配物资和集中分配物资占全国物资技术供应总额的绝大部分。

在各级物资管理机构的管理下，国家控制的物资向企业的调拨，是通过供应单位与订货单位之间按计划签订的经济合同的方式实现的。在斯大林执政时期，1931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决议，明确规定：国家机构、经济机构、合作社机构和企业在计划范围内通过缔结合同的途径，建立相互间的商品供应和货物供应关系，并对其执行情况承担法律责任，国家并以信贷手段监督企业履行供货合同。以后，通过经济合同，就成为国家向企业调拨物资的基本形式。整个物资供应的具体办法是，订货单位向国家供应机构提出订货单，国家供应机构经过审批，指定供货单位，再由订货单位和供货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合同规定供货品种、数量、质量、交货期限以及仲裁措施等等。这一体制逐渐成熟后就确立了国家物资技术供应的常规方式，工业生产的各种必要物资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一方式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的。凭借各级物资管理机构，国家对物资技术的供应进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

154

第二，用高度集中的方式收购农产品。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都是全民的即国家所有制企业，因此，国营农场生产的

农产品和机器拖拉机站获得的农产品实物报酬都理所当然地归国家所有。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国家可以通过义务交售制或让其向机器拖拉机站交纳实物报酬等形式向其征收农产品。

在30年代上半期，义务交售制是苏联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征收粮食的主要形式。自1933年1月起，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的决议》，开始对谷物实行义务交售制。开始时，集体农庄交售的谷物量是按照谷物计划种植面积计算的。之后，苏联把义务交售制推广到油料作物、蔬菜和畜产品，同时把按计划播种面积计算的方法改为按耕地面积计算交售额（包括畜产品）的方法。在30年代上半期，义务交售制是农产品收购的主要形式，约占农产品收购量的80%，但到1936~1937年它的比重下降为40%，逐渐转变为居第二位的农产品征收形式。

让集体农庄向机器拖拉机站交付实物报酬是苏联征收农产品的第二种收购方式。这种形式是从1933年开始实行的，开始时它只是义务交售制的补充。随着机器拖拉机站的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签订的劳动协作合同越来越完善，机器拖拉机站从集体农庄获得的实物报酬的额也逐年增加。机器拖拉机站从集体农庄获得的实物报酬，不仅是按照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量计算，而且要随着集体农庄农业的增产而增高。因此，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播种面积的增加，食物报酬在农产品收购量的比重就能够不断增长，1933年为16%，1937年即增至42.1%，1953年进一步增至58.2%，逐渐成为农产品收购的主要来源，后来甚至是成为苏联征收农产品的最主要形式。

另外一种征收农产品的形式是国家收购。国家收购是政府按较高价格收购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在完成义务交售和实物报酬以后的多余的农产品。实行集体化后，苏联农业生产虽然在机械化程度上有较大提高，一些地方的粮食产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多数地方的粮食总产量却并没有增加，相反农产品的征收量却呈逐年增加之势，这使多数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都没有除日常生活用的农产品（主要是口粮）以外的剩余农产品可供出售，所以国家通过收购形式得到的农产品的量实际上是很少的。

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各级商业管理机关，实行由全国统一定价的零售商品流通体制，国家用行政手段严格控制着整个商业系统。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活品仍然比较缺乏，苏联在生活品的分配上实行的主要是商品配给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国家已经有大量商品投放市场。于是，商品配给制逐渐被废除，苏维埃商业体制开始形成。由于商品流通是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不能让人民长期处在商品配给的紧张状态中，也不能任由商品交易的自由发展，所以非常有必要创建由国家紧密控制的商品贸易体制，对消费品的流通进行高度集中管理。

156

首先，苏联开始在全国构建各级商业管理机关，构造以国营、合作社、集体农庄市场为主的商品贸易体系。1934年7月，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苏联供应委员部划分出了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国内商业委员部，随后各加盟共和国又设立了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各边区、市和地区设立了

商业局。^①全国各级商业管理机关由此形成。在国家商业管理机构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开始重新装备和更新商店和仓库，营建系统的商业网，积极培训商业工作人员。除原有的集体农庄市场外，苏联各地开始建立起国营商店和消费合作社。按照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国营商店主要在城市活动，消费合作社则主要集中在农村。原有的集体农庄市场仍然保留了下来。这样，苏联形成了国营、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的市场三种商品销售渠道。在各级商业管理机关的管理下，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商业体系。

其次，在逐步废除了商品配给制后，苏联开始废除原有的标准配给定价和高（非配给）定价的两种价格制度，改行全国统一的零售价格制度。国家通过对各类商品规定全国统一零售价的方式，对商品流通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1935年1月，苏联首先废除了居民面包、面粉和去壳粮的配给制，在全国营建了一个专业国营商店网，自由出售粮食。1935年10月，废除了肉、肉品、脂肪、鱼、糖的配给制，规定国营和合作社商店将这些产品按不同地区的国家统一价格出售。其后，国家又开始设立经营高质量工业品的百货店，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供销公司在各个城市纷纷设立，全面替代了原先的按非配给价格经营的各种专业的工业品商店网。依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作出的决议，食品的全国统一定价由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规定，全苏轻工业制品的统一定价由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部规定，工业品的价格由各管理局和人民委员部确定。对由各加盟共和国食品工业、轻

157

^① 1938年1月以后，苏联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改名为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各级地方商业管理机关也相应改名。

工业和森林工业的人民委员部所属各企业生产的、与全苏工业的制品相同的那些商品，广泛采用根据苏联人民委员部决议为全苏工业的制品规定的价格出售。其他商品的出厂价格由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部同苏联国内商业委员部协商规定。这样，苏联中央通过控制全国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对商品流通实施了行之有效的集中管理。

最后，苏联的生活品流通体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商品贸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商业绝大部分是有计划地由社会主义企业进行的，只有极少部分是由集体农庄庄员个人进行的，完全没有私人资本参与。而且自废除商品配给制，建立社会主义商业系统后，集体农庄的市场在苏联社会主义商业体系所占的比例还大大地降低了。1933~1934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转额占全国商品流转额的1/5，到1937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转额整整下降了约1/3。^①就是说，私人进行的商品销售活动在苏联已经变的微不足道，绝大部分的商品流通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在这个商业体系中，中央除能够规定各类商品的全国统一价格外，还能够通过制定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和紧缺物资的集中分配计划，以及确定商业从业人员的编制等手段来加强对商品流通的管理。苏联的整个流通体制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流通体制。

158

第四，在全国实行“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平均主义，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按劳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四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69页。

分配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列宁率先提出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到30年代，斯大林把“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联系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① 并把它们写进1936年苏联宪法。为了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在全国城镇普遍建立了系统的工资管理体制和社会消费基金制度，在集体农庄实行了以“劳动日”为单位确定劳动报酬的分配办法。

首先，苏联实行了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制定的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工资等级管理制。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职工工资的管理机构和决策权逐步向中央集中，最终完全集中在苏联人民委员会手里。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的地方工会和企业工会在工资问题上具有较大的决定权。但自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逐步加强对工资的集中管理，中央开始全面掌握工资的决策权和管理权。193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实行新工资等级制度和修订产量定额的决议，明确规定：苏联各级人民委员会和中央管理机关、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非经苏联人民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同意不得下达有关工资问题的指令，不得实行新的工资等级表、工资率、技术等级表和职务工资表。同时，相应地把工资管理权集中于各级政府机构，在中央政府设有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各部的劳动工资局，在地方各级政府设有劳动工资管理机构，各级工会只能在工资问题上提供一些咨询活动。在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苏联建立了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工资等级制。苏联的工资等级制度的工资形式分为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工资制，但其基本原则都是划分

^① 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4~105页。

工资等级，由上级机关用行政手段制定出工资等级、技术等级、工资标准，而不是实行劳动报酬与最终生产成果的直接挂钩。因此，这种工资制度是在行政手段强力干预下的工资等级制，完全排斥市场对劳务的调节作用。这一体制实行了一定的工资级差，根据工作情况给职工提供一定的奖励，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平均主义的约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其次，除给职工支付工资而外，苏联还实行了普遍的社会消费基金制度，为广大群众提供社会福利。所谓社会消费基金是指国家用于居民的公共福利的基金，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赡养老人和残疾人员、建立和维护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对居民的各种补贴（如房租补贴）等费用，它是苏联计划分配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部分基金是由国家集中管理的，它的分配实行的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社会消费基金的制度是在30年代逐步定型的，随着斯大林模式的日臻完善，社会消费基金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1933年，社会消费基金占国家财政的22.1%，1937年占29.1%。按人口计算，1932年每人从消费基金获得的收入为61.73卢布，1937年增至234卢布。这样，社会消费基金构成了居民实际收入的重要部分，是“对个人货币工资的极重要的补充”。这个制度为苏联居民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福利，它构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分配的重要形式。社会福利基金基本上是平均分配的，它是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

最后，集体农庄以“劳动日”为单位衡量庄员工作量，庄员按照自己的工作量领取劳动报酬。集体农庄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国家不可能直接给予农庄庄员劳动报酬，

庄员的劳动报酬主要来自集体农庄交纳各种费用后剩余的物资。按照规定，集体农庄庄员的职责是“诚实地劳动，按劳分配集体农庄的收入，保护公有制，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爱护拖拉机和机器，好好照料马匹，完成自己的工农国家所给予的任务”。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目标是“使自己的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农庄、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集体农庄在向国家缴纳法定的税款和交付保险费、日常生产需要的开支和各种公共资金后，剩下的部分就以庄员付出的劳动日的量为标准分配给庄员。劳动日是衡量庄员劳动强度和劳动量的单位，不同强度的劳动在计算劳动日量时有着一定的差别。以劳动日为单位付给庄员劳动报酬的制度实际上是苏联在集体农庄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办法。据此，集体农庄在劳动报酬分配上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平均分配，又找到了调动庄员生产积极性的办法，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劳动报酬制度。劳动日的计算办法是由集体农庄行政机关制定的，劳动日制本身也就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分配体制。

二 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斯大林执政时期，在下列三个因素的作用下苏联的政治体制逐渐具备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其一，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政治体制的特征，为了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适应，苏联政治体制必然也要带上高度集中的特点。其二，在世界战争日益临近和国内外阶级敌人时刻威胁着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客观条件下，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其三，这一体制是在列宁逝世后历次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发

展、完善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产生是党派斗争和大规模肃反运动的直接结果。下面将对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作一概述。

（一）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领导制度

共产党一党执政是苏联历史的产物。本来布尔什维克党与右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曾经形成联盟，出现过多党合作的局面。但是，在内战中，1918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参加反革命暴乱而被逐出苏维埃和政府。1921年内战结束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多次参与策划富农暴乱，与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了尖锐的对抗，这时候，出于稳定政权的考虑，布尔什维克遂将其逐出苏维埃和政府。在此期间，孟什维克内部不断分化，有些人转向右翼，与布尔什维克完全对立，自然遭到清除，另一些人在政治立场上转向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由此逐渐消亡。于是，随着各合作党派的瓦解和被清除，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的局而在客观上得以形成。后来，斯大林在历次中央会议上对一党制的正确性反复作过论述，1936年新宪法还专门对共产党的一党制给予肯定。这样，苏联一党制的存在最终得到了全面认可。

162

随着一党制的形成，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政府和苏维埃的全权。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党政关系的界限本来就很模糊，很多时候党为了处理各种突发的社会事件，不得不对各项社会生活进行强有力的直接干预，以达到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集中管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在理论上，斯大林对党领导国家的合理性早就作过扼要

论证，并就其实现途径作过论述。在党政关系上，斯大林指出，“党是政权的核心”，但不能“以党代替苏维埃即代替国家政权”；^①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领导力量”，^②但党“并不是直接实现这种专政，而是借助于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这个专政”。^③有些学者据此提出了斯大林认为党不能领导国家经济活动的论点，这种看法是对斯大林的误解。实质上，斯大林的这些表述仅仅是对执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职能作出区分，其含义不是对党的国家领导权的否定，而是在承认党的领导权的基础上指明了党领导国家的途径。后来，斯大林对于党领导国家的理论还作了非常明确的表述，他认为，执政党的口号“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④党的领导不能是“一般的”领导，应该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是“管理国家”。这些论述正是对于党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合理性的高度肯定。

在实践中，联共（布）中央通过最高苏维埃对国家进行全面领导。首先，在立法方面，苏联最高苏维埃名义上拥有立法权，但在苏联共产党掌握国家主要权力的情况下，苏维埃的这一权力是必须建立在受联共（布）领导的前提下的。最高苏维埃所通过的法规一般都是党内已经讨论成熟的决定，党通过这一途径实现其领导国家的职能。按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它必须贯彻党的指示，其工作实质上经常是对党的决定的认可和对党的工作的鼓动。一方面，最高苏维埃虽然拥有法定的立法权，但最

163

①②③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40、36、36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58~59页。

高苏维埃讨论的法律草案却是由联共（布）中央机关或政府部门提出的。在实际操作中，最高苏维埃会议对法案进行的审议主要是将党的决定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不是实质性的评判。各加盟共和国及地方苏维埃有关法规的通过也与此类似。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虽然有任免权和监督权，可以任免政府领导人及公职人员，但实际上这些领导的人选一般都是由联共（布）中央酝酿产生的，最高苏维埃的任免工作主要是对党的决定的执行。至于最高苏维埃具有的组织调查和审查委员会对一切机关及公务员进行调查的职能，一般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为苏联 1936 年宪法规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是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可以说，最高苏维埃其实是党领导国家的重要环节。

其次，在管理国家的经济生活方面，国民经济计划和指标体系、财政预算等在程序上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然后报请人民委员会审批产生，但联共（布）中央能通过领导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将这些经济决策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而且由于党内也设立有一些与国家经济部门重合的机构，一些经济决策甚至是由党直接制定的。党的十七大决定党内设立负责生产业务的部，实行党对经济工作的对口领导体制。党的十八大撤消了这些党中央的生产部（只保留农业部和学校工作部），但 1948 年，党中央又进行机构改组，党内又再次设立与政府各部相应的生产管理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建设的许多决定都是由联共（布）中央直接作出，或者与政府联合作出的。这样，政府的经济决策权力也集中到党的领导机关手上。

最后，联共（布）还可以通过撤换干部的方法加强对国家

各方面社会生活的领导。联共（布）中央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办法撤换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实现对这些机构的领导，各共和国、地区的党的机关又依次能够或间接或直接地撤换当地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从而实现对它们的领导。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事实上是政权核心，共产党掌握着国家的主要权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联共（布）掌握着苏联的主要权力，对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进行有效的领导，这本身并不是什么羞于见人的事物。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轻易地放弃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就将难以继续生存。

（二）执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

列宁曾把苏俄的政治体制界定为“民主集中制”，他提倡在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在列宁时代，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但是，在列宁逝世后，党内各派之间斗争日趋激烈，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一定的削弱。最后，随着斯大林的胜利和反对派的全线溃灭，一个新的党中央开始形成，政治局内不再存在路线的分歧。联共（布）中央终于告别了分裂局面，一个团结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再次成为党的权力中心。在党中央和政治局内，斯大林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极高的权威，其他委员都惟斯大林的马首是瞻。这个新形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权力格局随之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党的主要权力集中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①十月革命前后，俄共（布）领导全党的是中央委员会。但是，后来出于政治领导的客观需要，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政治局，并授权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做出决定”。之后，政治局很快就成为党的权力中心。按照规定，党的最高权力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有，但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中央委员会就是党的领导机关。而在中央全会休会期间，政治局就是处理党的政治事务的权力机构。在苏俄诞生初期，出于战争的特殊需要，各种“不容拖延的问题”经常集中在政治局进行解决，到了和平时期，这种做法被自然地沿袭下来。按照联共（布）党章的规定，上级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这样，政治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成了党的高级权力机关。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一系列派别斗争，也都主要是在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进行的，谁获得了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多数，谁就一定能获得胜利。在反对派溃败之前，政治局内由于有着不同的声音，而使自身权

^①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无法进行日常性的办公，它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就主要体现在选举党的中央委员和确定工作路线等重大决策事件上。一旦中央委员选举产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赋予了中央委员会以管理党的权力。由于党的中央全会也无法经常召开，中央委员会管理党的权力自然就要由政治局所承担（政治局由党的中央全会选举产生）。从党的权力的分布看，这种做法是合理而且有效的；从保持党的工作、战斗能力看，这种做法是管理党的必要手段。尤其是在国内阶级矛盾比较激烈，基层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较低的情况下，联共（布）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特点，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只要能够充分贯彻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的领导，这一情况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特征。因此，笔者认为，这是党的组织生活的正常表现，既不必闪烁其辞地去掩盖之，也不能把它界定为政治体制的弊端。

力有所削弱，在斯大林战胜了所有反对派之后，政治局就完全成为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由于党的代表大会未能定期召开，中央全会也不经常召开，几乎大多数的事务都由斯大林与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或亲信作出决定，政治局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对于这一事实，斯大林曾经多次直接给予肯定，他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是“党的最高机关”。^①

其次，书记处在政治局领导下具有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的重要权力，对党的各项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前文注解所述，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全会休会期间，党的管理权基本上集中在政治局，而在政治局召开会议的间隔，书记处作为“负责日常事务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的机关，就必然要主动积极地对党的许多日常事务作出决策。按照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的规定，书记处是政治局的秘书班子，由于政治局一般都委托书记处开展各方而具体工作，中央委员会的召开时间、议程、候选人等都由书记处运筹，甚至决议也都由书记处酝酿。这样，书记处虽然是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办事机构，但在实际工作中，书记处却往往能够行使政治局的部分决策和执行权力，成为党的重要权力机构。^②一方面，书记处具有任命中央机关、各省以至工厂、农村领导干部的权力。自国内战争时期起，党内实行了干部委任制，后来虽然实行了选

167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页。

^② 如果能够合理地贯彻民主集中制，保证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对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对党的日常事务进行决策和处理，这是保持党对各类日常事务作出适当、及时处理的工作能力的合理需要。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作为负责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的中央核心机关，党中央的书记处拥有较大权力，这并不是体制的弊端。

举制，但书记处一直通过推荐和委任的方式，行使组织人事大权。另一方面，在斯大林时期，书记处下设有组织指导部和分配部，直接对经济生产进行实质性的领导。由于斯大林同时是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又是党的总书记，书记处经常就是斯大林作出重要决定的场所。

最后，斯大林在党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历史形成的事物。在历经多次政治斗争后，原有的强有力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保留下来的和新补充进来的中央委员，大部分与斯大林在政治路线上保持高度一致。斯大林不仅掌握着党的领导机构，而且还兼任了军队的最高统帅。于是，斯大林自然而然地成为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当时，为了应付国内国际的复杂局势，树立权威是很必要的。这一方面有利于迅速形成决议，有利于根据突发的事态作出灵活应变，也有利于形成一致意见，这比之集体讨论互相推诿的做法更为迅捷高效。

168 国家经济生活高度集中的性质决定了政权的高度集中性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必然要求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因而，苏联在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时，赋予中央以极大的权力是必然的。党中央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执行和审核经济计划，实现其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全权管理。由此，苏联社会形成了一个复杂却又秩序分明的权力结构，产生了能够完全满足庞大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要求的政治体制。可见，当时联共（布）党内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制和斯大林至高无上权威的形成，乃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斯大林早就对联共（布）党内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的合理性作出了明确的论述。在斯大林看来，党的“最

高机关是全会”，“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①这说明，党的中央全会和政治局掌握主要权力不仅是事实存在着的，而且还是经斯大林认可的。

总之，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是一种现实必然要求。如前文注解所述，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和政治局的政治体制，如果能够贯彻民主集中制，能够按时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通过党的重要决议，选举新一届党的中央委员，它对社会主义建设是能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当权力从高度集中蜕化为过度集中时，当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全会都未能按时召开，当权力从集中于党中央、政治局转而逐渐集中到党的最高领导个人手里时，党的高级领导、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就将得不到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将受到破坏，党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会受到损害。就是说，要把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高度集中政治体制和权力过度集中于领导者个人手中的政治领导机制区分开来，不能在否定后者时对前者也作出否定。

（三）联盟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实行强有力的领导

在国家结构上，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在苏联成立前夕，列宁就曾建议“把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集中的苏维埃国家”，这同斯大林等人关于各共和国“在自治的基础上加入俄罗斯联邦”的主张有着原则区别。列宁在同斯大林单独交谈中，对‘自治化’草案提出了批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页。

评。^① 在列宁的坚持下，联共（布）中央不再要求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而促成各共和国“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② 1922年12月30日，根据列宁的倡议，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按平等和自愿原则联合成为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苏联”宣告诞生。

按照列宁的设想，苏联应该是各加盟共和国平等自愿的联盟，不存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各加盟共和国都有地方自主权，中央不过多地委任地方行政机关领导；实行地方行政机关的双重从属制，它既从属于上级和中央机关，又从属于地方苏维埃权力机关；在党内关系上，党组织对地方性的问题有较大的自主决定的权力。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列宁这些设想的实现受到了很多限制。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受社会条件所制约，苏联的联邦制越来越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中央机关权力膨胀，联盟国家机关行使着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权力，中央往往对各加盟共和国实行直接管理。

170 在政治权力上，联共（布）中央对各共和国党领导机构拥有绝对领导权，这是由党的高度集中领导机制所决定的。一方面各共和国、各州、市的党的领导人由上级中央委派，另一方面，各级党委都必须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各项决策。各共和国苏维埃及政权机关又都由各共和国党委会领导，同时又要在业务上受联盟中央及最高苏维埃领导。1936年宪法甚至把各共和国的立法权，包括制定刑法和民法的权力都收归联盟中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0页。

^② 参阅《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214页。

央。同时，联盟中央颁布的重要法律和法典都适用于各加盟共和国。这种做法比较有利于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进行领导，各共和国自愿加入和脱离联盟的权利在实践上则是无法得以行使的。

在经济管理权上，随着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各共和国只能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完成经济计划，不可能拥有经济管理的自主权。国家计委制定各项经济指标，然后下达给各企业加以执行，实行条条为主的统一管理乃是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生命线。既然经济计划一经制定，即享有法律的权力，那么，各共和国就只有贯彻执行的权利。由于企业的人财权、产供销权都直接由中央各部门加以控制，加盟共和国仅有的经济权限就只能体现在对共和国下属小企业的管理上。

国家结构的联邦制还必须服从于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在执行一党制的条件下，各地方、各加盟共和国的行政权力基本上都为联共（布）各级机关所掌握。各地方、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的机关权力又都逐级向联共（布）中央集中，最后集中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都主动地把联盟中央的整体利益摆在第一位，一般不敢向中央索取本民族的利益。限于历史条件，党有时还用强力压制的粗暴办法去处理民族问题，这虽能暂时缓解民族矛盾，但却未能及时、正确地解决之，最终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更大的危害。

在苏联联邦制的实际运作中，虽然斯大林基本上坚持实施了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维持了苏联统一的局面。但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苏联宪法规定的各民族自愿联合、权利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贯彻，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基本上都向联盟中央集中。

(四) 通过安全机关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就会失去当家作主的权力。特别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它可能一天也无法生存。

斯大林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依据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认识，认为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① 苏联 20 世纪 20 年代末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则又反过来强化了斯大林对于国内阶级斗争局势的认识。他认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②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进展愈多，阶级斗争就愈激烈。斯大林又据此认为，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③ 因此，无论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是在宣布建成社

172

①③ 参阅《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190、190 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 129 页

会主义之后，斯大林在实际上都没有放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镇压作用由此得到了加强。于是，在“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外”，另一端“在苏联境内”^①的复杂环境下，斯大林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的认识。为了有效地强化国家政权，斯大林充分调动了国家安全保卫机关的积极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国家安全保卫机关源自于“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全俄非常委员会——契卡。这个机关虽然数易其名，但其核心职能就是镇压危害苏维埃政权的分子。“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契卡，是革命时期打击反革命势力的重要武器，它名义上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实际上直属党中央的指挥。在战时，契卡曾经发挥过卓越贡献，但也出现了滥用权力的现象。因此，列宁很早就看到了限制契卡职能的必要性。1922年，契卡改名为格勃乌（即国家政治保安局），隶属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1923年，国家政治保安局又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出，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奥格勃乌，直属人民委员会。此时，在列宁的领导下，无论是格勃乌还是奥格勃乌，其权力都已经大为缩小，只保留了处罚个别罪犯流放或监禁三年以下徒刑的权利。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又逐步扩大这个机关的职权。1928~1930年期间，国家安全保卫总局积极参与了肃反运动。1934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成立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统一领导全国性的肃反运动。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肃反运

173

^①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129页。

动逐步升级。1936年夏，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授权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期一年的全权以便彻底摧毁“人民的敌人”。1937年联共（布）中央六月全会决定把这项权力无限延长。从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判职能和权力大大扩大，它可以通过集中行使公、检、法三家职权的特殊机构——“特别会议”及其下属的“三人小组”对被认为“危害社会的人”采取流放、驱逐出境、监禁等处罚；对“国事罪案件”的侦查和审理可以采用不遵循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不准上诉，不准申请赦免，还具有判处罪犯死刑的最高刑罚权力。

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和职能的变动后，这个国家安全保卫机关（曾归入内务部，后又单独称为安全部）只受斯大林一个人控制，不受党、政、军约束，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审判程序，在全国形成了自成系统的情报网络，对包括党中央委员和军队高级领导的干部都具有处理权力。当时，国家安全保卫机关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力，它不受中央机关领导，不受法律约束，只听命于斯大林个人，而且还拥有种种特权。它可以随意逮捕包括党中央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在内的各级党政干部，然后能够对这些人处以极刑，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一批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被错误地处决了。当然，不可否认，安全机关在苏联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清除了一批危害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以及潜在的“第五纵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采取的过火行为和残酷斗争的做法也给党带来了损失，种下了许多不必要的阶级仇恨，造成了党的大批优秀干部的损失，同时还直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通过安全机关采取肃反扩大化的办法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职能，这给当时苏联的社会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执政党，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领导机关，甚至集中到领袖个人手中，专政机关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等。这种政治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使苏联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它是不能持久的，其弊病迟早会暴露出来。而且抑之越久，发之也暴。后来苏联事态的发展，恰恰应了中国的这句古话。

三 斯大林模式文化体制的基本特征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急剧的经济体制转轨中，苏联思想文化界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随着斯大林等人的胜利，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逐渐被斯大林模式所代替，斯大林模式的文化体制也逐渐形成。文化是为经济、政治服务的，与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的特征相适应，斯大林模式的文化体制也相应地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

概而言之，斯大林模式的文化体制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通过政治批判构造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准则

历经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末残酷的政治斗争、文化大批判和 30 年代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之后，苏联社会逐步告别了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格局。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立为社会生活的最高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社会指导思想一元化的现象由此形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联共（布）对全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都进行了严格控制，期间形成的意识形态基本准则有：（1）“政治第一”的准则，国家对文化领域实行严厉的意识形态监控，

学术活动政治化，各种文化学术研究和争论都必须遵循党性标准；(2)“舆论高度一律”的准则，在新闻领域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只准许官方认可的某一学派存在；(3)在科学领域确立起哲学的支配地位，哲学强行干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经常被插上党性的标签。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准则的确立，经历了下列几个重要的阶段，在其中的每个阶段中，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增添了重要的内容。

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斗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为了在党内斗争中取得胜利，为了实践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了推动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其中首要的工作就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机构，控制意识形态阵地。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布哈林很快就被解除了《真理报》主编的职务，斯大林的得力助手麦赫利斯继任该职务。原本主要由布哈林掌握的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开始归斯大林所有。这是斯大林在文化领域斗争中获得的重大胜利。在卢那察尔斯基辞去教育人民委员职务后，联共（布）中央对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改组，更换了该部的大批干部。遍布全国的教育系统，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镇，开始为斯大林全面掌握。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的领导职务也都相继为斯大林的得力亲信所接任。各重要报刊的主要领导也作了大规模的撤换。由此，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基本上都为斯大林所掌握。于是，党的组织活动权、人事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都集中到斯大林手上。正是凭借其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牢牢不可动摇的地位，斯大林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全面的阐发，并把经自己阐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为苏联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

二是在各学术领域开展大批判，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争论，通过政治干预的办法扶植新的学术派别。在经济理论界，对“鲁宾派”和“机械论派”经济学家进行了批判。在哲学界，组织米丁和尤金等年轻哲学家，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批判，并改组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在文艺界，解散“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史学界，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断定其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学派。^①从而使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各个领域都成为贯彻党的中央领导意志的文化阵地，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和探讨开始能够与中央保持一致，很好地贯彻中央的精神，为中央的决策作宣传和鼓动。在战争日益迫近的非常时期，实行这种特殊的文化体制具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但是，这种行为本身随时都可能对学术研究活动产生极大的危害。

最后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和发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习宣传运动，树立理论宣传的准绳，从而使斯大林模式的意识形态准则得以完全确立。有位专门研究苏联文化问题的学者指出：“该书出版后，实际上成了在苏联判断思想理论是非的标准，裁定意识形态准则的最高法绳。”^②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当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件大事，该书全面阐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合法地位，论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社会发展战略，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民族联盟的国家制度。斯大林亲自撰写了该书的部分内容——《辩证唯物主

177

^① 《真理报》，1936年1月27日。

^② 马龙闪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人们常说的“四章二节”（指第四章第二节）。斯大林的这一哲学论著，虽然存在许多缺陷，但它文字简洁，表达清楚，通俗易懂。在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仍然没有较清楚认识的情况下，这一论著的出版发挥了全面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作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在很长时间内，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基本都只是对斯大林这一哲学著作的发挥而已。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基本上左右了数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哲学意识。此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对于统一人们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该书全面而扼要地概述了联共（布）党史，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作了简明概括。总体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为斯大林模式走向成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以官方“钦定”的方式清楚地阐发了斯大林模式的许多基本问题，在理论上全面认可了斯大林模式的合法地位。这为苏联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了理论准则。而且即便是该书的一些弊病，比如片面拔高斯大林历史作用的做法，论述问题的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做法等等，恰恰也促进了斯大林模式一系列基本特征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说，该书的这些做法，等于是由联共（布）中央出面认可了这种吹捧行为，个人崇拜、权力高度集中等等现象都能从中获得意识形态的许可权。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意识形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放在突出的地位，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出版和发行，特别强调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这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在当时的

政治气氛下，党性问题经常被过分夸大了，领导者经常采用政治行为干预学术，为学术研究人为地设定禁区，不允许不同学术派别的存在。这些都严重地扼制了学术研究的生机，违背了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总之，形成于非常时期的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准则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从根本上说，由于它具有明显的用政治干预学术的特点，最终会妨碍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高度集中的文化领导体制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为满足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斯大林通过组织分配部对思想文化部门进行机构调整，控制了这些部门的人事管理权和领导权。思想文化部门的实际领导权逐渐从布哈林和波克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手中转向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的手中。1929年春天，卢那察尔斯基迫于形势，辞去担任12年之久的教育部长职务。麦赫利斯接替了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职务，卡冈诺维奇作为书记处书记，接过布哈林手中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指挥权。1934年，日丹诺夫又继卡冈诺维奇而成为思想文化界的最高指挥官，成为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30年代的文化斗争中，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决策和指示，经常是由日丹诺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亲自提笔或令专门委员会起草形成，然后经政治局通过而颁布的。诸如，1935年2~3月颁布的《关于改组中央文化宣传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决议草案的制定就是如此。这种工作方式虽然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的缺点，但在非常时期它能够充分、高效地实现党对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确保思想文化领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联共（布）中央的文化意识形态机构的权力大为集中，党对报刊、学校及其他各文化部门的领导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历经30年代多次党的宣传部门、文化领导机构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改组，包括各共和国、州、市的文化、教育部门的改组后，根据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在中央各级机关的督促下，各类报刊宣传读物都严格贯彻中央的精神，积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为党和国家的决策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学校的思想理论教育也掌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手中，学校对学生进行着简明而又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为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国家系统的文化管理机构也作了改组，全苏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职权集中到联盟中央。30年代期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全面改组之后，科学院、高等院校、艺术委员会、电影联合会等领导机构都逐渐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分离出来，划归苏联人民委员会规划管理，各共和国均设立相应的管理局。随着专业化划分的不断深入细致，联盟中央对文化事业的管理更为集中，中央对国家的文化事业的管理更为加强。

180 为了确保苏维埃文化发展的思想方向，联共（布）党内文化领导机构与国家系统文化领导部门协同确定了统一的文化工作路线。联共（布）十六大对党的文化工作路线作过明确表述，指出：为了使整个文化工作充满“共产主义的内容”，必须“反对使文化工作脱离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任何企图，坚决克服文化工作中不问政治和狭隘文化主义的倾向”。^① 根据这一精神，苏联全国上下开展了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教育宣传活动，把普遍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作为党和国家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5卷，莫斯科1984年第9版，第181页。

当前的重要任务。

集中管理和高度计划成为国家管理文化和科学研究事业的主要方法和手段。1928年，全苏宣传鼓动和文化建设会议作出了“将计划性纳入苏联科学组织工作”的决定。^①根据这一指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很快确立了集中化和计划化的新型管理模式。1929年5月27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加强科学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对全苏社会科学的集中统一问题作出具体全面的规定。共产主义科学院被确定为全苏科研“计划中心”，它必须协调各部门科学研究所同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关系，同时应对它们进行思想领导。^②联共（布）中央提倡，要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将整个科学体系用于满足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31年3月，国家计委召开了第一次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从此，科学管理的计划化制度被确立下来，并逐年推进。从苏联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的成就看，斯大林模式这一集中计划管理办法对于提高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苏联科学技术水平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等方面显然都具有不容否定的意义。

学术文化团体逐渐行政化。与文化体制不断集中化、计划化的进程相适应，大量民间学术团体被取缔，一些学术文化团体被改组，新产生的团体从一开始就带有准官方机构的特点，这使苏联的各学术团体都带上了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比如，新成立的苏联作协和全苏科学技术协会就具有相当大的管理职能。很多科学学会，如马克思主义者史学家学会、唯物主义者

181

^{①②} 《苏共论文化、教育和科学》（文件汇编），莫斯科1974年版，第445、447页。

生物家协会都隶属于共产主义科学院。而且学术团体行政化倾向还越来越严重，学术团体的主要领导人经常由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兼任，实质上是由上级委派，而且多年连任，甚至几十年不变。这些学术文化团体有时甚至成了党和政府的特殊机构。比如，“战斗辩证唯物主义协会”就其全部活动来看，俨然就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一个机构。其他协会也都具有与“知识界反动分子”，与“不问政治者”的中立立场作斗争的类似职能。这种做法虽然带有行政方法干预学术研究的弊端，但在非常时期，它对于维护思想文化阵地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182

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逐渐形成。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苏联一直没有建立全苏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与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名义上是平行的加盟共和国机构，但前者实际上行使着全苏的权限。为了快速发展教育事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普遍的文化水平，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逐步摸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教育管理体制。1931年8月党中央通过《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议，1932年9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制度》的决议，教育部门开始统一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规定不同门类的技术人才的学年制，使学校教育管理相对集中，同时提高了教育质量。1936年以后，联共（布）中央形成《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决议，对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改组，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内成立了小学局、不完全中学和中学局、高校局、学前儿童局、图书馆局、文化局、成人学校和培训局、博物馆局等19个司局部门，对各教育单位进行分别管理。随后，各加盟共和国教育

人民委员部也依此进行改组。联共（布）中央还决定将各加盟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置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之下，由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行使管理全苏教育事业的权限。各加盟共和国州、区也都依次设立教育局，对所在区域教育事业进行管理。至此，全苏的教育管理系统基本成型，各级教育局都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下，各司其职地对所在地域的教育事业进行集中领导。

斯大林模式的文化体制与其经济、政治管理体制一样，它对于推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它的确加强了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较好地满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另一方面，这种管理体制带有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病，违反了文化事业发展的规律，政治干预学术的行为阻碍了科学的自由发展。所以，这种体制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但对于文化事业的长期发展则有着消极作用，最终甚至会阻碍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

20世纪20年代末，在各反对派相继溃败后，斯大林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得以牢固确立。随后，苏联国内就逐渐掀起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活动。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满五十寿辰，全国上下对斯大林进行了歌功颂德。很快，斯大林被称颂为“当代的列宁”，全国各地每个城镇的广场和公共建筑物内到处是斯大林的全身塑像和半身塑像。^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183

^① 参见伊恩·格雷著：《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移，这股热潮仍在不断升温。

1934年，《真理报》在该年第1期上用两版篇幅刊发了前反对派主要人物拉狄克撰写的长文，文中肉麻地称颂斯大林“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他和列宁一样能够高瞻远瞩”。^①可见，反对派已经分化，其中不少人已经转变立场，转而对斯大林顶礼膜拜。1934年，在联共（布）七大上，联共（布）中央各主要领导纷纷发言，称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期间，基洛夫也发言提出，要将斯大林同志讲话中的一切建议和考虑作为我们的法律。古比雪夫则在会上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都归功于“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②最后，联共（布）党的七大竟然通过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以斯大林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③

此后，这股风气还在继续升温。各种报刊开始大肆宣扬斯大林是伟大天才，各级干部都在竞相吹捧斯大林，称之为“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等等……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该书迅即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由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章节甚至被吹捧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

① 转引自罗·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② 古比雪夫著：《古比雪夫论文集》第334页。转引自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③ 《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1页。

1949年底，为庆祝斯大林70大寿，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竞相祝贺，再次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1951年7月，斯大林以部长会议主席名义签署命令：“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的大型纪念碑”。至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作为一种畸形的精神现象，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主要是旧俄文化传统和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的产物，并非社会主义的固有现象。

首先，个人崇拜是旧俄落后文化传统的再现。旧沙俄时代，沙皇借用东正教，拼命宣扬“沙皇爷爷”为“人间上帝”，绝大多数的农奴都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沙皇身上。这种对统治者的无限崇拜，成为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它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根除。在斯大林时期，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受到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自觉地就把旧俄时代对沙皇的崇拜转化为对斯大林的崇拜。^①马克思关于“一切死亡前的传统好像噩梦般都笼罩着活人的头脑”，列宁关于“千百万人习惯的势力是可怕的势力”的论断，在此得到了深刻的印证。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比较稳定，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革，因此，个人崇拜的落后现象才会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再现。

其次，个人崇拜是政治体制弊端的产物。一方面，由于斯

^① 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于分析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现象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在当时，人们崇拜领袖的心理要求会相互影响，产生互动，由个体的心理认知逐渐共融而构成统一的社会群体行为，一个全社会范围的个人崇拜社会心理由此形成。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可参阅周晓红著：《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角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沙莲香著：《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弱，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关系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容易使领袖人物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各级干部几乎都由上级任免，高级干部的权力职位几乎完全由领袖掌握，这就容易使有些干部认不清领袖的积极作用与人民群众的关键作用的辩证关系，过分盲目地崇拜权威。于是，在这样的体制内部，一些社会主义意识仍然不够成熟的党员干部出于个人职务升迁的考虑，企图通过阿谀奉承的办法，去获得信赖、提拔和重用，就大肆吹捧领袖，把领袖神化，搞个人崇拜。正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洛万·吉拉斯在其《与斯大林谈话》书所指出的，“神化斯大林……若说是他自己搞起来，至少也同样是斯大林手下的那一班人和官僚机构制造出来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位领袖”。^①

186

最后，个人崇拜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格格不入的文化现象。它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杰出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原理是相违背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杰出历史人物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再大，也不能超越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而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② 马克思曾在有关书信中写道：“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③ 恩格斯也明确表

^① 转引自伊恩·格雷著：《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② 参阅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9页。

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① 列宁对颂扬个人的风气尤为厌恶，早在 1918 年，他就曾对这类现象进行过谴责，并且说：“我们必须逐渐刹住这样的事情。”^② 1956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痛责个人崇拜为“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称其为“自然经济”和“家长制”的产物。文中针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个人崇拜现象指出：“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③

总之，苏联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是个人崇拜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个人崇拜现象的消除，既要通过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也要积极地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入手，使个人权力得到应有的约束，切实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社会生活逐渐实现法制化和民主化。而且这一历史残余的根除，最终还有赖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成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09 页。

② 《关于列宁的片段》，苏联《消息报》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00 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0、231 页。

第四章 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属性、历史作用及弊端

188

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最终是为了对斯大林模式作出综合评价。首先，对斯大林模式基本特征的分析将直接引导出对它的制度属性的定位。换个角度说，前文一直将斯大林模式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那么这里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属性的分析，其实就是对“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的逻辑论证。其次，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事实看，斯大林模式创造过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等积极作用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①当然，不可否认，斯大林模式内在地包含有许多严重的弊端，这些弊端在其执行的早期即已经有

^①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之一。但是，由于行文设计的需要，本章暂不讨论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作用。有关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作用，将在第五章“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的深刻影响”进行探讨。

所暴露，而且越到后来表现得越明显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此独特的历史角色，使斯大林模式本身汇聚了社会制度分析的许多研究焦点。

一 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属性

社会模式指的是一定政府代表统治阶级在组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时所提倡的理念、所组建的体制和所实行的政策、方针等。我们把社会模式定义为一定社会的理念、体制、政策和方针的总和，它不直接包含制度的含义。但一定的社会模式必然有其社会制度属性，就是说它一定是属于某种社会制度的，比如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社会主义制度。本文对斯大林模式的性质的界定，就是对它属于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的分析。可以讲，如果斯大林模式具备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也即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因此，要弄清楚斯大林模式的性质，就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作出比较研究，揭示它们的异同。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分析

在一般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包含有学说、运动和社会制度三重含义，这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在此，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论述，主要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为简便起见，人们常用“社会主义”去指作为制度的科学社会主义。本书遵照这一习惯，将科学社会主义简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就是专指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指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也不指后来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等社会主

义思潮。^① 因此，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分析，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分析。

那么，到底社会主义具有什么本质特征呢？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作宏观的把握。

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必将无法容纳社会化大生产创造的财富，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据此，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天才的预见，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作了勾画。这些预见就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见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语，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他们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具有下列特征：第一，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一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即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第二，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废除商品生产。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以后，社会管理机构将对全社会的生产实行计划调节，整个社会只存在惟一的经济主体，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流动都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因而商品和货币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第三，消费资料由个人占有，实行按劳分配。社会总产品在扣除一部分用以再生产后，其余部分将用作消费资料，并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

^① 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所提及的“社会主义”均指科学社会主义。

动量将这些消费资料分配给劳动者个人。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产品极大丰富，人的觉悟有了极大提高，将实行按需分配。第四，剥削和阶级将消灭。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经过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将利用取得的政治统治，组织社会的经济政治活动，以极大地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同时在思想上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旧社会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因此，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生活各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但剥削和阶级将趋于消亡。最后，国家将自行消亡，代之而起的是“自由人联合体”。“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自由人联合体将代替国家行使管理社会的职能。在自由人联合体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人的各种各样的异化都将被扬弃，人将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预见被后人称为共产主义原则，它们对于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只要能够对之作出正确的理解，就能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首先，这些预见是以普遍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必要条件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一刻也不能放松发展生产力的工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绝对必须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②就

191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86页。

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即使是在高度发达的西欧取得了胜利，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仍然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首要的任务。如果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那么，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就显的更加紧迫，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其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且，如果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没有获得普遍而高度发展，即使是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也是难以长期存在的，旧社会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其次，这些预见是建立在一定历史条件上的，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紧紧地结合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见作出科学合理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设想是建立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上的，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发达的西欧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首先取得胜利，那么，已经取得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就必将遇到与这些设想迥异的社会条件。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将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已经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的社会条件，由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根本就不存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对的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先进政治制度和落后的经济基础的矛盾。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条件，灵活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机械套用的做法是绝对不可行的。苏联（苏俄）的情况就是如此。十月革命后，列宁等社会主义建设者就不得不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努力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所应具备的物质文化水平。^①对此，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晚年多次说过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这一论述为人们树立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树立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预见的榜样。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和上述两点认识可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积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生产进行计划调节；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内，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阶级和国家走向消亡；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自由人的联合体将全面管理社会的活动。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③其中，尤其要提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阶级和国家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走向消

^① 参见列宁著《论俄国革命》文中有关论述。《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7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③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与这一认识是内在一致的。1992年春天，邓小平郑重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其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对发展生产力和实行生产关系变革的新概括；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从目标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中关于实行按劳分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含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中的人的全面发展、国家的消亡和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含义作出的概要表述。可以说，邓小平是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扼要准确的语言从新的角度表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亡的设想，是基于共产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如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首先建立，它的周围存在着大量欲致之于死地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仍然不可能取消国家管理社会和抵御侵略的职能。总体上说，一定社会的政府在组织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时，如果依据实际条件贯彻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这些共产主义基本原则，那它就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该政府组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社会模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

（二）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

前文提及，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形成的社会模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时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党人在新的环境下实践社会主义的结果。从指导思想上看，斯大林模式的创建和实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如果斯大林模式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

194 综合本书第三章的论述，可以将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下列几点：（1）在经济上，建成比较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通过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贯彻中央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排斥市场机制，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统一管理。通过工资等级制实行按劳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又有效地消除了两极分化。（2）在政治上，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领导体制，执政党通过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对国家进行强有力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组织社会经济活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对内镇压各类破坏社会主

义建设和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敌对分子，对外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他各种敌对活动。通过加强阶级斗争的途径去达到消灭阶级的目标，通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去达到国家消亡的目标。(3) 在文化上，斯大林模式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对文化科学事业进行了集中管理，经常用政治办法干预学术争论，出现了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

比较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可见，斯大林模式具有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也具有自身的个性。从它具有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的模式。从它所具有的个性看，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是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将其看作适合于任何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模式。

首先，斯大林模式具有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从斯大林模式的指导性理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看，尽管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具有不完全一致的内容，但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当时，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农业集体化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理论等都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党人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分析社会现实得出的结论，具有明显的现实合理性。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实行斯大林模式后，苏联用十多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成为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这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的本质特征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建立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将由社会占

有全部生产资料的论断基本一致。从消费资料的分配看，斯大林模式实行了以工资等级制为基础的按劳分配，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一致的。在政治上，斯大林模式实行了共产党一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经过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基本符合。在文化上，斯大林模式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意识形态，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所以说，斯大林模式具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

其次，斯大林模式具有自身的个性，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不能在任何历史时代的国家、地区随意挪用。斯大林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实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当地实践得出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相比，具有不少差别，这些差别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个性。其一，斯大林模式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马克思、恩格斯说未来“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② 斯大林则推论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③ 的结论，于是领导苏联人民建立起了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其二，斯大林模式的集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页。

化大农业是用行政办法强制建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应该与农民阶级建成工农联盟，他们反对用暴力的方式改造小农。列宁也反对用暴力剥夺的方法改造农民。他说：“任何法令都不能使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①然而，苏联集体农庄的建立则大量采用了行政和暴力手段，国家对集体农庄的管理也是采用行政办法的，包括强制规定集体农庄的重要生产指标和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对农庄进行政治监督等等。其三，斯大林提倡通过加强阶级斗争的途径去达到阶级消灭的目标，通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去达到国家消亡的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都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相作用的产物，并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去废除的。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阶级斗争非常残酷，党内斗争经常被等同于阶级斗争，国家安全保卫机关经常破坏法制，随意逮捕、处决党的高级干部。其四，斯大林模式具有权力过度集中的特点，允许个人崇拜现象的滋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实行的应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但在苏联斯大林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不一致的。至于个人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历来是坚决反对的。他们把个人崇拜看作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斯大林模式则包含有这一落后的现象。斯大林模式的这些个性，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特征，而是它独有的内涵。但是，必须指出，这些个性只是斯大林模式具有的一些特征，只要斯大林模式具有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它们的存在就不能用以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最后，必须指出，有关斯大林模式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形式、不是社会主义模式的论断是不准确的。在研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时，国内外有些学者经常笼统地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称为“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已被赋予一定的贬义色彩），又简单地把斯大林的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机械对比，提出了“斯大林主义”不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俄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等等观点。这种做法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无视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先获得生存才能发展，无产阶级政权只有先获得巩固才能发展壮大的常识，一味地夸大斯大林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其结论具有形而上学的特色，不符合事实。在我们看来，尽管斯大林模式具有鲜明的个性，其中有些甚至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格格不入的，比如个人崇拜，它们的存在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但并没有影响科学社会主义最一般原理在苏联的实践。只要斯大林模式内在地包含有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它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

二 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

从苏联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斯大林模式的实行不仅使苏联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取得重大成就，而且还使苏联在短期内完成备战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功地进行战时动员，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外有帝国主义国家的疯狂破坏和进攻，内有激烈的社会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恶劣形势下，苏联所取得的重大的成就是世所罕见的，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模式的

历史作用。

（一）功绩卓著的备战作用

斯大林模式的第一个重要的历史作用是使苏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取决于人心向背，但也是物质力量的较量。苏联对德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但是如果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条件作基础，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凝集全国人民战斗力的社会模式为屏障，也是很难取胜的。斯大林模式对于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备模式。

备战的首要任务是增强军事经济潜力和形成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在这两方面斯大林模式都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首先，斯大林模式为苏联锻造雄厚的军事经济潜力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发展战备经济时，国家通常要快速提高重工业经济实力，合理调整生产力的地理分布，储备军事用粮和被服，保障国家能够在短期间内进行战争动员，建立协调的战时经济，为军队提供足够的军事物资。在这几方面，斯大林模式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

在发展具有高度国防意义的重工业方面，斯大林模式的实行使苏联走上了重工业先行的道路，具有重要国防意义的重工业，如机器制造、金属加工、能源交通、化学工业等都优先获得了重大发展。与1913年相比，1940年各个经济部门的固定生产基金超过1913年水平的1.6倍，国民收入增长了4.3倍，工业总产值增加6.7倍，各种运输的货运量增长了2.9倍。到1939年底，苏联在发展重要军事力量方面的潜力已经名列世界第二至第四位。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苏联在机器制造

业（对生产战斗武器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门）产量上已经超过欧洲所有国家。^①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重工业已经在工业内部占据绝对优势，在加紧备战的1937~1940年期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45%，而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产值增加了76%，化学工业增加了61%。^②1940年所形成的工业产业结构，已经使国民经济具备了必要的灵活性，并具备了在需要时大幅增加军用产品生产和调配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设备的能力，为大批生产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武器奠定了强大的国防物质基础。

200 在生产力的地理分布方面，实行斯大林模式后，苏联凭借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形成了一个能够满足长期战争需要的生产力合理布局。实行斯大林模式之前，苏联具有军事经济潜力的工业基础主要分布在欧洲部分。实行斯大林模式之后，苏联发挥出了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优势，运用行政办法重新对资源、技术、劳动力进行配置，在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和远东迅速发展起强大的工业基础。1940年，乌拉尔已经发展成为继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之后的第四个机器制造业中心，远东地区已经为国家提供了全部铸铁的28.9%。生产力地理分布的这些调整，有效地提高了战争时期国民经济的应对能力，保持了国民经济在战争条件下的有效工作能力。后来苏联能够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失利，实现战略反攻的事实充分证明，斯大林模式在调整国家生产力布局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使苏联在战时能够持久地保持强大

^{①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1、112页。

的经济实力，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在军事用粮和被服的储备方面，斯大林模式的实行不仅为国防建设提供了适时足够的粮食和物资，而且较好地完成了储备任务。虽然，农业生产在实行斯大林模式后本身没有获得大的提高，但粮食的征购量实现了明显的增长，棉产量获得了大的提高。在粮食方面，集体化后，国家的粮食征购量逐年递增。1928年苏联的谷物征购量为107.9百万公担，1929年为160.8百万公担；1931年为228.3百万公担；1934年为269.6百万公担。^①在棉花方面，1940年苏联生产的棉花达270万吨，等于是1913年的3.5倍（1913年，俄国生产的籽棉产量为74万吨）。后来斯大林在提及军队粮食和被服的供应时清楚地说过：“至于说到红军的粮食和被服的供给，谁都知道，前线在这方面不仅一点也不缺乏，甚至还有必要的储备。”^②这清楚地反映出了斯大林模式在储备战备物资上的优势。

其次，斯大林模式使国内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局势，清除了国内阶级敌人，肃清了各种可能的“第五纵队”分子。在一系列残酷的党内外斗争中，斯大林树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斯大林模式随之形成。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为了实行斯大林模式，将党内各个反对派纷纷击败，直至清除出党，党内结束了自列宁逝世后出现的纷争局面，一个团结的高度集中的党中央再度形成。为了进行农业集体化，在农村发起了消灭富农的行动，富农作为一个长期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基本被消灭殆尽。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各种代表旧资产阶级势力的、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分子受到了镇压，

201

① [苏] A·诺夫著：《苏联经济史》，米德尔塞克斯1969年，第696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8页。

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被进行了一番改造。虽然这些党内外斗争都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它们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进行紧张备战的时刻，巩固国家政权，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清除各种可能的“第五纵队”分子，以免战时腹背受敌，这无疑是有必要的。事实上，德国法西斯的确曾经设想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境内的农民和知识分子起来造反，在苏联后方制造内乱，但是正义的战争使苏联人民同仇敌忾，集体农民和城市工人团结一致共同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成果和苏维埃政权，法西斯德国在苏联组建“第五纵队”的阴谋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斯大林本人对斯大林模式的备战优势有着清楚的认识。1946年2月，在总结战备工作时，他曾扼要地指出，战前的二个五年计划，为备战创造了“绝对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一认识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第二，在战时，斯大林模式能够有效地调动全国一切力量组织起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

202 1941年面对德军的突然入侵，斯大林号召全苏人民不要相信“德国军队无敌”之类的吹嘘，把全国的一切转入战争轨道，“为保卫祖国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全国人民表现出了临危不惧、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斯大林模式所具有的备战优势很快就全面转化为战时的组织优势，有效地发起规模宏大的战时动员，为苏联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基础。德军入侵后，凭借斯大林模式的组织优势，苏联迅速进行了全面战时动员。一方面是组织队伍进行战斗，将大批的民用工业转为军事工业，一方面是组织工业和人员的搬迁、撤退，两者都创造了惊人的成就。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头8个月内，就有530万人应征入伍，至1941年年末，苏联红军就新组建了400

多个师。^① 在战争爆发后的前半年，有 110 万共产党员赴前线作战，其中包括 500 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至区委的各级党组织的书记，270 名党中央机关的负责人。从战争爆发起，大批的民用工厂就开始转产军事用品。1942 年与 1940 年相比，苏联工业中战争需求的产品份额由 26% 增到 68%。^② 1941 年，在红军遭遇失利的严峻形势下，在组织战时的人员撤退和物资转移方面，在三个月时间内，苏联从西部地区搬迁了 1523 个工业企业，其中有 1360 个具有重要国防意义的大型企业和大批撤向乌拉尔、西伯利亚一带的重工业；铁路运输了 150 万节车箱的企业搬迁物资，向后方输送了 1000 多万人。有效地保留下了前三个五年计划的物质成就，为最后形成压倒优势的军事实力创造了条件。这不仅使德国法西斯没能掠夺到预期的物资，而且为今后发起反攻保留了力量。

在战时，斯大林模式发挥了军事经济体制的重要作用，使苏联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在军事领导方面，战争发生后，苏联立刻成立国防委员会，斯大林亲自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全面领导战时的经济、政治、宣传和战斗工作，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斯大林个人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使斯大林模式在战时表现出了军事经济体制的特征，举国上下成为一个军事战斗集体。在国防委员会的集中领导下，苏联人民全民皆兵的行动是苏联克服战时困难、打败德军的重要保证。斯大林模式全面从战备体制转变为战争体制，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了军事轨道、

203

① [苏] 莫罗佐夫主编：《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史（1941～1945 年）》第 6 卷，莫斯科 1965 年版，第 46 页。

② [苏] C·余达著：《苏维埃 50 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325 页。

有计划地将民用工业转为军工业；对物力、财力和人力都作了大调整，一切以有利于战时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开展工作；对运输业进行军事改组，一切服从前线的需要。经济体制的这些转变为苏联打败德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武器的生产方面，斯大林模式所锻造的民用工业大批转化为军事工业，战前工业化的积累和战争中高度集中的工业生产创造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有数据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三年，苏联每年平均生产坦克、自动火炮和装甲汽车3万多辆，飞机4万架，大炮近12万门，轻重机枪近45万挺，步枪300多万支，自动步枪约200万支。到1945年1月，苏联在技术装备上已占绝对优势，大炮比德军多2.2倍，坦克多1.8倍，战斗机多6.4倍。在《斯大林时代》书中，路易斯·安娜·斯特朗生动地描述道：在苏联内地的坦克生产工厂，新造的坦克刚刚从生产线试行开出，即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军事装备的优势奠定了苏联红军的战斗力。在群众的组织和调动方面，遍布广大农村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争爆发后，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重新设立了政治部，领导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生产、物资转移和军事斗争活动。战争中，集体农庄的庄员和国营农场的工人俨然就是一支支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战事间隔时抢救抢运粮食，遇到邻近的战事则能够组成一支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队伍配合红军作战。在红军与德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刻，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对红军是非常有力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积极成果。

204

就是说，在至今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战斗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战场上，斯大林模式具有的备战优势和战时的组织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斯大林模式创造出来

的物质成就及其所具有的组织优势，是苏联打败德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斯大林模式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之一。

（二）促进了苏联现代化

斯大林模式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工业化的成就和社会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工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科学水平的普遍提高，又带动苏联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使苏联在斯大林逝世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第一，实行斯大林模式后苏联很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工业成就。

在实行斯大林模式之前，即在1929年初以前，苏联的经济建设基本上都处在恢复阶段。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编的资料，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看，设定1913年俄国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生产额均为1，1928年这两个指数则为1.1和1.2。^①这说明，到1928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苏联社会才略微超过1913年的发展水平。只有从这时起国民经济才算是从恢复阶段进入发展阶段。

实行斯大林模式初期，苏联开始加大对工业的投资，尤其是对重工业的投资。虽然此时苏联经济刚刚超过战前水平，国家的工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资金积累也非常有限。但是，斯大林模式的创建恰好使国家能够把有限的资金、资源集中在一起，重点进行一批大型的工业建设，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

205

^① 《1956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摘要》，第28页；《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8页，《1984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36页。转引自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的地方上去。据统计,1918~1928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仅为20亿卢布(按可比价格计算),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4年零3个月期间,这一数字就增至80亿卢布,第二个五年计划的4年零3个月期间就达到了181亿卢布,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增加到405亿卢布。^①从1928年10月1日到1941年7月1日,苏联工业的基建投资(按可比价格计算)为155亿卢布,几乎比过去11年的投资增加了24倍。同一时期,与苏联快速加大投资的欣欣向荣的局面相对比,欧美资本主义正处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灾难之中,生产衰退、百业凋敝、失业者成群是资本主义世界随处可见的现象。

大规模的投资迅速产生明显的效益,在战前两个半五年计划中苏联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总产值年递增19%,新建成的重工业工厂达到1500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总产值年递增17.1%,新建成的大型工厂达4500个。在战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总共建成了9000个大型工业企业。^②在1928~1940年期间,也就是苏联从开始实行斯大林模式到苏德战争爆发13年期间,苏联的钢产量从430万吨增至1840万吨,石油产量从170万吨增至3420万吨,煤产量从3550万吨增至16470万吨。1927年苏联拥有各种机床只有1800台,而1938年则达到了5.39万台。1940年苏联发电量规模比1932年增加了49%,达到了486亿千瓦时,已经超过西欧各国的总和。^③到1937年,苏联的社会

206

^{①②} [苏] B. A. 戈利科主编:《苏联政治经济手册》,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62、62页。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5、69页。

主义工业在工农业比例中已经占 77.4%，苏联开始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发达国家。其中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占 57.8%，消费资料的生产占 42.2%。^①从 1928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起至斯大林逝世为止，苏联的全部工业几乎增长了 20 倍。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德、英、法三国，一跃而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至此，苏联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之一。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工业化的重大发展意味着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实行斯大林模式后，苏联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水平的全面发展。同样按照上文引述过的苏联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可见，设定 1913 年俄国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生产额均为 1，1928 年这两个指数则为 1.1 和 1.2，1940 年为 5.12 和 5.3；1945 年为 4.2 和 4.4，1950 年为 8.1 和 8.8。^②可见，到 1940 年在实行斯大林模式的 13 年间，苏联社会总产值基本上是发展为 1928 年的 5 倍。在战后重建的艰难历程中，斯大林模式同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50 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生产额比 1945 年又发展了 4 倍左右，是实施斯大林模式前的 8 倍左右。如此无以伦比的发展速度，不能不让人震惊。可以设想，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成就将是更加惊人的。

第二，实行斯大林模式后苏联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获得了较大的提高。

207

^① 马洪主编：《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5 页。

^② 《1956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摘要》，第 28 页；《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 8 页，《1984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 36 页。转引自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9 页。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苏联，不仅要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水平，而且还要促进全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在这一方面，斯大林模式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其一，实行斯大林模式后，苏联劳动人民的识字率获得较快提高，扫除文盲的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文盲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参数。恰恰就是在这一重要参数上，曾经拥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的沙俄，一直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这注定沙俄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据粗略统计，在20世纪初，沙俄全国人口中仍然有近3/4的文盲率，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是不识字的；十月革命后苏联（苏俄）的文盲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50%~60%，多数劳动者仍然不识字。群众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严重限制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展。这一困境曾让列宁大为苦恼，他由此发出了“文化革命”的号召，倡导苏联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努力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但是，列宁未能实现这一理想。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列宁提倡的“文化革命”是由斯大林实践并完成的。实行斯大林模式后，苏联大力普及初等教育，仅在1933~1937年，由国家和合作社单位（不包括集体农庄）兴建的初等学校就达到了557.5万所。^①经过努力，苏联的全民识字率逐年递增，到1939年全国识字居民（9~49岁）的人数达到了该年龄段总人口的87.4%。^②至此，劳动人民普遍不识字的现象基本消失，人民群众开始能够掌握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基本武器，逐步形成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从现

^{①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32、629页。

代化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在扫除文盲方面取得的成就，恰好就是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其二，在全联盟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管理体制，建立起层次分明的普通、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学校体系，培养出各类专业人才，全面促进了全苏教育水平的提高。在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切实有效的管理。该部设立的学前儿童局、小学局、不完全中学和中学局、高校局、图书局、成人高校和培训局等专门司局部门各自行使着有效的管理职能。各加盟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下工作。地方教育人民委员局由省、区教育人民委员局组成。国家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层次分明的管理，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教育经费，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管理体制逐渐成熟。1930年以后，苏联投资兴建了大批初等、中等、高等学校，一个层次分明的学校体系开始出现。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初等和中等学校增加了将近4万所，其中新建校舍为3.2万所。1937～1938学年度，苏联全国开课的初等学校、不完全中学和中等学校达176300所，在校学生达到3000万人以上，比革命前增加了两倍。^① 1927～1828年度，八至十岁儿童的人学率仅为51.4%，到1932年年底，这个数字就达到了98%。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基本完成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任务。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根据联共（布）发出的“培养新专家是全党的极重要任务”的号召，国家创建了大批专业化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农业学校和经济计划、交通运输、商业管理等部门的

209

^①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领导干部研究院。在 1933~1938 年间，高等学校的国家预算拨款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 4 倍。从 1931 年 9 月起，在联共（布）中央领导下，教育系统重新以各科为基础精心制定大纲和教学计划，制定详细课程表。完善的教育系统开始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据统计，苏联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成倍增加，1918~1928 年苏联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仅是 6.71 万人，而到 1951~1955 年，同一数字是 101.93 万人。苏联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高等专业教育程度的专业人才，1913 年为 13.6 万人，1928 年为 23.3 万人，1940 年底为 90.9 万人，1955 年则增至 218.4 万人。^① 而且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仅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塔吉克斯坦的学生数增加了 1 倍，乌兹别克斯坦增加了 3.5 倍，吉尔吉斯增加了近 2.5 倍，哈萨克斯坦也增加 0.7 倍。^② 可见，苏联的文化教育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210 其三，实行斯大林模式后，苏联增加了对科学事业的投资，创建了大批科学技术科研院、科研所，培养出大批的科研人才，创造了突出的科学技术成就。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要，国家除了加大对苏联科学院的投资外，开始创建大批科学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白俄罗斯科学院、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等。1929~1932 年全国性的科学研究所及其地方机构从 438 个增加到 1028 个，科学工作者的人数由 22600 人增加到 47900 人，增加了一倍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又加大了对科学事业的资金

^① 苏联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 4738 页。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 4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632 页。

投入，同时对原有科学研究机构进行精简和调整，新建立了一批科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到1937年底，全国总计有研究所和地方研究机构806个，实验室397个，天文台31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加强对科学系统的管理，苏联科学院划归苏联人民委员会直属，并于1934年迁往莫斯科。经过努力，国家开始培养出了大批科学技术工作者。1913年沙俄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为1.16万人，1940年增至9.83万人，激增8.4倍。^①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投资逐步产生好的效益，苏联开始在科学技术上突飞猛进。在物理学方面，苏联学者研究了原子的电子层结构、原子核的性质和结构、电波的产生和传播等理论。物理学家伊万年科提出的关于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理论是为现代物理学所广泛承认的。约费院士研究发现了晶体的多层绝缘体结构，奠定了现代半导体物理学的基础。1939年，由库尔恰托夫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铀核裂变。1947年底，苏联政府正式声明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秘密。1949年9月，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在数学领域，维诺格拉多夫发表了数论，别尔恩斯坦发表了概率论，一些数学家在微分方程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在化学领域，列别杰夫研究出了用乙醇合成橡胶的方法，为人工合成橡胶工业奠定了基础。在航空技术方面，苏联学者研究成了各种型号的国产飞机和新型发动机，工程专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研究使苏联的宇宙火箭技术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社会科学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的编辑工作于1940年基本结束，国际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出版也比较顺利。在文学艺术方面，法捷耶夫、阿·托

211

^① 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尔斯泰等文学艺术家发表了大批优秀的小说、诗歌、电影艺术作品，全社会的文学艺术事业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以上三方面是苏联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主要表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工业化的发展互相促进，使苏联成功实施了“后发先进”的发展战略，逐步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第三，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综合评析。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时有鉴别地接受并发挥了西方学者研究较多的“现代化理论”。^①一般认为，“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中、近代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进入以现代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进程。

概括地说，现代化主要包含有下列四方面含义：（1）以近代工业革命为起点，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传统的手工业逐步为机器大工业所取代，经济增长非常迅速。（2）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告别了农耕时代的停滞、封闭、保守状态，进入了工业时代的急剧变迁和开放状态，人的劳动分工越来越明显，社会的阶级阶层急速分化，城市代替乡村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龙头。（3）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快速变化，科技革命使人们摆脱宗教意识的束缚，工业化带动了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阶级阶层

^① 日前国内出版了一些有关“现代化理论”的专著和译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是：罗荣渠著的《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主编的《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丁学良著的《“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概念构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布莱克著的《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塞缪尔·亨廷顿著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塞缪尔·亨廷顿著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艾森斯塔德著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韦伯斯特著的《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等。

的分化使人们逐步确立起现代政治意识，形成了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4) 人类社会形态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在兴起时即暴露出了内在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资本主义社会又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现代化的这四个含义对于解剖苏联社会的变迁，分析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具有很大的裨益。

从人类历史进程看，现代化最早发端于西欧，在西欧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后，西欧以外的国家才被动地发起追赶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于现代化本身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急剧变迁，能够自发地启动现代化的社会必须是那种能够容纳新因素成长的、具有自我创新能力的社会。如果一定社会具有比较定型的、善于抑制各种创新要求的制度，即使它拥有较高的文明水准也难以率先进入现代化。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因为“传统社会并不经常面临着制度变革的要求，它们碰到这类特殊的挑战，通常只是若干世纪才经历一次，而它们只能通过解体或建立一个新的封闭性体制来应付它”。^① 亨廷顿说，现代革命“最可能发生在已经历过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但其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过程又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化过程的那些社会里”。^② 所以，具有发达农业文明的东亚国家，没能抓住现代化的机遇，而农业文明不很发达的西欧国家却反而把握住了“独有的现代机遇”，在“独有的现代必要条件”下孕育

213

① [美] 艾森斯塔德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7 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 章。

出工业化的因素，首先进入了现代化行列。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也提及这一点。马克思说：“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① 恩格斯指出：“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② 当西欧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后，落后的国家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而被动地卷入现代化进程，把大工业生产方式当作自己未来的景象。^③ 因此，对于落后国家来说，现代化不仅包含有从近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原意，而且还带上了另一层意思，即对先进国家的追赶和超越。比如，德国追赶英国、法国，日本追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页注。

214 ③ 这一认识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论述。实质上，马克思对这一历史进程早就作过发人深省的论述。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马克思的这一光辉思想得到了西方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的高度重视。美国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刊载的“现代化”条目中，一开始就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这一著名论断作为解释现代化含义的第一根据。在开展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研究时，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源头，用以指引社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西欧国家，苏联（俄国）追赶英、法、德、美等国，都是后进国家对先进国家的追赶式现代化进程。

苏联（俄国）的这种追赶式的现代化恰恰是我们分析斯大林模式历史作用的一个支撑点。由于现代化进程一再被延误，俄国（苏联）整个社会到处弥漫着向现代化进军、追赶和超越西欧发达国家的躁动气氛。总体上说，开始于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是俄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但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仍然在现代化的门槛上徘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俄虽然建立了一定的军事工业基础，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实力，但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在全社会的现代化冲动下摇摇欲坠。动荡的局势和战时状态使俄国偏离了现代化的航线。二月革命后诞生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未能引领国家摆脱困境，俄国社会依然内外交困。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建立起新型的苏维埃政权，现代化进程在俄国得以重新启动。在内战、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国内阶级纷争和党内派别纷争的多重危机的作用下，苏联（俄国）人民原有的追赶式现代化意识与生存危机意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为无比急切的现代化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现代化方向的、能够满足国家迅速现代化要求的社会模式必然要诞生并发挥作用。斯大林模式在苏联（俄国）历史上扮演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215

在当时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斯大林模式，既然能够满足国家现代化的要求，它就能够创造出现代化成就。从实际情况看，斯大林模式所创造的现代化成就是无比辉煌的。在工业化方面，1913年，俄国的工业产量仅为世界总产量的2.7%，分

别是美、德、英、法国的7%、17%、22%、40%。^①1913年俄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58%，在居民人口构成中，农村人口占80%以上，工业从业人数仅占总人口的14.8%。^②整个国家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其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而且即便是农业本身也停留在极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的状态，处在半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阶段。从1929年开始实行斯大林模式后，到1940年大战前夕，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德、英、法三国，一跃而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国内经济格局方面，1913年，俄国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农业总产值的42.1%。到1937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在工农业比例中已经占77.4%。这说明，苏联从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发展方面，1917年苏联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8%，1940年在工业化取得重大成就后，城市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33%。^③在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苏联（俄国）具有高等专业教育程度的人才，1913年为13.6万人，1928年为23.3万人，1940年则达到了90.9万人，1955年甚至发展为218.4万人；高等和中等教育程度的专业人才，1913年、1928年、1940年、1955年分别占全国职工总数的1.47%、4.57%、7.08%、10.2%。^④可见，斯大林模式的实行，快速

^① 樊亢、宋则行主编：《近现代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204页。

^② 《苏联现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79页。

^③ 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④ 《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47、438、454页，转引自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地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国民素质获得了重大的提高。在社会稳定方面，实行斯大林模式后，动荡的社会局势早已经成为安定的社会环境所代替，党内的派别斗争逐渐消失，国内阶级斗争趋于平静。在综合竞争力方面，苏联开始成为与美国争雄的世界超级大国，军事上具有与美国抗衡的实力，国防科技的一些领域甚至还领先美国。在人民的福利水平上，苏联全国基本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以上几个方面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参数，苏联在这些方面的重大进步证明，斯大林模式的实行使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面对这一成就，即便是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西方媒体尚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63年3月5日，西德《世界报》在总结斯大林毕生活动时写道：在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取得全部领导权时，“俄国还和沙皇时代一样是一个农业国家。当他在三十年后去世的时候，苏联已成为在世界上占第二位的工业强国”。“西方几乎花了二百年的时间才做到的事情……在俄国几十年不长的时间里用残酷的办法、坚定的意志实现了，总而言之，这是现代史中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①

斯大林模式的实践为人类社会塑造出了一种新型的现代化途径，为落后国家树立了实施赶超战略超越发达国家的成功范例。与人类社会此前出现的现代化途径——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途径相比，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途径具有与之截然相反的特征。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途径，一般走的是通过国内长期的积累和国外的掠夺积累工业化资金，由轻

217

^① 转引自〔德〕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工业先行，逐步带动重工业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种类型的现代化进程上，经济生活一般通过不断扩大的市场来实现自我调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保证经济的自由运转。这种类型的现代化一般都进展比较缓慢，要经过一二百年时间才能初步完成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斯大林模式的新型现代化途径则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以苏维埃政权为杠杆，采用非常手段从本国农业积累工业化资金，用行政办法对资源、劳动力进行重新配置，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快速地推进现代化。斯大林模式创造出的辉煌成就，使这种途径带上了“后发先进”的光环，为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塑造出了成功的范例，斯大林模式由此而成为落后国家实施赶超战略成功超越发达国家的典范。正如 E·H·卡尔等比较现代化问题研究学者所指出的，斯大林的发展模式对于促进“欠发展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218 从此，人类社会有了两种现代化途径，即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途径和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途径。前者走的是轻工业先行，通过市场调节经济生活的道路，政府不直接组织经济活动，只对社会生活进行监督；后者走的是重工业先行的道路，中央政府对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在斯大林模式鼎盛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抗形式而存在，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全世界充满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资本主义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暂时获得了新的生机；社会主

^① [美] E. H. 卡尔著：《关于苏联工业化的若干随想》，见 C. H. 费斯泰因主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纽约 1967 年版。

义则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在斯大林模式的推动下高歌猛进。

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可以高度概括出下列两点基本认识：

其一，在人类历史上，斯大林第一个领导本国人民创建了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其他经济体制不可比拟的优势。^①如前所述，在现代化进程上，相对于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的英、法等先进国家，落后的俄国（苏联）一方面要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迅速实现工业化，一方面又面对着先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压力，因此，俄国（苏联）的现代化不仅要实现对本身的超越，而且必须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超越，就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上实现“后发先进”，否则它就只能在先进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于是，由英国开创的建立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漫长现代化道路，不可能满足俄国（苏联）现代化的要求，俄国（苏联）要实现“后发先进”，就只有另辟蹊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创建下来的，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诸多弊端，但它却成功地促使苏联在十多年的时间内走完先进国家一二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为落后国家找到了“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捷径。而且斯大林开辟的这种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还允许商品的存在，它在一定时期内既能高效组织社会生产又能调节群众的生活，将计划与商品结合起来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从苏联社会取得了非凡经济成就的事实看，指令性计划经

^① 这一提法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优越性的片面肯定，也不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积极作用的否定，只是根据斯大林模式创造了辉煌成就的事实，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的积极作用。

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的无以伦比的积极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其二，实行斯大林模式后，联共（布）强化中央集权，从农业积累工业化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战略成功地使落后的苏联迅速发展为世界头等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相对于今日俄罗斯的羸弱，俄罗斯人民对斯大林时期的再认识很好地说明了斯大林模式创造了辉煌成就的事实。在斯大林时期，尽管苏联为取得辉煌的业绩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其成就却足以让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时期在整个俄罗斯（苏联）历史上彪炳千古，在人类历史上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处于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之中的苏联，时刻存在着被国内外敌人颠覆的危险，其生存环境是极端恶劣的。但是，斯大林却能领导苏联人民摆脱经济上受制于西欧发达国家的处境，从农业积累工业化资金，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很快就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基础，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为发达的工业国。由此，苏联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不仅摆脱了充满危机的险恶处境，而且一跃而为世界一流的工业强国。苏联解体十年后，当俄罗斯人民面对国家的世界地位大幅下降的悲剧时，他们产生了对斯大林时期的深刻怀念，这种怀念明显反映出了斯大林时期在人们心中的较高的历史地位，也佐证了斯大林模式发挥过重大历史作用的结论。近年来，俄罗斯的一些全国性社会调查的结论反映了这一点。1999年年底，俄罗斯著名的社会舆论调查机构——“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公布了一项跨度10年之久的社会调查结果，展示了最近10年中俄罗斯人思想意识的变化，其中一些问卷和答案涉及到俄罗斯人对20世纪本国历史，特别是历史人物的看法。在该项调查中，1989年，斯大林名列俄罗斯10位杰出历史人物之第10位，

1994年名列第4位；1999年名列第4位。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政治分析中心进行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俄罗斯的群众中，认为列宁起到了最好作用的占23%，起到最坏作用的占24%；认为斯大林起到了最好作用的占15%，起到最坏作用的占40%；认为戈尔巴乔夫起到最好作用的占8%，起到最坏作用的占48%；认为叶利钦起到最好作用的占5%，起到最坏作用的占41%。^① 这些调查结论反映出：人们对斯大林时期的评价远远高于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评价。斯大林时期苏联崇高的世界地位与目前俄罗斯的羸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怪弗·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会表现出沉重的忧患意识。他说：“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②

总之，从制度的层面看，斯大林模式所具有的上述这两点重大历史作用乃是人类历史所不能磨灭的丰功伟绩。历史研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最终将取决于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而不取决于其是否在道德和法律上犯了过错。时间越往后推移，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将越来越不受感情因素的制约，情感上的控诉和道义上的谴责将逐渐远离历史评议者的视线。从这一角度看，后人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还将大书特书它的非凡经济成就。

221

^① 参阅张树华著：《普京与俄罗斯社会的未来》，《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

^② [俄]弗·普京著：《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罗斯《独立报》1999年12月31日。

三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弊端

评价斯大林模式，要合理地肯定它的历史作用，更要恰当地揭示其弊端。斯大林模式在历史上的确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它确实也存在着许多严重弊端。而且这些弊端在当时就已有所显露，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越来越不明显，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却变的越来越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最终使斯大林模式无法再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当变革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全面启航时，社会主义又进入新的制度创新征程。

在分析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时，斯大林模式的最主要弊端已经展示在我们眼前。概括地说，斯大林模式的最主要弊端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中央政府在全面干预经济活动时没有为经济规律留下起码的活动空间，经济发展偏重于扩大规模，经济效益的提高缓慢，整个社会没能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政治权力过度集中，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一定时期可能出色、高效地组织社会生活，但没有谁能保证这种权力一定能得到公正的运用，社会主义法制随时可能受到了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的践踏，阶级斗争的残酷办法被错误地运用于党内斗争；过分地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化学术活动，政治活动严重地遏制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在斯大林模式全盛时期，这些弊端已经出现，那时它们之所以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只是因为斯大林模式巨大历史作用的光辉部分地遮盖了这些弊端。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进入了变革斯大林模式的时代，那么，只要曾经全面模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完全剔除上述斯大林模式的这些最主要弊

端，社会主义改革就仍然处在艰难的探索之中。历史曾经见证过斯大林模式举世瞩目的辉煌，现实则翘首等待着对斯大林模式的变革能够创造出不俗的成绩。

具体而言，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弊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长期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统的太死”，容易违背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容易受到扼制，职工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不可能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斯大林模式存在的根本弊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减慢最终会使政治、文化体制诸方面的弊端全面表面化，使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政权不稳、民心涣散、社会精神生活混乱无序等弊病。

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大量的资金、能源、技术和劳动力进行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却又难免造成管理上统得过死，经济决策不合实际，经济计划缺乏灵活性的缺陷。在这种体制内，领导者还经常会犯唯意志论的错误，人为地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其一，实行部门的条条管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使企业失去了独立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企业只顾完成上级指令的经济指标，不用心去开拓新技术和新产品，难以发挥企业各自的特长，造成企业活力的缺乏。其二，经济决策的权力几乎集中到中央各管理部门领导人的手上，虽然地方不断地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反馈，但实际上总是难以保证经济规律的自然运转。部门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很难完全

把握和运用经济规律。赫鲁晓夫在推行改革时，曾讲道：“从位于莫斯科的一个中心、一个部去领导国内全部工业，这当然是很难的。那时候部长应当比上帝站得还高，因为他得知道和看到，比如库页岛、堪察加、巴库或亚美尼亚在做什么，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①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三，运用行政手段集中管理生产和执行计划的行为，不符合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容易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在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的作用下，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有可能会利用政治权威人为地去干预经济活动，地方各级的行政领导也经常为了贯彻上级指示而不顾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于是，从上到下的各级领导都会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在权力失去了应有的约束时，整个社会的经济规律不仅未能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失去了纠正错误行为的纠偏功能，唯意志论行为的盛行全面破坏了经济发展规律的运行，人为地破坏了生产的发展，最终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本来，经济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发展情况是千变万化的，经济活动不可能都纳入统一的计划和发展框架。如果强行用“一”制约“多”，其结果只能窒息社会的发展。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就在于此。由于存在着这样的根本弊病，斯大林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发挥出突出的积极作用后，当社会形势变化之后就必定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在苏联的历史上，甚至可以说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原先创建或模仿斯大林模式的行为与新的历史时期下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行为，同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很好地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一切都决定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① [苏]尼·谢·赫鲁晓夫：《同英国〈泰晤士报〉编辑麦克唐纳的谈话》，1958年1月31日。

其次，走上了牺牲农业、轻工业，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势必造成国民经济格局的不合理。斯大林曾设想，实行农业集体化，将既可以保证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又能使农业“一日千里地推进”。可惜这种一石两鸟的效果并未出现。集体化运动的开展和集体农庄的创建，只不过是为国家创造了提高粮食征购量的途径，粮食生产总量却并未获得大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甚至还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一方面，集体化运动开展后，苏联国家谷物征购量获得了提高，但国家粮食生产总量却呈现出了下降态势。据统计，1928年苏联国家谷物生产总量为733.2百万公担，谷物征购量为107.9百万公担；集体化后，1929年苏联谷物生产总量为717.4百万公担，谷物征购量为160.8百万公担；1931年苏联谷物生产总量为694.8百万公担，谷物征购量为228.3百万公担；1934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76百万公担，而征购量则为269.6百万公担。^①可见，当时所谓农业经济取得重大发展的说法，其实不过是粮食征购量的增加而已。另一方面，在集体化运动中，由于采取了一些暴力措施和执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人口数量有所减少；1932~1933年发生的罕见大饥荒又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集体化运动中大量农耕牲畜被屠杀，造成了农业耕作力的下降。这表明苏联农业生产力受到了一定的破坏。^②虽然农业集体化对于

225

① [苏] A·诺夫著：《苏联经济史》，米德尔塞克斯1969年，第696页。

② 据统计，1929~1933年，苏联马匹减少了1800万匹。同期，拖拉机从66300台增至210900台，按马力计算，这其中增长了147600台拖拉机相当于增长了228.3万马力。增加的拖拉机马力数远不及损失的马匹数，这说明农业耕作力增不弥减。另据统计，在1932~1933年大饥荒中，至少有500万人死亡，造成了劳动力的损失。参阅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

苏联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农业生产本身却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农业的落后状态与工业的高速发展越来越不和谐。在国民经济格局中，农业所占比例太低，一直对苏联经济的全面发展“拖后腿”，这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且，斯大林执政时期，由于偏重于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对轻工业的投资很少。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工业经济格局非常不合理，这种现象直到苏联解体前仍未得到根本扭转。由于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品长期供应不足，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延续下去，会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不满情绪，对共产党的支持也会减弱，甚至还会使一些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发生动摇。

再次，经济发展偏重于扩大规模，不注重工业生产效益。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但主要是工业规模的扩大，效益问题则很少引起重视。工业规模的扩大走的是高投入和高积累的发展途径，主要是通过加大资金、资源、劳动力投入得以实现的。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企业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往往难以让人满意，真实的生产效益较低下。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苏联高速建成的大批重工业，长期亏本，到1935年苏联才有第一个新建的重工业企业盈利。国家为了支撑大批低效益企业，每年都给予大量的补贴金，直到1948年，这种补贴生产制才被取消。这种典型的高速度、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苏联是凭借巨大的自然资源消耗和工人超负荷的工作才得以实行的，小国家或政治权力相对不够集中的国家都是不可能实行这种增长方式的。由于大量工业原料由国家无偿调拨，企业在计算效益时，有时仅以产量作为比较系数，把量的增长放在首位。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战争年代，可以发挥很大

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和平时代，特别是当这类企业走向世界市场，遭遇到国外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竞争时，就很难获得竞争优势。

最后，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劳动者的主人翁精神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由于企业的主要权力掌握在上级机关手中，企业职工失去了自主权。指令性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使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充分发挥。虽然为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斯大林也曾提倡按劳动难度和劳动量调节职工的收入差距，但这一合理倡议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也未能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企业吃“大锅饭”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的现象仍严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职工旷工、怠工现象司空见惯。1938年，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合作出的关于整顿劳动纪律的决议指出，企业中的“不安心工作者、懒汉、旷工者和贪图私利的人”，“给工业、运输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他们常常只工作4~5小时，白白浪费了其余2~3小时的工作时间，国家和人民因此常常每年损失几百万个工作日和几十亿卢布”。^①可见管理体制上的弊病，正以劳动者对待劳动的消极态度反映了出来。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工人的劳动真正同切身利益相结合。

227

（二）政治权力过度集中，社会主义法制受破坏

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备战和战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和平时代，如果能够很好地处理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的关系，这种体制也能发挥好的作用。但是，在斯大林执

^① 《苏联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指示汇编》第2卷，第665~672页。

政时期，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充分贯彻，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容易转化为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当政治权力过度集中，甚至失去约束之后，这种权力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发挥出无以伦比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权力却同样可能造成惨烈的巨大损失。从社会主义的稳步、健康发展的角度看，社会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及时纠正错误的权力，而不是一个虽然可能最高效地组织社会生活但却随时可能滋生严重错误的权力。在实际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当领导者和专政机关的权力失去了应有的监督时，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制就随时可能遭到惨烈的践踏。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实践恰恰就是如此。因此，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完善，还有赖于民主集中制的进一步健全和更好的实施。

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内外权力过度集中，党中央容易脱离群众。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具有以党代政，国家权力集中于执政党，党内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和政治局，最终又向斯大林个人集中的特点。国家权力机关，从各共和国、各州、市苏维埃到联盟最高苏维埃，都不具有真正的实权。这就造成了行政机构、地方及基层政治机关缺乏主动性的弊端，执政党因而无法得到各级苏维埃真正有力的支持。同时，由于党的代表大会无法按期召开，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实现其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包括作出重大决策和选举党的中央委员等。由于党的中央全会也无法按期召开，这又使中央委员会无法对政治局进行有力的领导，包括作出重要决定和选举政治局委员等。最后，由于政治局及其日常办事机构——书记处的权力又集中于斯大林个人，斯大林经常没有召集全体政治局成员召开政治局会议，而只是与身边的若干亲信讨论后，就对党

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最终使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在无法发挥党内民主和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情况下，斯大林等人作出的决策可能无法满足形势的要求，也难以对一些错误现象作出及时纠正，党正确有效的管理办法蜕化为政治体制的弊端。^① 由于党的高层干部的积极性无法得到发挥，党的代表无法反映基层党员的民主要求，广大党员未能行使合法权利，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扼制。在这种体制下，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离心力会与日俱增，甚至还可能产生敌对情绪，党中央可能由此而逐渐失去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当一些政治运动突然发生时，人民群众有可能不会站在党的一边，包括一些党员也会对党的生死置若罔闻。

第二，由于实行事实上的干部委任制和干部终身制，党和苏维埃缺乏罢免不称职领导的机制，极容易滋长官僚主义。虽然苏联原则上规定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必须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的监督。但在实践中，干部的挑选、提拔、配置等全部人事大权都集中在党的机关，联共（布）和政府各级干部多数是由上一级党的机关任命。即便有些干部是由选举产生的，但候选干部一般也都由上级党的机关事先圈定，选举只是走走形式而已。而且在各级领导层上，总有一些干部长期占据领导位置，长期连“选”连任，表面上是反映出下层群众对

^① 在前文“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一节的注释中，曾经提及联共（布）权力集中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问题，并认为只要充分贯彻民主集中制，保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这一现象就不是这一体制的弊端。但是，在当时，这些前提条件基本不具备，不但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得到充分贯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也没有按时召开，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又越来越高度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中，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转变为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因而，合理的政治现象蜕化而为政治体制的弊端。

领导的爱戴，事实上则是实行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委任制和终身制的盛行，以及选举制度的不完备或流于形式，容易为那些善于玩弄权术、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巴结上司的心术不正者所利用，而真正德才兼备的干部却得不到任用，失去施展才能的机会。在斯大林时期，多数党和国家的干部都在个人崇拜的热潮中随波逐流。人民群众由于被剥夺了真正的选举权和监督权，根本就不可能将腐化变质的干部从“权力的宝座”上拉下来。斯大林本人也曾发现这一体制的缺陷及其产生的问题，他曾警告说，一些领导人“有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完全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①他还曾指出，必须清除党内、苏维埃组织内的官僚主义现象。但是，由于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关失去了应有的监督作用，人民群众根本不可能对之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所以，官僚主义的弊病很难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得到根本解决，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害的。这种弊端会造成平庸无能的干部汇聚一堂，真正有才能的人不仅进不了领导层，而且还屡屡受到排挤，长此以往社会主义必将贻误发展的良机。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则可能从鄙视这个政权的领导干部，发展为对这个政权的漠不关心，最终甚至会唾弃这个政权。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事实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长期生活在斯大林模式中的苏共基层党员和广大“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在苏共垮台的那一个历史过程中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冷漠，仿佛这个政党、这个政权完全是与之毫不相关。所以，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真的不愿重蹈苏联之覆辙，彻底变革这种干部制度就是其必定要采取的抉择，任何推诿和任何借口都不能掩盖这一事实。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

第三，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关被削弱，专政机关被赋予特殊的权力，社会主义法制受破坏。在联共（布）十七大会上，党的监委被降级，成为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机构，工农检察院被解散，党的中央委员兼任了党的监委的领导职务。这使党的监委实质上成了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一般部门，难以行使其原有职能。^① 在全国各地监察网络都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当各种违法、破坏法制现象发生时，监督机关无力加以纠正。基于斯大林关于“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的认识，^② 联共（布）把阶级斗争的方法不恰当地运用到党内斗争中去。^③ 当安全保卫机关超越法律大肆逮捕和处决党的高级干部时，党的监督机关明显没能发挥出应有的监督职能，党的中央机关基本上是默认了这种行为的正确性。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不健全，人治代替法治，加之国家专政机关享有特殊权力，必然会造成对社会民主生活和公民权利的践踏。

① 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内，下级机关监督上级机关是肯定做不好的。党的监委既然处在政治局的领导之下，它就基本不可能再监督政治局的行为。同理，在各级党的机关中，各共和国、省、市党委的监委，由于处在该级党委的领导下，它也就不可能真正监督该级党委的行为。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60页。

③ 1921年俄共十大曾经通过决议禁止党内争论。列宁指出：“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用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参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这一规定表现出了政治和文化上加强集中控制的倾向。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提倡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党内斗争，开除出党的处罚也决非将阶级敌人连根铲除的做法。只有当斯大林提出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理论时，联共（布）清洗党内反对派的行为，才构成了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党内争论的事实。

这种情况与党和国家的监督机构被削弱是密切相关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大批无辜的干部，包括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被残害，就是法制不健全和专政机关滥用权力造成的恶果。当时，被害人往往被冠以“人民的公敌”，然而，“人民的公敌”的概念却只具有政治学的意义，在刑法和犯罪学上并不能成立，“人民的公敌”是一个不具法律意义的概念，它没有具体的犯罪内容。从本质上看，监督机关职权被削弱，权力就失去了应有的约束，政权会逐渐与广大群众脱离联系，甚至会成为广大群众的对立面，长此以往就将直接威胁到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和存亡。

第四，在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上述诸方面弊端的综合作用下，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缺乏有效的纠偏机制，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用残暴方法处理国内阶级矛盾和党内派别分歧的弊病，社会主义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由于党内外政治权力过度集中，民主集中制没能得到充分的贯彻，监督机关的职能被削弱，安全机关凌驾于法律之上，支配全社会的权力未能得到应有的约束，最高领导人拥有裁决一切的权力。这种体制能够避免各种拖延时间的扯皮现象的出现，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如果能得到合理的运用，这种体制能够发挥出无以伦比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失去了充分吸纳全社会的智慧对重大决策进行充分研讨和对现实行为进行监督、纠正的机会。当权力失去应有的约束之后，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纠偏机制就受到了遏制，甚至会完全失灵，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对严重错误的纠偏能力。这在斯大林时期是有着明确表现的。20 世纪 20 年代末，尽管社会形势的确要求联共（布）中央采取措施实施农业集体化战略，但是用残酷的办法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从肉体上彻底加以消灭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许多中农也

被当作富农消灭了，这不但造成了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而且无谓地增添了许多阶级仇恨。在1930年和1931年两年内，苏联国内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有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①在肃反扩大化运动中，阶级斗争的办法被错误地运用去处理党内争论，大批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和优秀知识分子被错抓错杀。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产生的139名中央正式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枪决，占70%。^②1937年组成的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先后出任苏联政府部长的有22人，他们中1人被撤换，1人自杀，17人被处决，幸存的只有4人。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国内再度出现了类似的大规模处理党的高级干部的事件，包括联共（布）中央书记、保卫列宁格勒的英雄阿·亚·库兹涅佐夫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在内的党和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都被判处死刑，3年之内有2000多人被撤职。^③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过错，但纠偏机制的缺失使苏联社会无力纠正这些过错。

最后，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固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消灭富农和肃反扩大化的行为并不是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农业集体化运动进入高潮后，世界形势已经开始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斯大林模式在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中一枝独秀。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苏联仍然有加紧备战的客观要求，但却没有全面激化阶级矛盾的客观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决

233

^{①②}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662页。

^③ 《共青团真理报》，1989年1月15日。

策造成了无谓的牺牲和矛盾，也滋生了本可以避免的阶级仇恨。从1930年至1938年春，国内外局势总体上也是有利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是社会主义阔步前进的历史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放松对社会主义攻击的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内，苏联却处理了“柳亭集团”等多个反党集团，进行了惨不忍睹的“大清洗”。我们肯定了苏联创建斯大林模式进行全面备战的历史必要性，但并没有把这些政治事件归结为客观形势的结果。它们都只能是斯大林模式固有的体制弊端的表现，是社会的弊病。斯大林模式的这些令人头疼的弊病，不仅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展，而且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形象、声誉和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造成了重大损害，授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共人士以攻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把柄。

（三）文化管理模式单一化、公式化

斯大林模式的文化体制是经过政治斗争和文化大批判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一体制对于苏联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它却明显具有单一化、公式化的弊端。领导者经常人为地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破坏了文化科学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各学科的发展造成了大量人为的障碍，最终损害了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这都是斯大林模式文化体制的主要弊端。

234

概括地讲，斯大林模式文化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文化体制领导权过度集中，管理文化事业的方式越来越单一化、公式化。文化体制的高度集中特征本身并不是文化体制的弊端，权力高度集中的文化体制只能算是某一种形式的文化体制。但是，这种体制从权力高度集中蜕化转变为过度

集中时，这就形成了文化体制的弊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文化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斯大林及日丹诺夫两人手中，党内外的一些重要的文化决策经常由他们单独作出决定，然后形成决议向下级颁布。下级部门一般只有执行上级决定的权利，决策者在制定决策时根本不征求下级部门的意见，也根本没有事先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使文化管理体制表现出高度的单一化。由于各级部门失去了根据自身情况灵活执行上级决定的权利，各级领导一般都生搬硬套上级的决定，这使文化管理方式又增添了公式化的弊病。由于权力过度集中，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包括文化事业的决策都失去了集体领导的优势，原先集体讨论制定决策的文化领导机制基本上不再存在，监督部门的监督作用也荡然不存。处于权力顶峰的几个领导人的运筹帷幄代替集体领导而成为文化决策的机制。尽管由极少数人集中制定决策的方式，对于文化的领导工作具有决策迅捷、灵活高效的优点，但却同时失去了广泛征求意见和集中多数人智慧作出恰当决策的可能性。在领导者率先采用政治行为干预学术争论后，各级组织经常会加以效仿，政治干预学术的做法被默认为一种正常的文化管理办法，并被频繁使用。而且当领导者的一些指示被当作评判文化工作是非的准绳，并被用以指导文化的领导工作时，文化管理工作单一化和公式化的弊病已经表现得无以复加。一切与这些指示稍有出入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辩证的方法被摒弃，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做法盛行。事实证明，这种单一化和公式化的做法，对苏联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235

其二，简单化的文化体制，缺乏对错误决策作出纠正的能动机制，不仅难以对错误现象进行纠偏，反而还助长了错误。在斯大林执政的一段时期内，个人崇拜现象严重，国家文化精

神生活畸形发展。但是由于文化体制具有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国家文化意识形态部门不但未能对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现象加以抵制，反而还通过加强宣传和出版各种歌功颂德的讲话、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进一步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热潮。在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寿辰上，联共（布）的一些中央委员就开始人为地臆造历史，把斯大林称颂为列宁的惟一助手，是活着的列宁。《真理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和联共（布）意识形态的核心阵地，不但没能刊发纠正错误的文章，反而用八个版面刊发了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夸张的颂扬斯大林功绩的文章。在1929~1938年，苏联整个文艺界几乎都参与了这场“造神”运动，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1931年6月，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的任务》的演说，“拉普”的领导人紧跟斯大林的步伐随即作出了无比媚俗的论断，宣称“斯大林的讲话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艺术作品的有价值的主题”。^①文学家们竭力赞颂斯大林“非凡地精通俄罗斯语言”，提倡文学作品都应该学习斯大林的语言风格。作家卡达也夫竟然说道：“斯大林的精湛的语言决定了他的小说《时间啊，前进》的句法结构。”^②远离政治的文学艺术尚且如此，可见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已经浸染了个人崇拜的毒素。社会思想一旦失去了起码的社会批判精神，就将彻底沦为权力的奴隶。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个人的只言片语都将成为文化工作的最高指导精神。当斯大林对一些学术争论作出过于草率的论断时，比如他在1931年底发表《给〈无

^① 《苏联文学史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② 转引自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页。

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断定历史学家斯卢茨基为“托洛茨基主义伪造者”^①时，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机构不但未能积极有效地保证文化事业的良性发展，通过正常的学术争论对学者进行批评教育，却反而掀起了一轮迅猛的文化大批判。可见，失去约束的权力对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其三，单一化、公式化的管理与过分的政治干预两者兼攻齐下，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了破坏。由于开展学术研究必须的自由争论遭到扼杀，这直接窒息了文化学术研究的生机，破坏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间接地使国家的各项决策失去了宝贵的理论论证。这种弊病在思想文化界批判德波林学派和在自然科学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派的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1930年，米丁、尤金等人发起了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运动。尽管德波林等人的确在哲学研究上存在着一些错误和不足，但这场争论本是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这种争论对于哲学的发展本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场争论被草率地升级为政治斗争。在米丁等人很难与德波林学派抗衡的形势下，联共（布）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开始为德波林学派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称其错误有“反党性质”，政治上有“机会主义表现”。斯大林在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时则直接对这场论争作出了政治结论，把德波林学派称为“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指示“必须彻底地审查机械论者德波林分子和其他修正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审查他们的全部著作，批判他

237

^① 参见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732页。

们所写的、所做的、所说的一切。”^①至此，政治批判彻底代替了哲学争论，一批颇有造诣的学者和理论家从此含冤数十年，哲学领域出现了死气沉沉的景象。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遗传学的运动也是如此，在联共（布）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下，李森科称与摩尔根遗传学派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哲学领域的米丁学派则专横地干预自然科学，称摩尔根遗传学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1948年斯大林还亲自审定了李森科关于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嚣张气焰，李森科则公然宣称遗传学派学者是“人民敌人”，给遗传学派带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苏联此后禁止各个学校讲授遗传学，封闭了遗传学派的实验室。从此，李森科伪科学一统天下，苏联生物学的研究受到重大的破坏。这种由领导人亲自干预学术争论，国家用行政手段全面干预科学研究的行为，无疑严重损害了科学事业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不但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遭受损失，而且还使苏联的文化科学事业畸形发展，最终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总之，斯大林模式文化体制诞生于国内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之时，政治斗争必然波及文化领域，文化思想领域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不同的政治派别总是在开展组织斗争的同时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在这种大环境下，斯大林模式文化体制的形成和实行难免在颇有建树的同时带有严重的弊端，并滋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干扰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① 参见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6页。

第五章 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的深刻影响^①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考验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但没有被法西斯德国所消灭，反而与一切反社会主义者的愿望相反，经过战争的洗礼和考验变得更加

^① 本书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主要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如何组织国内社会生活问题的探讨，涉及国际关系问题时主要是从社会制度的比较和传承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书中把斯大林模式看作一种落后国家实现“后发先进”的现代化途径，将其看作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组织国内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社会模式，所以，本书分析了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历史条件、思想根源、指导理论、基本特征、历史作用和体制弊端等问题，却没有探讨国际交往的具体问题，包括没有专门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原因、过程和结果及战争前后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也没有专门探讨苏联与东欧国家和中国的国家间关系问题。鉴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认识，为了对斯大林模式作出一个相对较全面的评价，本书虽不专门论述苏联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却需要从社会制度的比较和传承的角度，对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及其对资本主义阵营的冲击作出扼要分析。

强大。在苏联的积极影响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努力下，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一个能与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被缔造了起来。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斯大林模式即已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发起了有力的挑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迎接这种挑战，不得不纷纷进行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和工农群众的生活处境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实行，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模式对世界发生的影响。

一 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的沿革

240 一定社会制度的实践形式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没有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之前，已经成熟的社会制度的实践形式一般都将继续存在并且发挥作用。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实行恰恰就是如此。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很长时期内，虽然苏联历届领导人都试图变革斯大林模式，但这些变革都是局部而粗浅的，而且存在着反反复复的特点，都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总的看，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大林模式仍然在苏联保留下来并继续发挥作用，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无不如此。斯大林逝世后，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继续实行，可以看作斯大林模式对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的重要内容。

（一）斯大林之后苏联高层政局的演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骤然失去最高领袖。

苏联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面临着如何组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的重大任务。就在斯大林逝世的第二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迅速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进行改组。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内，最高领导权威的突然消失往往要引发政治高层的分裂和争夺最高领导权的火拼。斯大林逝世之后，这种现象在苏联社会再度出现。

3月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紧急举行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将斯大林生前形成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合并为一个机构，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第一副主席。联席会议还对党的中央机构进行了较大的改组，撤消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局，成立新的主席团。会议把1952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选出的25名主席团委员缩减为10名。这10名主席团委员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马林科夫作为苏联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领导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成为苏联实际的最高领导。苏联自此开始进入马林科夫执政的新时期。

241

马林科夫上台后设想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一些局部变革，但在政治斗争中他很快就失去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其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设想既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挥也没有得到全面的实践。1953年3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追悼会和葬礼上，马林科夫发表讲话，初步提出了有关国内政策的新构想。他的讲话表明，苏联即将告别以往偏重于发展重工业，不注重

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发展轨道，转而开始要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外交上要从同帝国主义的激烈对抗转向缓和。这表明马林科夫有了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局部变革的设想。^①随后，马林科夫的确对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做法进行了个别调整。1953年4月，在斯大林逝世后一个月内，苏联对“医生间谍案”进行平反，表现出了与斯大林执政时期有所不同的政治气氛，表明苏联开始在理论上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公式。7月，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一起策划逮捕了贝利亚，撤消了贝利亚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在8月5~8日展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马林科夫发表了长篇演说，进一步发挥了调整工业发展战略和发展农业的设想，表现出一番政治抱负。马林科夫宣称苏联已经解决了发展重工业的任务，今后要“用尽一切办法来加速轻工业的发展”。他设想要在巩固集体农庄的基础上，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要高价收购农民义务交售以外的剩余农副产品，减低农业税额。但是，形势很快发生变化，马林科夫在党内的权力受到削弱，赫鲁晓夫在党内的权力步步加强。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事实上已经由赫鲁晓夫掌握。于是，在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关于如何发展工农业的争论中，马林科夫很快就理论上和组织

^① 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是马林科夫本人的陈述，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追悼会的讲话中说：“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不断地更加增进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和苏联全体人民的物质福利……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法律。”“我们最关心的是制止新战争，与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认为，最正确、必要和公正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有效的、以事实为根据并为事实所证明了的一切国家人民间的和平共处。”转引《新华月报》1953年第4期，第4页。

上处于下方。赫鲁晓夫步步进逼，马林科夫则表现得软弱无力。马林科夫各项大的经济方针都被指责得一无是处，关于发展消费品工业的设想被指责为背离了斯大林执政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正确路线，关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设想被抨击为固守斯大林执政时期强迫农民交纳“贡税”的做法，贻害了农业的发展。马林科夫本人甚至被扣上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帽子。在这种形势下，马林科夫显然已经不能再担任苏联的最高领导。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解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改任苏联电站部部长，由布尔加宁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至此，赫鲁晓夫接替马林科夫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

自1953年9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后，赫鲁晓夫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权。1955年2月，在马林科夫被解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赫鲁晓夫事实上已经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苏联正式进入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与马林科夫开展有关工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争论时，赫鲁晓夫批评马林科夫关于发展消费品工业的设想是偏离了斯大林时期重工业优先路线，但这只是赫鲁晓夫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已，他的真实主张是要变革斯大林模式。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从改革农业体制开始，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一些变革。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打击对手，赫鲁晓夫还坚持对斯大林进行攻击。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攻击斯大林和变革斯大林的政治行动。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因不满于赫鲁晓夫肆意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行为，发起了一次旨在罢黜赫鲁晓夫的行动。但赫鲁晓夫成功地保卫了自己，并发起反击，将莫洛托

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时期的重臣打成“反党集团”，清除了强大的反对派。1958年3月，布尔加宁交出政府首脑的职权后，赫鲁晓夫自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开始集党政大权于一身。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次公开地攻击斯大林，刻意把大会的注意力引向清算斯大林的“罪行”。这次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这意味着斯大林已经遭到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的唾弃。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继续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其政治权力大为加强。但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草率的改革却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并逐渐引起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不满。在不断激化的党内矛盾中，赫鲁晓夫越来越孤立。最终，在1964年10月发生的宫廷政变式的党内斗争中，赫鲁晓夫被撤消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并且被取消了中央委员的职权。赫鲁晓夫曾经成功地运用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机器取得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赫鲁晓夫的同僚同样运用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机器剥夺了他的职权。自此，赫鲁晓夫执政的时期宣告结束。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苏联由此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是从剥夺赫鲁晓夫的职权开始的，这本身意味着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大政方针的否定。虽然勃列日涅夫曾宣称要遵循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二十二大的路线，要在苏联实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即“新经济体制”，但在实际行动中苏联社会却表现为向斯大林模式的复归。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措施都相继被废除，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做法得到恢复。

1966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央主席团改名为中央政治局，取消了中央第一书记的提法，恢复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勃列日涅夫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联政局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凭借斯大林模式多年的积累，苏联经济曾经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社会生活则比较保守，政治体制越来越僵化。由于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关于干部定期更换的规定，苏联各级领导干部严重老化。赫鲁晓夫时期撤消的许多部委都相继恢复，人员编制越来越多，出现了机构臃肿的现象，机关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在勃列日涅夫权力逐步巩固和扩大后，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现象又开始出现。各类报刊、书籍和广播经常任意拔高勃列日涅夫的历史功绩，广泛传播勃列日涅夫的语录和指示。勃列日涅夫本人则不断地为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和奖章，掩盖和粉饰各种社会矛盾和工作中的失误。1977年，勃列日涅夫兼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会议主席的职务，独揽党、政、军的大权。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苏联社会部分地再现了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现象，最高领袖不断索取各种对他的歌功颂德，各级干部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最高领袖阿谀奉承，全社会弥漫着虚妄的气氛。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自此先后进入安德罗波夫执政和契尔年科执政的两个短暂时期。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在社会生活诸方面都采取了革新措施，试图变革勃列日涅夫后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社会风气。然而，安德罗波夫在位仅15个月。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他虽然积极地探索变革社会体制的途径，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安德罗波夫的努力至多是给苏联社会增加了几份朝气，苏联社会并没有进行真正实质性的变革。1984年2月13日，在安德罗波夫去世4

天后，比安德罗波夫年迈3岁的契尔年科被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时，苏联共产党最高层领导的核心成员大多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过度老化的领袖集团比较保守，苏联党和国家都失去了锐意进取的活力，整个社会因循守旧，举步不前。虽然契尔年科宣称继续执行安德罗波夫时期的一些决策，但年老、多病的身体使他根本就难有作为。13个月后，契尔年科去世，他执政的时期宣告结束。这两个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的过渡性时期。

1985年3月11日，契尔年科去世后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联由此进入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已经积聚了大量弊病，到了不得不变革斯大林模式的时候了。上台初期，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积极探索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途径，提倡“抛弃老一套的思维模式”。苏联社会短期内表现出一定的活力，经济发展也表现出好的势头。1986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了4.1%，工业产值增长了4.9%。但是，好景不长，苏联社会多年的积弊再度沉渣泛起，迫在眉睫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摆在戈尔巴乔夫的眼前。

1987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开始领导苏联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同时也一步步地把苏联引向解体。1987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批准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确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由过去国家计划的单纯执行者变成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者，推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10月，在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历史不应该有“空白点和被遗忘的名字”的指示下，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重新改写苏共党史。之后，苏联开始公开批判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的错误，许多人开始大肆声讨“个人崇拜

时期”（即斯大林时期）和“停滞时期”（即勃列日涅夫时期）。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提出了“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的观点，悄悄地用人道主义替代科学社会主义。1988年6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成为改革的重心。在不断推进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过程中，这场改革打破苏联社会死水一潭的局面，不安定因素骤然增加。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动荡不安的政局，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是高喊“革命性变革”的口号，宣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在取代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步步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接受了实行多党制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张。于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开始受到质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引起了争议，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国家权力核心地位开始削弱。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删去苏联宪法中保障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第6条规定，决定将党和国家分开，使国家不再从属于任何政党，并宣布实行总统制。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遭受到最严重的削弱，从此，苏联总统委员会代替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为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已经严重动摇，列宁、斯大林缔造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岌岌可危。

247

1991年“8·19”事件后，苏联共产党基本被排挤出国家政权体系，政治生存权被剥夺，组织被瓦解。8月2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组织为非法，23日下令禁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2月25日，苏联解体，一个伟大国家宣告结束。戈尔巴乔夫变革“30至40年代形成的延续至今的斯大林体制”的行为，沦为对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背弃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全面否定，最终导致了共产党的垮台、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和联盟的解体。

（二）斯大林之后斯大林模式的继续实行

248 斯大林逝世后，尽管马林科夫时期苏联提出了一些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设想，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恢复了一些被赫鲁晓夫废除的斯大林时期的做法，同时也对斯大林模式本身作了一些改革，但总的看，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并没有被触动。因为这些变革都是局部的、粗浅，苏联社会生活中发生改变的只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最表层的東西，诸如大规模处决反对派成员等，而真正左右苏联社会生活的基本事物，比如权力结构、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模式等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对此，戈尔巴乔夫曾经提出一点客观的认识。在回顾苏联社会主义改革时，戈尔巴乔夫写道：“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①事实上，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实行，可以一直推算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在戈尔巴乔夫发起全面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之前，斯大林模式的灵魂的确仍然在苏联“原封未动”，斯大林模式仍然在苏联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马林科夫的上台和下台本身都是苏联继续实行斯大林模式表现。在斯大林逝世前夕，马林科夫凭借斯大林的信任和重

^①〔俄〕戈尔巴乔夫著：《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用，已经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俨然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1952年1月8日，马林科夫50岁生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出的贺电称马林科夫是“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伟大导师列宁和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①在联共（布）十九大上，马林科夫向党的代表大会作了中央工作报告。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分配中，马林科夫具有天然的优势，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上，马林科夫被确认为继斯大林之后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马林科夫能够取得这一胜利，依靠的正是斯大林模式的政治决策机制，在苏联的权力核心——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局——即以前的政治局内部，马林科夫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尤其是实权人物贝利亚的支持，因而顺利地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随后，马林科夫又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一举清除了贝利亚，其所凭借的也正是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权力机制，因为此时赫鲁晓夫已经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掌握着党中央的主要权力。在经济上，尽管马林科夫提出了要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一些变革的设想，但这些设想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践，反而都遭到批判。^②总的说，在马林科夫任内，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政治体制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马林科夫下

^① 转引自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

^② 在马林科夫任内，他任何变革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努力都是不可能实行的。当时，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的攻势下，马林科夫任何有关继承或者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设想都被指责为是错误的。马林科夫有关发展消费品工业的设想，被指责为背离了斯大林执政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正确路线。他有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促进农业发展的设想，则又被抨击为固守斯大林执政时期强迫农民交纳“贡税”的做法，贻害了农业的发展。在赫鲁晓夫身居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的抨击，意味着党中央对马林科夫经济决策的否定。

台事件则更加清楚地上印证了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仍在苏联继续实行的论断。作为一个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发迹的政治人物，马林科夫本应是深谙斯大林模式政治权力机制——谁掌握了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谁就是国家真正的最高领导人，但马林科夫却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可能是由于政治斗争中的妥协，1953年3月14日马林科夫轻易地辞去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1953年9月，在马林科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6个月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林科夫随即失去了对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在斯大林模式的权力机制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国家的权力核心，中央政府——部长会议是必须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的。于是，当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之间发生权力斗争时，马林科夫只能成为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一个牺牲品。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尽管苏联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但改革并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根本，斯大林模式仍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继续实行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批判斯大林方面，赫鲁晓夫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进行攻击，并没有对斯大林模式的制度缺陷作出深刻批评。赫鲁晓夫以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为突破口，对斯大林作了公开的、猛烈的否定和批判，对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质疑。但是，赫鲁晓夫这样做的目的是借此打击政治对手和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并非深入抨击产生个人崇拜的政治体制。在理论宣传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抛出了“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抽象人道主义，对斯大林模式的指导理论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及其

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斯大林模式的理念发起冲击，但并没有形成对斯大林模式文化体制的变革。在社会风气上，在赫鲁晓夫的鼓动下，苏联掀起了所谓“解冻”的热潮，对斯大林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将斯大林描绘成“病态多疑”的“暴君”，把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史说成是“一系列罪恶和错误”的历史。但是，这些行为只是对社会现象的批判，而不是对产生社会现象的原因——斯大林模式进行的批判。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赫鲁晓夫领导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取消义务交售制，把中央管理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变中央管理为主为以地方管理为主等。这些做法削弱了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的领导，对斯大林模式的确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中央仍然对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管理。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赫鲁晓夫领导苏联在州和边疆区设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员会，改造苏联党和国家的干部制度，削弱内务部的职权。但是，这些行动只是对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外围形式进行改革而已，并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最基本的内涵——实行权力高度集中于执政党中央的一党制。所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及其对斯大林模式作的局部改造，并没有形成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变革。相反，在赫鲁晓夫任内，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

架仍然在苏联继续实行并发挥作用。^①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但很快由极盛而变衰，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弊病已经非常明显，苏联社会提出了全面变革斯大林模式的现实要求，但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错过了改革的有利时机，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切实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里，苏联恢复了一些被赫鲁晓夫废除掉的斯大林时期的做法，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又半途而废，斯大林模式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经济领域，勃列日涅夫领导了所谓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如在工业方面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进管理办法和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而且还通过利润提成方式刺激企业领导的积极性；在农业领域，三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减低农业税率，放宽对宅旁园地的控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勃列日涅夫领导建设的“新经济体制”，并没有触及斯大林模式指

^① 赫鲁晓夫下台事件也是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继续实行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明证。从1964年9月起，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就开始策划撤换赫鲁晓夫。10月12日，当赫鲁晓夫正在黑海度假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共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候补委员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利诺夫斯基等22人参加会议。13日，赫鲁晓夫被迫返回莫斯科参加会议。在会上，主席团讨论了撤换赫鲁晓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坚决为自己辩护。但赫鲁晓夫只得到米高扬一人的支持，其他人几乎都反对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只好表示愿意“自愿退休”。14日，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苏斯洛夫作了关于撤换赫鲁晓夫及其原因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决定，撤消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在这一宫廷政变式的事件中，苏共中央主席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事件表明，苏共中央主席团与斯大林时期的中央政治局一样，掌握着决定全党命运的权力。理论上说，中央主席团——政治局是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又受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领导。但实际上，中央主席团却掌握着领导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与斯大林时期的权力结构是基本相同的。

令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在此期间，苏联仍然通过指令性计划去管理国家的经济活动，经济发展仍然偏重于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长期保持在73%~75%。而且勃列日涅夫还组织批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使斯大林模式的一些经济体制弊端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重。在政治领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沿袭着斯大林时期的做法，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苏维埃和政府的一党制，执政党内的权力也是高度集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契尔年科曾经说过：“党的一些部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往往因急于解决问题而撇开苏维埃，对完全属于苏维埃管辖的问题作出决定，而某些苏维埃领导人也习惯于把直接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送交党的领导。”^①这种做法与斯大林时期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勃列日涅夫本人则逐渐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且斯大林时期的任命制和终身制再度复活。在社会生活方面，苏联又再度刮起了个人崇拜的风气，只是规模达不到斯大林时期那般而已。勃列日涅夫喜欢别人的吹捧，各级干部、各种宣传媒体则都热衷于吹捧勃列日涅夫的功绩。勃列日涅夫本人在五年内就给自己颁发了三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更可笑的是，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报告的过程中，竟然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掌声、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②这表明，最高领导陶醉于聆听下属的吹捧，而各级干部则大多投其所好，热衷于阿谀

253

^①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② 转引自陈之骅著：《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问题和历史教训》，载陆南京、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奉承。总的说，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但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切实改革，反而复活了斯大林时期的许多做法。

在安德罗波夫执政和契尔年科执政的两个短暂时期内，苏联虽有变革斯大林模式的尝试，但由于时间过于短暂，真正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行为并没有出现，苏联仍然继续实行斯大林模式。安德罗波夫上台后一反勃列日涅夫时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习气，迈出了励精图治的步伐，为苏联社会注入了难得的朝气，让人们看到希望。但这与变革斯大林模式是两码事，全社会仍然继续实行着斯大林模式。契尔年科执政时期，苏联则基本上沿袭着安德罗波夫确定的路线、方针，甚至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苏联部长会议正副主席都没有进行调整。老迈的领导层保守地维持社会现状，此时根本就没有进行社会变革的积极愿望和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苏联社会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要求已经非常迫切，但斯大林模式依然得以继续实行。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迈出了全面变革斯大林模式的步伐，但这场改革在变革斯大林模式的同时断送了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苏联几乎同时在苏联的版图上消失。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决定调整社会发展战略，要对原有的“障碍机制”进行“根本改革”。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革新的方针。会后，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积极调整干部队伍，加强法纪，整顿秩序，积极探索变革经济体制的途径。198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审议和确认了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提出的加速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提出了苏联共产党的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定了一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但是，此时苏联社会仍然基本实行着斯大林模式，国家对经济

活动仍然进行全面的管埋，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仍然是苏联社会的权力核心。1987年6月以后，苏联迈出了真正变革斯大林模式的步伐。在这个月，苏联共产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决定放弃中央对下级经济环节日常事务的干涉，确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由过去的国家计划单纯的执行者变成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者，推行完全的经济核算。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后，苏联变革斯大林模式的步伐大大加快，改革也开始走上背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在变革“30至40年代形成的延续至今的斯大林体制”时，戈尔巴乔夫等人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用人道主义替代了科学社会主义；放弃了共产党通过苏维埃领导国家的基本原则，接受了实行多党制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张；实行总统制，由总统委员会代替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苏联的权力核心。于是，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打破。戈尔巴乔夫声称在他之前苏联的历次改革都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旧有的灵魂——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只有他领导的改革才革除了斯大林模式的这个“旧有的灵魂”。这话道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全面变革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只是，戈尔巴乔夫在革除斯大林模式“旧有的灵魂”的同时，也革除了社会主义的“灵魂”，挖掉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随着斯大林模式的消亡，共产党宣告垮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宣告崩溃。苏联真正走完了实行斯大林模式的历程。

255

（三）斯大林之后苏联的经济成就和社会问题

斯大林逝世后，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继续实行，曾经创造

出值得肯定的经济成就，但也滋生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总体上看，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苏联虽然存在着经济结构畸形的弊病，但其创造的经济成就是可观的，国家的综合实力在不断提高，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弊病日益显露，经济结构畸形的弊病越来越阻碍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越来越表面化，苏联社会由极盛而走向衰败，社会的经济、政治危机最终完全爆发。

在经济发展方面，斯大林之后苏联社会曾经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国家一度具有堪与美国相抗衡的经济实力。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弊病越来越明显，经济结构越来越畸形，经济发展缓慢并转为停滞不前。

斯大林模式的集中资源、资金和人力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尖端科学的优势，在斯大林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仍然发挥出明显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这个时期，苏联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经济成就，科学技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在 1950 年到 1960 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1.75%，第五、六个五年计划的任务都超额完成。^① 到 70 年代初，斯大林时期苏联建立起来的雄厚的经济基础发挥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效，苏联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军事力量与美国平起平坐，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高。按照苏联官方的统计，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1951~1960 年为 10.1%，1961~1965 年为 6.5%，1966~1970 年为 7.8%，1971~1975 年为 5.7%，1976~1980 年为 4.3%，1981~1985 年为 3.6%。从中可见，斯大林

256

^① 参阅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2 页。

之后苏联经济仍然获得了快速发展。即便是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关苏联国民收入年增长率的统计，^①也可以看出，80年代以前苏联的发展速度也是不低的。相比而言，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比苏联还要慢一些。这时期，美国的国民年收入增长率是：1961～1985年为3.3%，1971～1985年为2.8%，1981～1985年为2.5%。由于苏美社会发展速度的这种差别，到70～80年代，苏联的许多主要经济规模指标都已经向美国接近，真正实现了对美国的追赶。据统计：197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是美国的65%，工业产值是美国的75%强，农业产值为美国的85%；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是美国的67%，工业产值是美国的80%强，农业产值是美国的85%；198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是美国的67%，工业产值是美国的80%强，农业产值是美国的85%。这一时期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迅猛，人造卫星上天，载人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空间技术和核力量堪与美国竞争甚至有些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正是凭借斯大林模式所创造的这些物质成就，苏联才能够成为让美国畏惧的对手，与美国在全球争霸。

但是，斯大林模式固有的经济弊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经济增长缺乏后劲，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处在比较低下的水平。虽然，苏联的工业，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总体上都获得了发展，但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没有改变，轻工业在原本非常薄弱的基础上没能获得根本的好转，

257

^①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1951～1960年为5.6%，1961～1965年为4.9%，1966～1970年为5.1%，1971～1975年为3.0%，1976～1980年为2.3%，1981～1985年为0.6%。参阅吴敬琏著：《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重工业和轻工业的之间比例不合理的状况更趋严重。^① 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苏联甲类工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 70% 左右，乙类仅占 30%。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内，苏联经济结构畸形发展的现状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日趋严重。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内，苏联生产资料工业生产总值一直占整个工业总产值 73% ~ 75% 的比例。在农业方面，虽然苏联农业多少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其拖后腿的面貌没有改观，农业的发展远远没有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其中，赫鲁晓夫进行的农业改革虽曾经起过好的作用，但最终却给苏联农业的发展造成又一次严重的打击。1963 年，苏联甚至出现了农业生产的大灾难。在这次大灾难中，国家的粮食总产量减少了 23%，牲畜显著减少，其中猪减少 40%。总体上看，斯大林模式这种形成于临战时期的战备体制，在斯大林之后仍然长期发挥着战备的作用。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其结果只能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较大的提高。由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苏联群众对社会主义也产生了厌倦情绪。因此，尽管苏联经济的确曾经取得快速发展的成就，国家的综合实力在向美国接近，但畸形的经济结构损害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伤害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当苏联的经济增长日渐乏力，最终走向停滞时，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弊端必将全面爆发。

^① 1951~1955 年，苏联甲类工业生产（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增长率为 11.3%，乙类工业（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为 8.4%，相差 2.9 个百分点。1956~1960 年甲类工业增长率为 9.6%，乙类工业为 6.3%，相差 3.3 个百分点。参阅阚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2 页。

在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方面，斯大林之后苏联社会虽仍有党内斗争，赫鲁晓夫时期还进行了局部的政治体制改革，但苏联政局是比较稳定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比较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巩固的。但是，苏联社会却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随着斯大林模式经济活力的减弱，苏联社会潜藏的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受到质疑，无产阶级政权在短短的时间内变得摇摇欲坠，最后甚至出现苏联共产党垮台、无产阶级政权崩溃和苏联解体的悲剧。国家的政治安定往往决定于社会的经济状况，在斯大林之后苏联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时期内，苏联的党和政府仍然能够平息各种反动思潮，政局是比较安定的。马林科夫的上下台和赫鲁晓夫时期发生的几次激烈政治斗争，都只是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就得到了解决。党内斗争没有再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在中央政权非常强大的情况下，苏联仍然继续积极改善生产力布局，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都有所提高，民族矛盾并没有激化。在坚持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苏联的政治权力结构保持着明晰的层次，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有效地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行使管理全党的权力，共产党又通过各级苏维埃和各级政府对全社会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然而，当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弊端越来越激化后，苏联经济由增长乏力转向停滞不前，苏联社会原本具有的各种社会矛盾随之全面激化。从共产党内部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全面破除斯大林模式的潮流都在涌动。在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过程中，舆论导向很快从革除斯大林模式变为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这种社会潮流很快在党中央内部找到了代言人，叶利钦等人积极推动这种潮

流，戈尔巴乔夫则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冲击下随波逐流，苏联社会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地震。当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时，也就是当苏联接受多党制和实行总统制时，苏联已经接近解体。斯大林模式的创立和实行，使苏联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迅速成为居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但是，在斯大林模式急需进行变革时，戈尔巴乔夫等人却在变革斯大林模式同时摧毁了整个苏联。

最后，有必要简要分析斯大林模式与苏联解体的关系，这是评述斯大林模式对斯大林之后苏联社会的影响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看到，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产生的负面效应在苏联解体事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遭遇危机时，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产生的负面效应可能会加剧这种危机。比如，一些人由于受到了安全机关的镇压而对社会主义产生仇恨，他们一有机会就要采取行动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由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一些群众也会产生敌视社会主义的错误情绪，在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危机时，这种情绪可能由于敌对分子的煽动而激化。但是，这些负面效应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加以克服，单凭斯大林模式滋生的负面效应是暂时不可能动摇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具有消化这些负面效应的能力，完全可以在制度创新中克服体制弊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是可以纠正

的。”^① 总体上讲，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中，斯大林模式是改革的对象，苏联解体则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结果。改革的对象与改革的结果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斯大林模式不应该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行文至此，斯大林在 1943 年说过的一段话给我们今日重评斯大林模式留下了深刻的启迪。他说：“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是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② 60 年前，斯大林对历史评价的敏感洞察，如今得到了部分证实。让人扼腕痛惜的是，斯大林及其同时代人能够在极端孤立的处境下，创建斯大林模式，奇迹般地把一个羸弱的农业国建成世界第二大强国，而斯大林的后继者却在变革斯大林模式的时候眼睁睁地瞅着自己的祖国走向解体。可笑的是，斯大林的后继者在亲手制造苏联解体的悲剧时，还恬不知耻地耻笑斯大林，向他的墓上扔“垃圾”。

二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移植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建立起来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统称，它们分别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 8 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多数是由苏联帮助建立起来的，除南斯拉夫外这些国家都

261

^① 转引自周新城著：《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5 页。

^② 转引自周新城著：《必须全面正确地分析“斯大林模式”》，见《国史研究参阅资料（17）》。

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①因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几乎就是斯大林模式在东欧的延续，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可以笼统称为移植斯大林模式。

（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植斯大林模式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后来被称为东欧的这片土地上的基本政治局势是：德国东部是苏联红军的占领区，由苏联全面控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战败国，在实行军事管制时，苏联红军对三国的重要事务具有很大的决定权，苏联基本控制了这三个国家的局势；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由苏联红军和在苏联组建的两国军队解放的，苏联能够对两国新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发挥直接的影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是由本国人民武装力量解放的，苏联不与两国直接接壤，但由于两国共产党均已经在国内占据主要的领导地位，通过政党关系苏联能够对其发生影响。这样，8个国家基本上都受到了苏联的制约，斯大林模式就是通过这些渠道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影响的。

262

总体上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植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基本上都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凭借联共（布）对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支配和红军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苏联能够对东欧各国重大事务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在苏联的经济、政治、军事的援助和外交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这些国家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接受苏联的影响，移植斯大林模式进行

^① 为简便起见，下文如无特殊说明，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受斯大林模式影响的论述，都不包含南斯拉夫在内。

社会主义建设。1947年，在苏联共产党的主导下，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决议，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绝对化、神圣化，要求各国共产党都要无条件地学习苏联，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的大党大国社会意识和行为的作用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以俄为师，仿效斯大林模式，成了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否遵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确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于是，任何偏离斯大林模式的倾向，都会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这样，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就失去了探索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权利，对于它们来说，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是因为抵制苏共对其内政的干涉，主张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于1948年6月被开除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或者工人党比南斯拉夫共产党都更为弱小，这些国家凡胆敢偏离斯大林模式的轨道者，其执政者就可能遭到苏联的罢黜，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匈牙利和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苏军入境干预其内政的事件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国家根本就没有拒斥斯大林模式影响的力量。

其二，斯大林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斯大林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的崇高威望，通过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斯大林的这些认识能够对后者发生直接影响。斯大林本人是希望东欧国家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1945年4月，斯大林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提道：“这次战争与过去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

况。”^①就是说，斯大林认为，苏联理应将斯大林模式推广到红军所到的一切地方。凭借自身的威望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斯大林的这一想法自然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响应，一些共产党人甚至自觉地去将这一想法付之实践。另外，斯大林还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互相对抗，“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②按照斯大林的看法，东欧国家应该断绝同资本主义的联系，只能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内进行经济活动。那么，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仅在制度选择上模仿了斯大林模式，而且在建国后的国家间经济政治交往中仍将不停顿地受到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由于基本断绝了与西方的往来，东欧国家只受到苏联的单方面影响，缺乏进行社会变革的外部机遇。

264 其三，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是它们移植斯大林模式的又一重要原因。当时，斯大林模式作为创造了巨大成就的社会模式，在全世界都具有很高的影响力，许多落后国家都竞相模仿斯大林模式，对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而且，在东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期，除了斯大林模式之外，世界上并没有其他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供借鉴，在构造社会主义模式时它们很难有其他选择。因此，为了尽快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为了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物质文化基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就会走上移植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事实上，在一定

^① 转引自吉拉斯著：《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1页。

时期内，面对正创造着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斯大林模式，除南斯拉夫外的确没有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否认移植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在这三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斯大林模式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深刻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移植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构成了“斯大林模式在东欧的全面移植”的历史图景。

（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植斯大林模式的表现

东欧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主要表现在东欧国家建立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两个方面。在这两大问题上东欧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移植，注定它们要走上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道路。

首先，在社会制度的选择上，东欧国家基本上都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建立并实行了苏联式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其他东欧国家都是在1946年前后建立起来的。^①

这些国家新成立的政权基本上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支持，多数还是在苏联红军的直接扶持下建立

^① 1945年4月4日，匈牙利全境解放，11月4日，宣布建成人民共和国。1945年5月15日，南斯拉夫解放，11月29日，南斯拉夫共和国宣告成立。1944年11月29日，阿尔巴尼亚全国解放，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以捷克共产党为领导的新的联合政府宣告成立。1946年9月15日，保加利亚共和国正式成立。1945年5月，波兰全境解放，1946年6月成立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1947年成立人民政府。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

起来的。刚解放时，除南斯拉夫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对都比较弱小，没有在国内掌握全部领导权。为了处理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避免激化同西方的关系，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接受了斯大林关于在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决定，^①没有直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般都由共产党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期待用比较温和的形式，在共产党发展壮大后再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冷战打断了东欧国家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计划。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有名的“铁幕演说”时，冷战的序幕已徐徐拉开。1947年，美国抛出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后，冷战宣告全面开始。面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为了保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协助下，东欧国家不得不快速“准备使国家转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全面把人民民主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东欧各国开始清除各种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最终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获得了绝对领导权，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国家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进行了高度集中的领导，苏联式的社会主

^① 据匈牙利的赫格居斯-安德拉斯回忆，解放后，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没有直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这是匈牙利的领导人认真执行斯大林关于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指示的结果。参阅赫格居斯著：《赫格居斯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6页。在战后初期，斯大林提出这一建议，没有要求东欧国家立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出于稳定国际政治局势和东欧国家内部政局的考虑，并不说明斯大林反对东欧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恰恰相反，斯大林无非是期望东欧国家先稳步处理好国内外关系，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以，这里关于斯大林要东欧国家先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认识，与前文关于斯大林本人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并不矛盾。

义政治制度遂在东欧正式建立起来。

其次，在经济体制的建构和运行上东欧国家都全面模仿斯大林模式，制定并实施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施了农业集体化战略。东欧国家刚刚建立时，就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如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银行的部分国有化等。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展，国有化范围逐渐扩大，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逐渐开始占主导地位，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仍然存在。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1947年之后东欧国家开始普遍学习苏联建立并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南斯拉夫是第一个率先模仿斯大林模式的东欧国家。1946年南斯拉夫颁布的新宪法就规定要实行计划经济，1947年南斯拉夫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但是，资金的匮乏和苏南冲突的发生使南斯拉夫又率先停止了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其他东欧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移植进行的比较顺利。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开始实行两年计划，匈牙利和波兰开始实行三年计划。1949年，阿尔巴尼亚也开始实行两年计划。民主德国则在建国前就开始实行了1949~1950年国民经济两年计划，建国后又继续制定并实施国民经济计划。1949年和1950年，罗马尼亚连续执行了两个年度计划。以制定和实行国民经济计划为起点，东欧国家迈出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步伐。除在工业领域实行经济计划外，东欧国家又在1949~1952年间纷纷强调“小生产对社会主义的危险性”，模仿苏联实施了农业集体化战略。1948年11月，匈牙利提出要在3~4年内做到90%的农民和95%的土地实现合作化。1949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拟订了合作社法，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第一个农业合作化浪潮。波兰、罗马尼亚、东德、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也先后实行了农业合作化。这样，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就在工农业经济体制上都走上了斯大林模式的道路。

虽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的冲动，但在苏联的控制下，除所谓“南斯拉夫实验”外，这种冲动长期未能奏效。1956年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国内开始进行一些非常粗浅的扩大工人民主权利，加强法制建设的措施。这些行为马上引发了波兰与苏联的矛盾，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波兰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波兰也只能继续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内。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匈牙利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引发了苏联与匈牙利的激烈对抗，最后是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党的前总书记卡达尔，平息了动乱。1968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公布推行改革方针《行动纲领》，决定改革整个政治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改变社会主义工业的结构和布局，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扩大企业自主权，并要求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所有国家发展双方互利关系。捷克斯洛伐克由此走上了摆脱苏联控制和斯大林模式的束缚的道路。1968年8月，苏联与华约组织其他国家派出50万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这场改革——“布拉格之春”很快夭折。这样，苏联不但在本国坚持继续实行斯大林模式，而且利用自己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控制，迫使这些国家长期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斯大林模式能够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

268

（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植斯大林模式的结果

与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结果相似，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植斯大林模式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既创造了骄人的经济成

就，也滋生了许多问题。

首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植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取得了不可小觑的经济成就。虽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大多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还没有在政治制度上完全走上斯大林模式的轨道，但他们多数已经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其经济体制已经具有斯大林模式的典型经济特征，此时东欧国家取得的成就可以看作是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就。在模仿苏联搞了年度计划经济之后，东欧国家很快就在恢复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不仅医治了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创伤，而且在一些部门很快大大地超过了战前水平。战后波兰创造出的举世闻名的“华沙速度”，是东欧国家实行斯大林模式创造巨大成就的典型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死亡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22%，国民财富的损失达到了 38%，相当于 1938 年国民收入的 4 倍多，2/3 的耕地荒芜，1/3 的居民无家可归。一些经济学者估计波兰的整个国民经济要经过 50 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然而，仅经过 2 年 10 个月，波兰的工业总产量就比战前超过了 75.5%，国民总收入增加了 45%。其他东欧国家实行斯大林模式后也均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匈牙利在用 2 年 5 个月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三年计划后，工业总产值就超过战前 1938 年水平的 53.4%，其中钢、煤和机械工业的产量超过了 70% 以上。^①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规模则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重新在欧洲占据前列位置。东德的工业实力在一段时期内也并不比西德逊色。这些都是东欧国家依靠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高度集中管理取得的成就。正是凭借这些

269

^① 转引自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5 页。

经济成就，社会主义阵营才能够长期与西方资本主义互相抗衡。

其次，移植斯大林模式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展。实行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中央政府总是设法从农业获取工业积累，然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发展一般都带有不平衡的弊病。苏联是这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在斯大林模式的作用下，尽管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重工业方面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轻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发展滞后和重工业效益差的弊病。在工业经济结构方面，由于偏重于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发展缓慢，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社会上出现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和生活质量提高缓慢的现象。在工业的经济效益方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通过大规模投资促进了重工业的快速增长，但重工业本身却普遍存在着劳动效率低、经济效益差的缺陷。在农业方面，许多东欧国家的农业在战后很多年后都仍然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经历了20年的徘徊，直到1966年才勉强达到战前水平，匈牙利和波兰的农业水平也都长期未能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些缺陷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着农业拖后腿，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企业缺乏竞争力的弊病，在资源、资金、人力的投入达到一定限度后，国家缺乏推动经济发展的后劲，经济发展开始变慢，最终会停滞不前，这是东欧社会主义移植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通病。在政治上，斯大林模式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病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所表现，有些领导者习惯于搞专制独裁，搞个人崇拜，搞家族统治；社会主义民主未能得到发扬，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人民群众有

时甚至受到愚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病总是要引发社会矛盾，引发制度危机。1956年爆发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斯大林模式过程中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遇到的一次制度危机。在国内外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未能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切实的变革。于是，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聚，解决这些矛盾的难度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引发出全面的社会危机，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到1989年，有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

总体上看，斯大林模式有利于国家集中资金、资源、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这对于推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短期内的快速发展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实行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不善于根据自身的条件适时地进行社会变革，机械地沿袭斯大林模式的做法，就必然会滋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它们实行斯大林模式的做法在初期是基本正确的，但后来由于未能及时变革斯大林模式，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减慢，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政治生活严重缺乏民主，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三 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和扬弃

271

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过程与东欧国家的建立过程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后，独立自主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期间，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制度受到了斯大林模式的较大影响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没有受到苏联太多的影响。但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制度选择和经济体制的建构和实行上，中国也深刻地受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走上了照搬斯大林模式的轨道。后来，中国又自觉地开始探索扬弃斯大林模式的途径，最终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拥有全世界 1/4 人口的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和扬弃，是斯大林模式在全世界发生广泛影响的重要表现。

（一）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模式之所以能够对社会主义中国发生巨大的影响，或者说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会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由于下列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论认识直接引发了新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在“十月革命”的指引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组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努力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期间，毛泽东等人较少对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作出探讨。革命胜利在即时，对新政权组织形式的选择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此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对未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作出探索。那时，斯大林模式是世界上惟一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的魅力正走上顶峰，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纷纷传诵着斯大林模式的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绩，斯大林模式已然成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的样板。而且就在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开始被绝对化、神圣化，是否以苏为师、是否仿效斯大林模式成了各国共产党、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难免要受这种世界潮流的影响。在《苏维埃中国》一文中，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苏联”，是我们“向前发展的活榜样”。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共产党的建国方略，指明：“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① 这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看法，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抉择。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走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足为奇的。

其二，模仿斯大林模式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列宁曾经说过：“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② 这话准确地提出了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应尽快提高本国生产力水平的任务。斯大林关于“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慷慨陈词及其实践，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就是要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的论断，都是对列宁这一精神的继承。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果断地作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制定并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

273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性计划，集中全国资源、资金和劳动力，很快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物质基础。新中国也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中国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中国却面临着先进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的矛盾，国家急需完成快速提高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重任。在这种形势下，苏联的成功先例起到了光辉榜样的作用，社会主义中国于是试图通过模仿斯大林模式，在中国也尽快地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物质基础。因此，在社会现实的推动下，中国自愿地走上模仿斯大林模式的道路，其根本目的就是期望与苏联一样，迅速地建立起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称的物质文化水平。

其三，模仿斯大林模式是中国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困和寻求苏联援助的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时，国际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国内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国民党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内战、独裁活动的。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但也是与国际上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建立后，欧美资本主义立刻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① 试图迫使新中国就范。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

^① 早在1947年，美国就宣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略物资禁运。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下，美、英、法、意、日等15个西方国家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它要求成员国严格控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资出口。在美国的控制下，“巴统”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了长期禁运。

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①“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②站定“一边倒”的国际政治立场后，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有效地化解了帝国主义封锁带来的威胁。不仅如此，“一边倒”的国策还为中国争取苏联援助奠定了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形成后，中国代表团赶赴莫斯科征询苏联政府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商请苏联对我国提供援助和指导。斯大林本人对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并表示要帮助设计一些企业和提供一些设备。之后，苏联政府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许多建议，派来 3000 多名专家，承担了 156 项骨干工程的援建工作。这些援助既为中国奠定了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基础，也使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了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就这个时期的总体形势看，“一边倒”的国策，是新中国化解帝国主义封锁的武器，也是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起点。在“一边倒”的过程中，中国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模仿斯大林模式的道路。

在这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自愿地接受了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并走上了所谓“建国前八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的道路。占世界 1/4 人口的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则构成了斯大林模式影响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

275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2 ~ 1473、1475 页。

(二) 中国模仿和扬弃斯大林模式的过程考察

中国模仿和扬弃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各个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以下将对这四个阶段进行宏观考察。

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前，斯大林模式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制度发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套建党制度不仅在革命期间发挥了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也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那时，共产国际代表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将苏联共产党的那一套民主集中制组织制度传授给中国同志，然后由中国同志模仿联共（布）的形式建立起共产党。这样，建立于列宁时代的俄共（布），成熟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联共（布）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指导思想一元化模式等，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了实行。与联共（布）一样，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制度，进行了职业革命家的队伍建设，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虽然苏联共产党处理兄弟党关系的行为和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的行为，都未对中国革命带来根本促进，但在创建政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组织制度上的相似性，比起斗争策略的差异性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影响到当时的革命事业，而且将影响到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形式。实际上，这一套政党制度是组建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组织原则，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都是依据这一原则进行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阶段，斯大林模式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的行动，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建国时，针对一些人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倾

向，毛泽东鲜明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惟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①至于如何建立工人阶级的人民共和国呢，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他们（指苏联——笔者注）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②于是，在政权形式的选择上，新中国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只是以汉语的特色体现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所具有的专政和民主的丰富含义。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开始对小生产和私人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并执行了国民经济计划，全面模仿斯大林模式对工业发展蓝图、计划指标、计划贯彻执行程序和工厂管理体制等作了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和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的根本所在。只要具备这两点，所谓新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的提法就是不容置疑的。

1956年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并未能使中国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羁绊，实际上中国仍然在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外都开始了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所反映。1955年末，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即明确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文中提出，对于苏联的经验，不能不加分析地

277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481页。

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照搬。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弯路，你还能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之后，中国开始对工业的地域分布和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比例作了一些调整，取得了一些突破斯大林模式局限的成绩，开拓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这些调整都没有突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框架，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特点也没有改变。因此，这些调整并未能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局限，中国依然在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毛泽东等人的这些合理认识很快就淹没在过激的现实行动中。在这些合理设想提出后的短短时间内，中国就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新中国又走上了片面追求高纯度公有制的轨道。在对高纯度公有制的追求上，中国的行为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做法，在斯大林模式片面提高公有制比例的轨道上走得更加激进。所以，那时中国对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未能取得很好的成就，国家仍然深刻地受着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1978年以后，中国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其典型形式）进行改革，真正使中国走上了扬弃斯大林模式的道路，但斯大林模式包含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内容仍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集体化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其表现形式是人民公社）的扬弃开始，中国开始全面变革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全面扬弃了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国家不再对社会的经济生活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格局的出现，全面突破了斯大林模式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格局。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突破了统一的工资等级制，市场

规律成为调整人们收入的重要途径。虽然工资等级制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着，但其他领域则全面打破了工资等级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克服了斯大林模式政治和文化体制从高度集中蜕变为过度集中的弊病，贯彻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原则，有效地保证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但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有益的东西，也就是其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等，乃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将继续实行之。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模式仍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着一定的积极影响。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和社会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做法，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时不能将其丢弃。社会主义的改革切忌在变革斯大林模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时，抛弃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否则就可能重蹈苏联剧变之覆辙。

（三）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表现和结果

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行为，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建立和实行过程中都有着明显的表现。

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主要表现在建立比较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生产进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和通过工资等级制实行按劳分配三方面。与斯大林模式建立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做法一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也不断要

求实现所有制的大变革，期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的理想。城市工商业的改造是这样，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这样。中国不仅较早地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而且在农村合作化刚取得成绩后，就急忙进行新的所有制升级，着手创办人民公社。与斯大林模式运用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活动的做法相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运用指令性计划组织经济活动。1953年以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新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中央政府对工业的发展蓝图、计划指标和计划贯彻程序都作了明确规定，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建立了下来。在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上，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中国自然也必须运用行政办法对职工的劳动量进行估算，依据劳动量和劳动强度确定不同工种的工资等级，这与苏联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这三方面是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的最基本表现。

280 在政治体制上，社会主义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主要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缔造、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和干部制度等方面。马克思主义主张：“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① 斯大林模式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包含有民主和专政两方面的含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还能有效地组织经济活动。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② 联共（布）党内权力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中，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工作原则，在中国也得以实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就已经模仿了斯大林模式的建党制度，党的中央机关事实上是党的权力核心，这有效地保持了党的战斗力。在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方面，中国的做法与苏联的做法也比较接近。斯大林模式实行的是一党制，共产党通过苏维埃对国家进行了全面的领导；中国虽然采取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但共产党对各民主党基本上具有支配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能够实现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在干部制度方面，中国实际存在着的干部任命制和曾经存在过的终身制与斯大林模式的干部制度是相似的。总体上看，虽然新中国政治制度与苏联有着种种差别，但上述几点乃是决定政治制度性质的最基本因素，在这几方面上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苏联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在思想文化体制上，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主要表现为指导思想一元化模式的建立。斯大林模式思想文化体制的首要特征就是在全社会树立起指导思想一元化模式，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定为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宣传、教育还是科学研究事业都首先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很快也在新闻、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树立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指导思想一元化的文化模式。实际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都不能偏离这一原则。意识形态模式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根本内容，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则是意识形态的命脉，中国在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后，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体制与苏联文化体制的相似性。

281

如同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实践一样，社会主义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既创造了不可低估

的经济成就，又带来了许多问题。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经历了全面模仿和有限调整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尽管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成绩却是不能否认的。国内有关著作对这些成就作了大量的论述，本文仅引用不同时期的几组重要数据来说明这一事实。^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时，国家的经济状况非常落后。由于连年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原因，建国初期中国的国民经济状况比1936年还要糟糕。根据估算，与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比，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50%，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0%以上，粮食平均亩产仅68.5公斤。许多工厂没有开工，连工业中心上海，主要行业的工厂也只有1/4开工，物资极端匮乏，人民得不到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从工农业的比例看，在工农业总值中，农业总产值占70%，工业总产值占30%，其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从工业布局看，7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少数城市，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工业体系。对建国时中国经济面貌的描述，是衡量中国在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取得的成就的起点。可以说，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比苏联（苏俄）是更低，新中国的经济处境非常不如人意。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建设后，到1952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全面恢复，达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1952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是1949年的社会总产值的1.9倍；1952年的国家工农业

^① 这些数据主要引自张启华著的《曲折探索时期的光辉业绩——建国后至“文革”结束的经济建设》一文。参阅《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了 77.5%，比 1936 年增长了 20%；1952 年的国民收入是 1949 年的 1.7 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建国前的水平；在文教方面，1952 年全国大学生总数比 1949 年增长了 63.1%，中学生增长了 148%，小学生增长了 109.5%。虽然此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下，但这三年的进步无疑是巨大的，它所起到的是治疗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作用。虽然此时中国仍未模仿斯大林模式实行指令计划经济，但在政治制度上新中国已经确立了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高度集中的政治领导与斯大林模式所包含有的政治特征是相似的。而政治稳定乃是恢复国民经济的必要条件。

从 1953 年起中国开始全面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经济建设，到 1957 年中国社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苏联的支援下，1953 年中国实行了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6 年年底，中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57 年底即超额完成了计划的各项指标，各项领域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业上，到 1957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 1952 年增长 128.6%。钢产量达到 53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了 296%，为 1949 年的 33.9 倍，为解放前最高年生产量的 2.1 倍；发电量比 1952 年增长了 166%，为 1949 年的 4.5 倍，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 5.2 倍。农业生产方面，国家对水利的投资达到了 41.8 亿元，新增的灌溉面积近 2.2 亿亩。按照年不变价格计算，1957 年比 1952 年，农业总产值增长 25%，粮食产量增长了 19%，棉花产量增长了 26%。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到 1957 年，高等院校由 1952 年的 181 所增加到 229 所，在校生由 1952 年的 19.1 万人增加到 44.4 万人。五年共招 56.3 万人，毕业生 26.9 万人。而旧中国从 1912 年至 1947 年的 36 年

间，一共才有高等学校毕业生 21 万人。科研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共建独立的科研机构约 600 个，研究人员约 2.5 万人，比 1952 年增加了 2 倍多，一些原来完全空白的学科，如原子能、半导体、遥控和抗生素等部门都建立起来。此时，中国社会的突飞猛进再现了斯大林模式在集中力量快速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从 1957 年到 1966 年的 10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 1956 年完成了三大改造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尽管期间出现了反右派运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人民公社化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错误，但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工农业生产的成就巨大。到国民经济调整结束的 1965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57 年增长了 59.9%，其中农业增长了 9.9%，工业增长了 98.1%。工业方面，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从 1958 年到 1965 年，共建成 531 个大中型项目，新建或扩建了大批重要企业，其中包括十大钢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大庆油田等。电子、石化、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工业的地理布局有了很大的改变，沿海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加强，广大内地和边境省份、少数民族地区都新建起了不同规模现代工业。农业方面取得了基本建设的显著成效，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从 1958 年初开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农村掀起了高潮，到 1965 年为止，建成的大中型水利施工项目 150 多项。其中大部分在抗洪抗旱、发展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农业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土壤、控制水土流失、建立气象预报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教育方面，1965 年比 1957 年，全国高校在校生生增加了 52%，毕业生增长了 3.6 倍。各行各业职工的文化素质获

得了提高，科技和管理队伍壮大了起来，各条战线上都培养了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技知识的领导者和骨干人才，这些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

建国初期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者的高度肯定。改革是对目前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传统模式的扬弃，但并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的片面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阐明了建国初期中国照搬照抄斯大林模式的事实，他领导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变革，但他对建国初期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给予高度肯定的。邓小平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①“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革命……事情做的非常好。”^②他强调“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③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的重要成员胡锦涛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大会讲话中也指出，在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过程中，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但是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一边倒”的道路上，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中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的发展史上是

285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253页。

罕见的。

这一时期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许多西方学者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的。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分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均为34%），这比日本在相应的工业化启动时期，即1874年至1929年的每10年经济增长率43%（人均28%）还要高得多。”^①他写道：“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家之一的姿态出现了”。^②梅斯纳的分析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至少在缔造工业规模方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成就使中国跻身于全世界最大工业国之列。

大概是实行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的通病，中国在模仿斯大林模式后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国通过资源、资金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曾经取得了工业规模的快速发展，但经济发展呈现出粗放型的特征，劳动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差，企业缺乏竞争力，农业生产相对滞后，轻工业发展缓慢。于是，国民经济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快速发展后，当生产的发展必须由规模扩展转变为经济效益的提高时，中国的大批国营企业也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弊病。这些问题的出现，迫使中国不得不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变革，真正迈出了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步伐。

^{①②}（美）莫里斯·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486页。

四 对资本主义制度及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影响

斯大林模式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它直接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样板。同时，斯大林模式还是一种由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管理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以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对立面而存在。当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遭遇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时，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产生了广泛的质疑，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开始向往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藉此向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发起强劲有力的冲击。而且由于斯大林模式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实行，20世纪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激烈对抗的世界政治格局。

（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

在斯大林模式创立并开始实行后，苏联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则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即1929~1933年的世界性大危机。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与苏联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再停留在理论家对后者的批判，而是以生动活泼的事实展现了社会主义的魅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资本主义不能借鉴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去调整自身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冲击有可能会全面加剧，甚至可能引爆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在危机爆发时，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可能全面激化，资本主义国

家的统治阶层也可能发生分化，最终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是历史以来最严重、最具破坏力的危机。这场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暂时放松对苏联的封锁，为苏联带来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本国经济的机会。这场危机从1929年秋天开始一直延续到1933年，历时四年之久，几乎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国家的所有经济部门。据统计，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其中煤炭产量下降了30.9%，生铁下降了64.8%。危机期间，美国是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其工业生产下降了46.2%，倒退到了1905年的水平。德国和法国的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40.6%和32.9%，倒退到了1896年和1911年的水平。英国也下降了23.8%，倒退到了1897年的水平。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衰退引起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大批雇员失业，金融系统崩溃，货币全面贬值，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处在有史以来最低迷的时期。危机造成的巨大破坏还给经济的恢复带来巨大的困难。直到1937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经济部门仍然未能恢复到1928年的水平。在这样的状况下，资本主义自然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军事打击。

288

在遭遇经济大危机的袭击时，资本主义国家不但不得不暂时放松对苏联的经济、政治围困，而且为了解决自身的燃眉之急，它们还愿意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以获取资金和就业机会。在这种有利环境下，苏联很好地抓住了资本主义世界危机赋予的发展机会，大力从西方引进技术和人才，有效地促进了苏联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冲击。据估计，到1931年，苏联接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援助的项目达到了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外汇支

出)。仅 1929~1930 年,苏联从英国购买的设备大约占英国机器设备总出口额的 70%,1931 年为 90%。1931 年,苏联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美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 50%。^① 1928 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有 379 人,技术人员有 505 人,到 1932 年外国专家有 1910 人,比 1928 年增了 4 倍,技术人员有 10655 人,比 1928 年增加了 20 多倍。^② 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和对西方人才的聘用有效地弥补了苏联技术和人才的不足,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作为两种尖锐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危机将自身的技术出售给正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无疑是自愿地为对手提供斗争的武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强烈的制度危机感由此产生,^③ 许多人开始对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产生怀疑。同时,为了改善国内的劳资关系,面对斯大林模式的挑战、国内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国内经济的衰退和新近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感,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纷纷进行新的调整。

当时,鉴于斯大林模式国有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西方资本主义政权为摆脱眼前的社会危机,不得不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劳动群众作出了一些让步,积极改善劳资关系,

① 《苏联外交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转引自杨家荣等著《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9 页。

② 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1 页。

③ 1944 年 6 月，美国特使哈里曼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反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报告，其中忧心忡忡地提及，斯大林在同美国官员埃里克·约翰斯顿的谈话中指出：“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参阅乔治·霍利德著：《对苏联的技术转让，1928—1937 年和 1966—1975 年：西方技术在苏联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美国西方观察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2 页。

提高社会福利。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就是对苏联做法的借鉴。正当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一枝独秀，苏联式的社会福利对资本主义国家中下层人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罗斯福大胆地实行“新政”，突破了亚当·斯密以来自由主义的传统模式，确立了美国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崭新理念，大胆地借鉴社会主义的计划和福利的优势之处，并部分地将其纳入制度框架，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在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政府大力加强了国家对企业的干预，创建了一批国有企业以解决本国工人的就业问题，从而达到缓解社会危机的目的。从经济上说，“罗斯福新政”的基本思路就是：政府积极管理国家的宏观经济活动，通过全面立法和有效干预，增加政府财政预算，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生产发展，保证充分就业。从政治上说，“罗斯福新政”实现了国家职能的一项重大改革，开创了福利国家的新功能。在此，人们看到了强调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的斯大林模式的巨大影响，有的学者遂把“罗斯福新政”称为是传统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①那时，鉴于“罗斯福新政”对苏联的模仿，罗斯福本人甚至曾被右翼势力说成是“苏联间谍”。而且在“罗斯福新政”倡导的理念的影响下，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进一步完善了或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保障制度，在全社会对富裕阶层征收较高的所得税，用以补贴政府财政，解决贫苦阶层的生活危机，从而在一定范围内缓解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延长了

^① 参阅周德明著：《社会主义与20世纪意识形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

资本主义的寿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来就是矛盾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不是凭借斯大林模式创造了伟大成就的形象对资本主义发生的冲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政府恐怕是不会轻易从资本家的口袋里拿钱补贴工人的生活的。

斯大林模式对资本主义的冲击，还深刻地表现为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在西方知识界产生的强烈反响，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产生了制度危机的意识。正如著名反共人士兹·布热津斯基在分析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借鉴苏联做法时所提到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知识界的热门话题，人们经常在讨论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他说：“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思想精髓的间接传播。在过去40年中，依靠国家采取行动来对付经济和社会弊端的倾向四处流行。……甚至在高度民主的社会中，认为国家采取行动是促进经济福利和社会正义的最佳途径的看法，也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观点”。“把国家当作救助社会的主要手段的作法间接地提高了苏联制度的地位，因为苏联制度是国家计划和国家指导的社会革新的最典型的样板”。“斯大林打败希特勒更大大增加了这种魅力”。“共产主义成为知识界议论的主要话题，并似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吉兆”。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资产阶级政论家，是决不愿看到共产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任何进展的，但他却描绘出了历史的事实。从他的笔下，我们清楚地看到，斯大林模式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发起了强大冲击，共产主义已不再是“幽灵”，而被人们视为“历史的吉兆”。^①

291

^① [美] 兹·布热津斯基著：《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二) 对 20 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在斯大林模式创立之前，社会主义苏联长期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时刻可能被资本主义所绞杀，整个世界呈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一切的局势。斯大林模式的实行逐步改变了这种局面，苏联的发展壮大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起来，并开始模仿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社会主义具有了与资本主义在全球互相抗衡的实力。随之，在 20 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内，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对抗的新格局。

首先，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不断壮大，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牢牢地站住了脚跟，开始对资本主义国家主宰全球的局面发起挑战，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斯大林模式的创立起，也就是自 1929 年起，苏联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综合国力在短短的几年内获得了巨大提高，国家拥有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建成了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科技水平获得了较大的提高，从而使苏联全面摆脱了落后的面貌，并很快成了超过包括英、法、德国等欧洲所有国家的工业大国。社会主义由此获得了生存的保障，成功地渡过了襁褓阶段，进入了生命力旺盛的青少年期。只有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后，苏联才能摆脱被资本主义所扼杀的命运，才能在资本主义占主宰地位的世界拥有生存权利。即便是在资本主义渡过了 1929~1933 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重新发起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时，苏联也已经具有保全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在英、法引诱德国进攻苏联的绥靖政策面前，苏联灵活地进行了外交斡旋，与德国进行了短暂的合作，争取到了加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时间。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时，苏联成功地组织起世界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反击战。不但成功地保卫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彻底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挽救了世界文明。苏联的发展壮大，不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动力，也为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希望。凭借斯大林模式创造的物质成就，苏联才可能对于欧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事业提供援助，社会主义运动才有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可能。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资本主义主宰全球的局而开始松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全面对抗即将来临。

其次，在斯大林模式的推动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发起攻击时，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了与资本主义全面对抗的实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互相冲突的新格局随之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绞杀中岌岌可危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社会主义不仅具备了保全自身的实力，并且能够在全球与资本主义相抗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联结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形成一个堪与西方资本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则使世界 1/4 的人口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东欧、苏联和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连成一片的，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团结一致，那么，这片广袤的土地就能够使社会主义拥有与资本主义长期相抗衡的实力。

冷战的爆发全面拉响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互相对抗的警报。于是，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的影响直观地表现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在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上，这种对抗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政治上，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斗争表现为两面旗帜的较量和斗争。社会主义阵营高举和平、民主的大旗，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民主运动，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资本主义阵营则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号，以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为幌子，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到处支持反动独裁政权，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族民主运动。在经济上，社会主义阵营的经互会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进行了直接的较量，封锁与反封锁的经济斗争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长期进行着。在文化上，资本主义到处攻击共产主义，称共产主义为“极权政体”，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针对共产主义的舆论攻势，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群众的反共情绪，培养反共斗士，到处搞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一方面注意在国内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一方面积极抵御资本主义的舆论攻势，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活动。在军事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华沙条约缔约国组织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了长期的对抗。由中央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管理的斯大林模式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对抗，直接表现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而两大阵营的对抗则最终以军事对垒的形式走向白热化。柏林危机、加勒比海危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是这种对抗的最激烈表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对抗的世界政治格局整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由斯大林模式的实行而间接引起的这种漫长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不能不说是世界历史的奇迹。

总之，如果没有斯大林模式的创建和实行，就没有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也就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相互抗衡的世界政治格局。如今，即便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消失，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已经灰飞烟

灭，但是当人们沿着 20 世纪的足迹去审视 21 世纪时，就会发现：斯大林模式给人类历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如今，当我们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时，由斯大林模式的实行而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辉煌业绩，表现出了一种强大的感召力。我们衷心盼望着社会主义在制度创新的进程中走向复兴。当我们面对俄罗斯总统弗·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表现出的对俄罗斯前景的无限忧虑时，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创造的辉煌业绩和斯大林模式的是与非，则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撼的思想力量！或许，这种力量只有在俄罗斯实现伟大复兴之后才会有所减弱。1999 年 12 月 31 日，普京怀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以进行深刻历史反思的姿态忧虑地指出：“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 200~300 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①昔日苏联的强大与今日俄罗斯的羸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大林模式的影子在这种对比之中纠缠着俄罗斯人的心灵，斯大林模式对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将长久地存在着。

^①〔俄〕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罗斯《独立报》1999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296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也是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沈宗武同志所撰写的《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比较系统深入地剖析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因、理念、基本特征、历史作用、体制弊端及其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并对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学术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中所得出的结论和见解有理有据，也较有说服力。该书对斯大林模式的分析，不仅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且还从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视角进行剖析研究，在观点上有新意。这主要表现在：（1）对斯大林模式相关概念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和划分，在此基础上，清楚地阐明了斯大林模式包含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原则和个性特征；（2）把斯大林模式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从一个新的视角拓展了研究斯大林模式的深

度和广度，并认为斯大林模式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有效途径；(3) 沿着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线索开展研究，提出了斯大林模式的诞生和变革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见解。这本著作，对斯大林模式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价，既肯定了它的历史贡献，又分析和批评了它的局限性和体制上的弊端。这对于推进正确总结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源头和出路，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该书行文流畅，文字干净，逻辑连贯，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李崇富

专家推荐意见一

298

斯大林模式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课题。迄今为止，虽已发表了很多著述，但系统而全面地进行客观研究的专著还不多见。特别是由于围绕这个课题在学术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相当一些著述具有不同程度的主观片面色彩，其中不乏以贴标签式的空泛议论代替严谨的科学研究。沈宗武的这本专著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作者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背景、基本特征、积极作用和严重弊端，以及这一模式对世界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和实事求是地分析。作者针对学术界存在的一些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实践模式，具有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也具有本身的特殊性。全书突出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无论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功过和历史地位，既能紧密结合当时苏联特定的历史条件去进行考察，又能站在今天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高度去总结经验教训。

本书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有关斯大林模式的几组概念辨析和对研究斯大林模式的方法论的阐发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对有关的研究对象作了明确的界定，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有利于本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是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客观时代要求和历史作用，指出斯大林模式是落后国家“后发先进”地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三是运用了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同时注重了史论结合，不仅扩大了考察的视野，而且使得所提出的论点均因有史实为据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四是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它取代新经济政策，以及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斯大林模式的扬弃，都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巨大变革。

五是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满足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苏联的发展，但后来又成了改革的对象。

以上创新之处，使得本书与同类的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质量和理论深度，有助于正确总结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演变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有益的借鉴。另外，还应当指出的是本书的文风朴实无华，文字表述清楚准确。

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我作为答辩

委员会主席和其他委员一致对论文作了较高的评价，也指出了不足之处。作者在答辩通过后对论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进一步提高了质量并扩充成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之骅

专家推荐意见二

沈宗武博士撰写的《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一书对斯大林模式展开了全面评价，其政治质量过硬，思想含量丰富，学术水平较高，在国内同类研究中是出类拔萃的，称得上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和政治内涵的著作。

斯大林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实践模式。自1956年非斯大林化运动以后，关于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乃至世界政治思想界激烈交锋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发生后，斯大林模式的评价问题再度凸显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在历史的尘埃刚刚落定之际，作者敢于正面接触国内外思想界这一最前沿、最具难度和敏感度及极富理论挑战性的选题，意义非凡，勇气可嘉，难能可贵，表现了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关怀。作者将研究对象定位在斯大林模式上，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和划分，从而使该选题更显示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总之，该选题恢宏

大气，难度大，起点高，有价值。

作者在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为指导，以辩证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分析问题。他明确指出，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向。作者以这一鲜明的理论结论回击了西方右翼政治势力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否定和攻击，而他对这一模式的全面阐释体现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全文在扼要说明重评斯大林模式的意义和方法的基础上，分五章介绍和剖析了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根源，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述，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及其弊端，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其中，对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作用及其弊端的两章分析都是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个层面入手进行反复比较和论证，尤其能够体现作者的理论思考能力和研究功力。全书结构完整，内容概括全面，分析条理清晰，论证逻辑严谨，评述客观中肯。这一分析性的评述既打破了教条主义的僵化思维方式，也没有因此走向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的另一个极端，较好地把握了评价这一模式得失的分析尺度。

作者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介，理论有新意，方法有创新，有很强的现实感和针对性。譬如，书中针对国内外在总结苏东失败经验教训时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直接归结于斯大林模式本身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独创性认识，表现了作者对理论研究前沿和要害观点的敏锐把握；又如，书中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分析，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方法和原则，有助于更深入揭示这一问题形成的社会根源和民族心理根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把斯大林模

式的研究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进程和背景之下，将斯大林模式看做是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的创造性模式和道路，从崭新的视角拓展了客观评价斯大林模式的广度和深度。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当资本主义体系陷于经济危机时，斯大林模式曾是一枝独秀，举世瞩目，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创造了当时经济发展的世界第一速度。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成就延续到 70 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仍使苏联保持了强大的实力，足以证明斯大林搞经济是有一套的，其经济思想也是有突出成就的。书中直面西方对斯大林批判中的尖锐的关键性观点，在批评个人崇拜和激进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等问题的同时，肯定了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贡献，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实践成就作出了客观评价，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主要贡献，如保留了商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即有商品的计划经济，开辟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道路等，作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定性分析。作者从强调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创新意义和突出现代化历史定位的角度肯定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地位和成就，是该书最有光彩的亮点，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在书中大量运用历史材料作为论据，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再现当年的复杂历史背景，资料翔实，引用准确，看得出在历史资料的处置中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丰富的历史资料，对国内外相关同类文献的大量占有，不仅为分析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后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背景资料。从学术规范的角度看，作者的工作也是出色的，具备了做研究工作的良好素质和严谨态度。同时，作者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并使用新公开的苏联秘密档案，加强了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力度，

深化了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论认识。还有作者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研究中始终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宏观思考为参照背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向。作者文风端正，文字不浮躁夸张、不虚饰矫情，行文流畅简练，明快干净，值得提倡。

该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反复修改订正而成。由于博士论文本身基础相当好，在答辩获得好评、顺利通过之后，作者又根据导师和各位专家的意见对原先存在的个别不足之处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从而使立论更为严谨，论据更为可靠，论证更为缜密。例如，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弊端的批评以及对其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给社会主义事业和形象造成的不良影响等分析都有所深化，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可以说，这是一部自成一家、见解大胆独到的学术专论。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作者选择了跨学科研究的方式，综合了政治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的知识，使该书有一定方法论上的优势。总之，该书理论观点鲜明，学术质量过硬，方法有创新，值得推荐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

周穗明

参 考 文 献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列宁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斯大林全集》第1—13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 《斯大林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 《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邓小平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4年版。
- 《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

第1—4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部分初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教研室编译：《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靳辉明主编：《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与现实》，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306

李崇富著：《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的再探讨》（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

出版社 1991 年版。

丁学良著：《“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概念构架》，《中国社会科学》1988 年第 1 期。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主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江流、徐崇温主编：《20~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周新城、高成兴主编：《苏联东欧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周新城著：《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王正泉主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22 页。

李会滨主编：《社会主义：20 世纪的回顾和前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周晓红著：《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角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马洪主编：《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吴敬琏著：《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

胡乃武、金培主编：《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刘玉珂等著：《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柳新元著：《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

程又中著：《苏联模式的兴衰》，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富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东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马龙闪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版。

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年版。

308 姜长斌主编：《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变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叶卫平著：《千秋功过 谁人评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邢广程著：《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从系统的观点研究苏联模式》，《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2 期。

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8 年版。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陈国新著：《东方民族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周穗明著：《社会主义与 20 世纪意识形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 年第 3 期。

沈宗武著：《斯大林模式是历史的错位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 年第 5 期。

沈宗武著：《苏联集体农庄经济制度的形成原因及若干思考》，《东欧中亚研究》2000 年第 3 期。

沈宗武著：《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 年第 4 期。

唐土其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杨家荣等著：《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

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张启华著：《曲折探索时期的光辉业绩——建国后至“文革”结束的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 年第 5 期。

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塞缪尔·亨廷顿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布莱克著：《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艾森斯塔德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艾森斯塔德著：《社会的进化与发展》，牛津 1966 年版。

罗克斯巴勒著：《关于不发达的理论》，麦克米兰 1979 年版。

道格拉斯·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W. 布鲁斯著：《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与政治体制》，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阿兰·格鲁奇著：《比较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吉拉斯著：《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斯蒂芬·科恩著：《布哈林政治传记（1988 ~ 1938）》，纽约 1973 年版。

罗伯特·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纽约 1977 年版。

翁贝托·梅洛蒂著：《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雷蒙·阿隆著：《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著：《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A. 诺夫著：《苏联经济史》，米德尔塞克斯 1969 年版。

莫里斯·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E. H. 卡尔著：《计划经济的基础（1926 ~ 1929）》，伦敦 1969 年版。

奥塔·锡克著：《经济体制——比较、理论、批评》，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乔治·霍利德著：《对苏联的技术转让，1928～1937年和1966～1975年：西方技术在苏联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美国西方观察出版社1979年版。

兹·布热津斯基著：《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伊萨克·多依彻著：《斯大林政治传记》，纽约1973年版。

赫格居斯著：《赫格居斯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伊恩·格雷著：《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让·爱伦斯坦著：《斯大林现象史》，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

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982年版。

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罗·梅德韦杰夫著：《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戈尔巴乔夫著：《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戈尔巴乔夫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戈尔巴乔夫著：《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瓦·博尔金著：《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

雅科夫列夫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弗·普京著：《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 年 12 月 31 日。

后 记

本书的撰写可以追溯到 1998 年初。其时，承蒙我的导师靳辉明教授的厚爱，我参与了由他主持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工作。在该课题的研究中，靳老师带领我合作撰写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与现实》一书的第五章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是与非。该书已于 2000 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2001 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追加奖。

1999 年 9 月，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靳辉明教授。学习期间，经靳老师同意，我将《斯大林模式的是与非》确定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拟将原本仅一章篇幅的内容深化扩充为一部专著。于是，在靳老师和导师组各位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围绕这个选题潜心研究。最终于 2002 年 4 月完成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答辩后，我又根据答辩前后专家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对论文作了精心修改，最终形成本书。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靳辉明教授、周德明研究员、陈之

原
书
缺
页

314--末